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No. 37 JUL. 1986

要知鄧小平陳雲之後中國將發生什麼，請看本期

中共高層 鄧陳派系 實力大觀

徐文立遭殘酷虐待 ● 妻兒呼吁國際聲援



徐文立的妻女盼望國際聲援

遇羅錦、黃鳳祝繼續大辯論
改革派之處境 ● 作為 ● 出路
自本期將連載《鄧小平評傳》

7月號

總 37 期
1986

本期專題：

楊力宇 ◆ 齊錫生 ◆ 高英茂 教授 論 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係

▼ 圖片說明：這是徐文立妻子康彤今年三月十二日給中國民聯副主席柯力思的親筆信函的片斷，信中指出：「十·十五日（指從去年十月十五日）以後不得謀面，十一月五日斷了來信（指未再接到徐文立自獄中的書信），還不知停到何時……」。

這些奶米茶十牙膏 10.15日以後不得謀面。11月5日斷了來信。不知停到何時。品人過米運步不小。可待米米重矣似有困難。……

希望早些見到你呀。……

你呀，別太將就自己。……

……

……

徐文立在獄中遭殘酷虐待

妻兒呼吁國際支援

親愛的同胞們：

西單民主牆運動的著名領袖徐文立，自去年十一月份起在「中國之春」上發表其「獄中手記」——「我的申辯」以來，在獄中受到殘酷虐待，其妻康彤和女兒徐謹向國際輿論發出呼籲，請國際間給予人道主義支援。

據北京市公安局內部消息透露，北京市公安局有關領導對「中國之春」全文發表徐文立「我的申辯」大為光火，他們一時查不出局內透出「我的申辯」的內綫關係，便拿徐文立出氣，對之進行殘酷虐待，包括：

1. 停止徐文立妻子康彤探監已達半年之久（康彤最近致函中國民聯副主席柯力思，亦提到此點。見附圖）；
2. 把徐文立長期關入單身黑牢，與世隔絕，其妻康彤寄給他的書籍、食品，一律被扣；
3. 禁止徐文立與妻通信；
4. 把徐文立的伙食降到最低標準——每日只給玉米麵窩窩頭和鹹菜。

5. 反覆審訊徐文立，逼其供出傳送「我的申辯」的人員；

6. 不讓徐文立有規律的放風，監獄常任意延長兩次放風的間隔時間。

在殘酷虐待下，徐文立健康受到嚴重摧殘，再繼續惡化，後果不堪設想。

徐文立為了使中國走上民主法治的健康道路，犧牲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他的光輝業績，必將永垂中國的民運史冊！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不能眼看著徐文立的健康繼續惡化，我們要通過各種途徑向北京當局建言，恢復徐文立做人的尊嚴，使監獄的各項活動（包括探監、放風和通信等）制度化，並盡早釋放一切在押的民運人士。

徐文立的妻兒透過中國民聯，向各界尋求人道主義的援助。我們呼籲：有良知的、擁有綠卡或公民卡的旅美、加、歐、日、澳、東南亞及世界各國的華僑，組成回國慰問團，慰問坐牢民運人士的家庭，探視坐牢的民運人士，向北京當局建言放人。有意參加者，請與我們聯繫（通訊處見「中國之春」封底）。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三日



鼓勵改革派

進行政治大突破

隨着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中國的政治局面亦可能發生改變，這在最近一系列事件、風波和北京領導人富有新意的講話中，露出了端倪。

五月八日，「人民日報」評論員在頭版頭條（海外版二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振奮人心、但要靜觀後效的社論——「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能夠把民主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儘管還不得不冠上「社會主義」一詞），和四個現代化相提並論，實屬罕見。它說明了，在中國人民的持久努力下，在海外輿論的一致倡議下，更重要的是在改革的實踐中，中共改革派中的有識之士已逐步意識到：民主對經濟現代化之成敗，對中華民族的長遠前途，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該社論引用了鄧小平先生最近的講話：「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也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鄧小平先生公開表態高度評價民主，一改中共以往只搞經濟改革，閉口不談政治的畏縮態度，如果將之真正付諸實踐，中國大陸的改革局勢將為之一新。我們將以肯定的態度和欣慰的心情，盼待中共改革派領導人，向政治民主化方向，做出實際的行動。

與此相配合，五月一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三梯隊代表人物胡啓立，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一百周年的大會上發表講話，對馬克思主義的適用性作了靈活的解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對某些被實踐證明已經過時的或者已被實踐證明不完全正確的個別結論，要有勇氣突破。」胡啓立此番講話，等於對大陸理論界對於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突破，代表中共改革派領導人做了正面肯定。這場論戰，從八一年黑龍江省學者熊映梧文章打響，到今年三月轟動海

內外的「馬丁風波」，一共持續了五年。它為改革政策的繼續，為經濟發展進一步突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的框框，拓展了前進的道路。

在中國大陸這場經濟改革中，中共改革派原想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經營管理方式，以挽救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導致的全面經濟危機。政策推行了八年，在各方面、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同時出現了無法在「四個堅持」的禁錮下繼續推進的困局。經濟改革同樣是一場社會運動，必然要對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造成衝擊和影響。中國三十年來建立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正統意識形態、共產黨自己建立的龐大官僚體系，這一切都同這場改革有着根本上的不相容性，保守僵化的政治勢力更使得改革步履艱難、險灘重重。

去年年末，由於上述原因和城市改革遭遇的種種問題，使中共黨內以陳雲為首的守舊派尋機發難，企圖阻止改革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改革派由於「四個堅持」的束縛和懼怕民主運動的自身局限性，改革政策出現大幅度搖擺。改革能否延續和深入，要看能否突破舊政治制度和舊意識形態的束縛了。

鑒於這樣的困局，中共改革派中的某些有識之士已開始考慮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五月一日，「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聯合在「五·一」社論中發出呼籲：「工人階級要支持改革！」「投身於改革的洪流中去，是中國工人階級新的歷史使命。」社論還指出：「改革對不應應生產力發展的固有模式、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工人階級要更加自覺地站在改革的前列。不搞改革，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魯迅先生曾說：「在中國，挪動一下桌子都要流血。」那麼何況今日的改革呢？我們一貫認為，中國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如果不依靠和調動人民的力量，是絕難取得成功的。值得慶幸的是，中共改革派的有識之士已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下一步，就要看其實際行動了。

目前，世界民主潮流正蔚成大觀。一貫偏安島嶼、抱殘守缺的國民黨，已在島內公政會設立分會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出現了積極的起色。可以說，蔣經國先生在這件事上，使台灣向民主邁進了一步。曾與蔣經國前後留蘇的鄧小平先生，下一步就看你的了。只要你依靠人民的力量，把政治推向民主化，你必將得到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各政治派別以及各界人士的一致讚許和支持。這樣做，改革成功有望，現代化前途光明，統一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海峽兩岸來一個民主的競賽吧！

對台灣民主化而言，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
是歷史性的日子。這一天，國民黨與黨外人士
舉行團體溝通，達成一致協議：允許由黨外人士
組成的公政會合法設立分會。這是執政的國民
黨與黨外人士第一次團體對團體式的溝通。
公政會分會的設立，使黨外政治反對派的力量
進一步組織化，使黨外以團體形式監督執政黨
，並與執政黨進行政治競爭，突破了國民黨過
去與黨外人士個人競爭的局面，意義甚為深遠
。



台灣民主化

進程的新發展

這一進展，獲得各方、包括反國民黨人士
的一致讚許，說明了，民主是潮流，順之者必
獲人心，逆之者必失人心。

我們認為，五月十日的成就，不僅體現在
協議的達成上，而且體現在協議達成的形式上
，即政治上反對派別的互相承認、互相尊重和
理性溝通。

民主是人類社會迄今解決政治衝突的最好
方式。所謂「最好」，即衝突造成的損失最小
。無論執政者的政績多好，政治上總是有其反

對派，因為執政者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利益。
執政者如何對待反對派？這裏面臨兩個選擇：
一是壓制它、甚至想消滅它；二是承認它、尊
重它，使之與己公平競爭。

在前一種選擇下，反對派越壓，其反抗性
越強，社會矛盾越積越大，到一定程度，矛盾
總爆發，社會大動亂，人民受損失。承認、尊
重政治反對派，使其有言隨時發，有求隨時提
，執政者則不斷吸收反對派合理建議，調整自
己的施政方針。在民主社會，政治反對派的批

評聲浪、示威遊行接連不斷，矛盾不易積累，
可以化大震為小震，化大亂為小亂，社會處於
動態的安定之中，難以出現毀滅性的動亂局面
。

合法政治反對派的價值是巨大的。缺乏政
治反對派的監督與競爭，執政者往往有問題而
不自知，鑄小錯而成大錯，最後走向腐化的結
局。這就好像醫生難以自己診治自己的疾患一
樣，道理是再淺顯不過的。中共多年來整風不
斷，為什麼收效甚微？其原因也在於此：它自

己整不好自己。看看民主國家的政黨（如美國
的民主、共和兩黨），哪有像中共那樣成天大
規模整風的？但他們并不存在什麼所謂黨風的
問題，因為，任何一黨一旦出現了一點點敗壞
的「黨風」，另一個黨就猛烈抨擊、「幫」它
整掉了。如果說，台灣國民黨退居台灣取得一
些治蹟的話，黨外人士的監督作用功不可沒。
近些年來，台灣黨外力量已具規模，組黨
聲音一浪高於一浪。前些時日，國民黨與黨外
的衝突不斷昇級，黨外人士不顧後果，決心成
立公政會分會。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高層採
取開明政策，未以壓制，而是以開放民主解決
了衝突。這一成就，是黨外與國民黨開明派共
同努力取得的，我們向台灣兩派政治力量的理
性選擇致敬！

台灣政治反對派已進入理性競爭的新階段
。應該強調，反對派不是敵對派，敵對派以消
滅對方為目的，反對派則以互相監督、公平競
爭為宗旨。避免政治兩極化，正確對待反對派
，是我們中國人應該培養的政治概念。

台灣已經有了組織化較強的政治概念。
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高的民主形態。然而
，反對派還不是反對黨，台灣黨外的組織形式
有待進一步提昇。我們和黨內外有識之士一致
希望國民黨政府早日廢除戒嚴法，開放黨禁，
完成由權威主義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化。這就
是中國民聯二大關於台灣問題決議的精神。

與台灣比，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遠
遠落後了。不用說政治反對派，就連王希哲、
徐文立這樣溫和的、祇是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
解釋的人士，也不能容忍。要爭取合法反對人
士的存在，再爭取合法反對派的存在，大陸民
運人士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香港政黨政治的新突破

——祝賀「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成立

經過一、二年的醞釀，由多位政治活躍人士和多個政論團體組成的「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於最近宣告成立。它標明，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之際，香港人民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局面，發展民主政治運動，建立多黨政治體制，準備承擔「港人治港」的歷史重任，已全面積極行動起來，我們對「協進會」的成立致以熱烈的祝賀！我們期待「協進會」成立後，經過一段時期的學習民主運作、社會實踐，逐步積累經驗，不斷茁壯成長，對於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對於香港未來的前途，能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據該會發言人宣佈，該會的宗旨是「在中國主權下爭取港人高度自治，及爭取立法局實行直接選舉。」此外，該會還要在「爭取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同時，希望改善中下階層市民的生活。」這一宗旨實質上就是要在香港未來的變遷中，在承認中國主權下，排除任何方面的外來干預，爭取港人的高度自治權，實行香港的民主政治，這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條件。因為，既然未來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變，就要求有與此相應的政治架構，以促進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如果未來香港要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無相應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保證，那麼，香港的繁榮穩定就不可能繼續維持。

我們高興地看到，「協進會」的這一宗旨

，與中國民聯二大「對香港目前形勢的看法」（見「中國之春」一九八六年三月號）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在「對香港目前形勢的看法」中，我們就指出，為了爭取香港社會的持久安定繁榮，為了維持香港多元自由經濟制度的活力，實行法治是一個基本條件，中國民聯要在推動香港為建立多黨政治而努力。並預言：「中國民聯關於政治多元化的主張，很可能首先在香成為事實。」現在，這一預言竟然已逐漸成為事實。面對今後繁重、艱鉅的任務，我們希望香港各方面追求民主的力量加強聯繫，密切配合協作，互相取長補短，携起手來，為在香港建立多元化的民主政治經濟制度而共同努力！

在政治上，「協進會」倡導民主政治，爭取立法局實行直接選舉，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港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在香港建立多黨政治。因為，任何一個社會，在實行一黨政治制度下，不可避免地會走向專制獨裁。祇有實行多黨政治，不同黨派之間才能互相制衡和互相監督，避免一黨專制獨裁的情況發生。例如，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之間，日本自民黨內各大派系之間，都是由於有了對等的不同政治力量的互相競爭和互相制衡，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才得以維持。目前，「協進會」還是個準政黨的組織，我們期望著她向政黨的高級組織飛越。

在經濟上，「協進會」主張使社會資源作更合理的分配，改善中下階層市民的生活，使各階層分享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為此，香港必須保持多元化的自由經濟制度。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經濟的飛躍發展和突出成就，與香港作為一個世界自由貿易港，與香港實行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制度息息相關。今後，要保持香港經濟的繁榮、穩定與發展，也祇有實行多元化的自由經濟制度，使各種經濟成分、各種經濟力量在平等交換的原則下互相競爭，合理分配社會資源，才能保持生機與活力。而以國營經濟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大陸實踐三十多年的結果，許多事實充分說明，是產生「鐵飯碗」、「吃大鍋飯」、「經濟效率低」以及其他許多弊病的經濟根源，因而是不足取的。未來香港經濟的發展，要防止中國大陸國營經濟的逐步滲入而支配香港經濟的發展，逐漸改變香港多元化自由經濟的情況，要預先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

香港在未來十二年的過渡時期，將充滿著中共干涉和香港人民反干涉的鬥爭，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制度及其對香港事務的干涉，是香港人民擔心香港能否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因素。因此，祇要中國大陸現行的專制政治制度不變，香港的民主政治就沒有持久的保證，就暫時會出現動亂的可能。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是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成立，標誌著在民主政治的園圃裏，又增添了一枝鮮艷的花朵，讓我們精心培育它、澆灌它，使它茁壯成長。在民主政治的百花園中，我們的態度是，成功不必在我，任何民主化的趨向，我們都堅決支持。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六年七月號總三十七期·六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六年七月號總三十七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 3 ▲ 鼓勵改革派進行政治大突破
- 4 ▲ 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新發展
- 5 ▲ 香港政黨政治的新突破

讀者·作者·編者

- 8 ▲ 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成熟無限專政·給江超明先生的一封信·給江超明先生信的補充·為何不反共?
· 根子在那裏?
胡務實等

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

- 11 ▲ 問答：J1簽證如何留居美國?
(中國大陸留學生) 魏中民

向海峽兩岸建言

- 12 ▲ 體制改革的關鍵在於發展私有制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林秦俠
- 50 ▲ 破縱連橫，調動經濟自身活力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馳遠
- 13 ▲ 截江築壩發電聲中一個未為人所注意的問題
(香港) 戴重鈞

- 17 ▲ 台灣兩岸間接貿易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涵義
(台灣留美研究生) 鄭威旺

- 23 ▲ 中共應從支持馬科斯事件中總結教訓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慎之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 24 ▲ 誰勝誰負：中共高層鄧·陳派系實力總分析
(北京) 董旭生

專論

- 29 ▲ 論中共改革派的處境、作為和出路
(中國民聯) 王炳章
- 37 ▲ 中國民主社會的先鋒——貪官與奸商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黃洵

人權論壇

- 42 ▲ 中國大陸的強迫墮胎和戮嬰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加拿大) 鮑福

本期專題「經濟決定論」研討

- 45 ▲ 致中國之春的一封信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于世濟
- 45 ▲ 中國之春編輯部的公開覆信
(中國之春編輯部)
- 46 ▲ 楊力宇教授：政治、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現代化必須齊頭並進
(本刊記者) 楊漫克

編者的話

改革，是當前的頭等大事。在改革聲中，出現了兩種值得注意的論調：

(一)經濟搞上去了，才能進一步爭取民主；

(二)應該全力支持改革派，不要搞什麼民主運動給改革派製造麻煩。

本期組織了對「經濟決定論」的研討，並發表了專論文章，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鄧小平、陳雲年事已高，他們百年之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一直為海內外關注。本期董旭生論述鄧陳兩派實力的文章，或許會給讀者一些啟發，也值得研究中國大陸政情的人士注意。

徐文立發表「我的申辯」後，遭到殘酷迫害，我們呼籲海內外人士給予聲援。

香港作家寒山碧的著作「鄧小平評傳」，曾獲各界讀者的注意。他最近開始寫「鄧小平評傳」的「續篇」，並將在我刊連載。

下期預告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除提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個大字外，還力倡「多元」觀念。什麼是「多元論」的涵義？它對當今中國的走向及民運的發展有何指導意義？下期將推出多元論專題予以討論。

據估計，中國目前城鎮待業青年及初、高中畢業、或即將畢業而無法安排工作的青年，將達數千萬之眾。如何安置這個失業大軍？鄧小平最近制訂了一項「高明」策略。要知其底細，請閱下期。

51 ▲齊錫生教授：經濟與政治：一把剪刀的兩個鋒刃

(本刊記者) 馳 遠

55 ▲高英茂教授：改革的關鍵在於突破政治束縛

(本刊記者) 林秦俠

59 ▲略談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民主之關係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黎 音

61 ▲當今是經濟立國時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桑 羊

民運報導

64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2 ▲徐文立獄中遭受殘酷迫害 妻女呼籲國際聲援

民運論壇

66 ▲就「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一文回應的回應

(香港) 今之鳴

特稿

68 ▲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中國大陸作家·西德) 遇羅錦

69 ▲就遇羅錦政治庇護再答客問 (西德) 黃鳳祝

國內快訊

71 ▲東隅已失·桑榆未晚——評左中右獨一致喝采的國共交機談判

(本刊評論員) 楊漫克

72 ▲我看兩航談判事件 (華僑·美國) 周立仁

73 ▲不同黨派是否能榮辱與共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趙繼康

75 ▲從我們工廠的現狀看改革的前景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洲) 王愛華

41 ▲一項公開的民意測驗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帥晴霞

台灣專欄

78 ▲修正屠隨筆 (旅美作家·台灣) 阿修伯

80 ▲對「大中華邦聯」的一點看法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黎 民

人物評傳

82 ▲鄧小平在「反右」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香港) 寒山碧

留學生園地

86 ▲列寧格勒，你給了我什麼? (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 伍石村

87 ▲忠誠何價? (中國大陸留學生·舊金山) 黃 蕪

文藝園地

88 ▲女人 (小說) (美國) 張 源 79 ▲無 題 (詩) (美國) 艾 菲

90 ▲生死存亡的年代 (小說)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趙繼康

77 ▲我們需要魯迅 (中國大陸留學生·新西蘭) 孤 子



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貴刊今年六月號（總卅六期）社論第二篇中有些錯誤：

第一，第三段中，「解放前」上海黃浦公園的警告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話有些問題。首先，作者指的應是黃浦江邊的外灘公園；筆者在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上海租界裏唸了三年高中，那時幾乎每天都早上都進外灘公園看書，並沒有見過這塊牌；其次，這塊牌應是北伐還未開始，中國還是一個地理名詞之時掛上去的，而且掛的時間大約不久。

第二，該文第四段謂：「共產黨解放上海時，曾將這塊牌砸碎」一語也有些不妥。在抗戰還未結束前，英美已主動放棄在華特權，包括租界。事實上，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已開入租界，而國民黨是從日本人手中接收上海的。換言之，上海早已沒有洋人。國民黨即使罪大惡極，也不至於讓這牌掛着，連自己也進不了外灘公園。

旅美華裔學者 胡務實手啟

我們收到數封類似胡務實先生的來函，指出國民黨時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已不復存在。有趣的是，這些信函都是年紀較大的華僑寫來的，年輕的大陸留學生無一函指出這一問題。我們這些在五星紅旗下長大的青年，從小接受共產黨的國民黨如何如何賣國的宣傳，的確相信某些共產黨官員所講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一直掛到「解放」時。可見，在我們頭腦中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還需要一番努力。

感謝各位僑胞指出我們的錯誤。
『中國之春』編輯部

成熟的無限專政

看了貴刊第三十五期上休士頓讀者代文的來信及普深桑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民聯常委張俠的「敬答」之後，本人不免有些感想，欲借貴刊一端與大家商榷。

代文先生的來信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究竟有沒有「理性專政」這一概念？原先最早用這個字眼的作者董旭生、楚青原兩君遠在「竹幕」之後的中國大陸，一時恐怕很難出來作答。張俠教授的「敬答」，其實只是「代答」而已，然而讀完張教授的「敬答」，我似乎覺得代文先生的問題並未得到解答，而只是引出了對「理性」一詞的兩種解釋。

本人以為，文字一物，從不排斥創新，但主要價值則在於「約定俗成」，為一個不確切的用詞而着力辯護，似乎是不可取的。「理性

」一詞，內涵及外延都相當穩定，猶如「民主」一詞一樣，似乎是經不起這麼折騰的。重開董、楚兩君的原文，發覺也只是「姑且名之」而已，其實依董、楚兩君文中所用譬喻，即使改一字為「彈性專政」亦無不可。同是在第三十五期中，張教授另有一文「中國民主之前途」，內中對同一事物用了另一個詞，即「成熟的無限專政」。其實這一提法比董、楚兩君原來所用的詞要妥切得多，至少找不出歧義。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固執一詞而不及時修正呢？

密西西比河西一讀者布衣謹上

給江超明先生的一封信

江超明先生：

看了你的大作「不要對共產黨採取敵視態度」（卅五期），不但不敢恭維簡直令人反感，不難估計你老弟一定是一位特殊材料做成的專門統治別人永遠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共產黨員——才會寫出這種自說自話的文章。

中春已出了三年，成不成氣候有目共睹，套一句老毛的名言：「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若一定要根據你老弟的指點改變對共產黨敵視態度，再增加一些如何在美求職、非法打工會遇到什麼問題，介紹什麼叫股票，如何挑選舊汽車等內容，索性就更改一個刊名，叫做「中國大陸留學生月刊」了。一定要加大陸二個字，因為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的中國留學生是不需要這些起碼的常識的。

如果中春是你老弟所說的潑婦罵街式的末流刊物，這一期三位學有專長名聞世界的教授余英時、唐德剛、楊力宇他們就不會參加中春

的專題討論了。

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共產黨似乎並不那麼可怕，可是與自由世界美、英、德（西德而不是東德）、趙紫陽訪問的也是西德而不是東德）等國比較，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你老弟三、四十年所見所聞還不具備說服海外華人的學養，你還年輕，多看看這個自由世界，你就會覺得你自己的視野還是長期受了條條框框的影響，不識大體。

希望你

想自己也想想別人

晨全中於夏威夷

給江超明先生信的補充

敵視共產黨並不表示敵視祖國，正像香港一般居民所說，我們愛國，但是並沒有愛共產黨的義務，所以鄧小平表示一九九七收回香港以後，香港人還可以罵共產黨。共產黨並不能代表中國，何況中國還未統一。

今天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也不見得每一位都是跟你一樣的共產黨員，那麼你所提的兒子不嫌母醜不倫不類的比喻就更難令人心服了。

所以我懷疑你老弟祇是中國留學生當中一部份特權階級，豈能代表大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自拉自唱。

晨全中又及

讓徐文立來回答

看到中春卅五期九十五頁江超明「不要對共產黨採取敵對態度」一文。其中寫道「如貴刊八六年二月號，第卅二期，第卅四頁『國內出現了萬人坑和販賣人口』一文，讀後不知你們的政治觀點是什麼。反對計劃生育？不像！反對共產黨？不對呀，共產黨也認為這種事是犯罪活動，查出後要嚴辦的」。

我認為那篇文章不是反對計劃生育，而是說明「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執政三十年，從獎勵人口，到摧殘婦女和將要出生的嬰兒的悲慘事實。在農村親眼目睹的人們，只會感到說的還不夠，絕無「再加上點佐料」的地方。「你們不要把大陸發生的一切壞事都推到共產黨身上」。真奇怪，共產黨執政，而且是共產黨一手造成的事實，推給誰呢？無論如何這兩件事推不到「國民黨反動派」身上去吧？！「共產黨也認為這種事是犯罪活動，查出後要嚴辦的」。那麼，海南島出現的投機倒把、軍用飛機和軍艦走私販運，幼兒園也倒賣汽車，都是共產黨自己查出來，發表的，就應該說共產黨敢於揭露自己錯誤，敢於改正錯誤。這是共產黨「偉大」之所在，可是倒楣的總是廣大人民！

至於要不要敵視共產黨？最好由徐文立回答這個問題。中共「統一中國」的口號震動了全世界，徐文立想（並未形成事實）成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却成了判罪證據。相信你們比我知道的更詳細。

王法堯於澳洲

為何不反共？

民聯提出了四大目標，却又不反共，實在令人費解。現在，更提出了新的階段策略，要為中共之改革，提供具體的建言，以幫助中共的四化落實。如此一來，你們只不過變成了共產黨的一個新改革派而已，說得輕鬆點，你們是在為行將死亡的中共，注射延命的高蛋白。說得難聽些，你們成了壓迫同胞的幫兇！「反共」，是為全體同胞求解放，唯有剷除暴政，中國才有新生之機。反共絕對不是國民黨的專利。標示出反共的大旗，絕不等於附尾國民黨。海內外同胞中，反共而非國民黨的人很多，你們却自劃清界限，失去大量群眾的同情與支持，使民聯的色彩不明。我有些朋友，甚至懷疑民聯是中共的一種策略運用，吸引一部份海外華人，以減少反共的力量，再引導這部份群眾，在不知不覺中，為中共作出貢獻，是一種一石二鳥的高招。化阻力為助力的謀術。

我個人並不同意這看法，我認為你們只是出來不久，一時尚未脫出共產黨的長期思想訓練，反共就是國民黨，反共就是不愛國，二分法的毒素一時未除而已，一聽到反共，心裏立即怕怕，趕快劃清界線的一套馬上出來了。任何運動、組織，沒有鮮明的旗幟，就無以團結人心，其前途也就有量了，我相信你們決不是只求在政協謀一席之地吧？即祝

編安

歐西勒於美國

根子在那裏？

讀了中春卅四期，我有一點感想。

劉賓雁先生和他的「第二種忠誠」中的兩位主人公，都是「無限忠於人民民主事業的共

產黨人」(借用共產黨語言)。但這種人不但
不見容於毛澤東和四人幫，也不能在毛死、四
垮多年後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抬頭。我們
除了向他們表示無限同情和支持外，更應當開
動腦筋，多加深思：這是為什麼？根子在哪裏
？

讀者劉安第(台灣新移民)

賊喊捉賊

對於這些年來大陸連接不斷發生的學生運
動以及民衆的民主運動，中共輿論工具概以「
搞文革那一套」「破壞安定團結」為帽子、棍
子，加以殘酷鎮壓。這完全是賊喊捉賊。儘管
文革產生的歷史背景是複雜的，但大多數人捲
入這場浩劫，成了犧牲品，就是因為長期的「
第一種忠誠」的 BRAIN-WASH，這種狂熱和愚
忠，使偉大領袖的一句「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中
國重演了一幕戰前納粹德國的悲劇。在文革二
十年後的今天，如何評論文革，防止文革的悲
劇重演的歷史使命該由誰來承擔呢？中共當局
雖然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但對產生文革的土
壤——封建專制是不敢也不願觸動的，這就是
保守派們對「第二種忠誠」大施伐撻的原因了
。而且時間已過二十年，現在有許多年輕人並
不真正瞭解文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尤其是
文革前後出生的年輕人)。建議：中國民聯是
否可在海外搞個文革實物展覽，以募捐、借覽
等方式，展出當時的實物、照片、宣傳畫、毛
語錄、像章、紀念郵票等，(我本人也願意提

供一些)在海外幾個大城市巡迴，相信會收到
一定的效果。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莊生於賓州

李玉挖了馬克思的根

卅五期中國之春發表的政論家李玉的文章
「歷史的脚印」，深入淺出，我們這裏的留學
生一致叫好！希中國之春今後多發表這樣的宏
文。

李玉的文章，把馬克思主義的根基挖空了
，使人深感共產黨集權主義的荒謬。

這裏，我想補充一點，請教於李先生。這
一點就是，誰創造了新的社會形態？誰埋葬了
舊社會？

奴隸社會原先分成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
。然而，站起來埋葬舊社會、創造新社會(封
建社會)的，既不是奴隸主階級，也不是奴隸
階級，而是新生的另外階級——封建主階級和
農民階級。

同理，封建社會分成封建主階級和農民階
級，然而，站起來埋葬舊制度、創造新社會(資
本主義社會)的，既不是封建主階級，也不
是農民階級，而是封建社會中新生長出來的資產
階級和無產階級。

同理，資本主義社會分成資產階級和無產
階級，使古典資本主義結束的，既不是原有的
資產階級，也不是原有的無產階級，而是新生
的中產階級——他們將創造社會主義。

馬克思為創造新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
，却動員了資本主義社會舊有的階級——無產
階級，完全違背了社會衍變的規律。其邏輯就

像用奴隸階級消滅奴隸社會，用農民階級消滅
封建社會一樣荒謬。

可是，歷史已證明完全荒謬的外國理論，
我們那些共產黨官僚們仍死抱住不放！

(中國大陸留學生) 彭懷亭於賓州

為王策的文章叫好

中春卅五期王策的大作「為實現中國文化
由一元向多元的轉化而努力」，文章雖長，但
讀起來很有味道。這篇文章，將在中國民運思
想發展史上留下痕跡，值得大力推荐。

查王策先生為中國民聯總部委員會委員(見中春卅三期)，我真為中國民運得此理論人
才而欣慰。相信王策先生還年輕，盼他再接再
勵，為民運的理論建設多做貢獻。王策的文章
是近年海內外理論界中的佼佼者，誰敢說中國
之春的理论水平低？

(大陸訪問學者) 章之祺於歐洲

請開闢評毛專欄

是否開闢一個評毛的專欄，每期均刊出一
些短小、精辟的文章，揭露其言論與實際不相
符(甚至背道而馳!)的虛偽本質。

中共至今不能從毛的教條桎梏中解放出來
，意味着「四人幫」(即五人幫)那一套早晚
仍會在大陸重演，實非數億人民之福！

深入評毛，此其時矣。海外應起帶頭作用。

加州一讀者振鳴謹識



J-1 簽證 如何留在美國

問：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公費留學生，持J-1簽證。聽說持J-1簽證的學生，畢業後不能在美國申請工作，取得永久居留身份（綠卡）。請問這種說法是否確切？如果的確如此，怎樣才能改變我的簽證或採取其它補救措施？

答：這種說法并不十分確切，因為有的持J-1簽證的外國學生，畢業後也在美國找到了工作，後來也得到了永久居留權。但J-1簽證與正式的學生簽證（F-1簽證或M-1簽證）的確是有區別的。J-1簽證的正式名稱是交換訪問者（EXCHANGE VISITERS）簽證，取得簽證的IAP-66表由美國國際交流總署USIA頒發。而學生簽證的I-20表，則由移民局（INS）頒發的。J-1簽證雖然不是正式的學生簽證，但其頒發的對象也包括學生，因為與國際交流總署的工作目標有關。為了加強「國際交流」，持J-1簽證的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自然是不值得鼓勵的。因此，在IAP-66表的左下角有一個欄目（PART II），供頒發簽證的領事館官員註明該入境者在改變簽證狀態（VISA STATUS）之前是否必須回到原來的國家住滿兩年。因此，如果你的IAP-66表上沒有此項限定，你就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根據任何正當的理由申請改變簽證狀態（例如由訪問學者改為學生）；也可以在畢業後申請實習工作（PRACTICAL TRAINING）；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也可以申請改為H-1簽證（專門人才簽證），繼而申請勞工證，最後取得永久居留身份。

但是，如果你的IAP-66表上註明你必須先回國兩年，你在尋找實習工作的部門時，就會感到特別困難，實習期間也難以將簽證改為H-1，申請勞工證及永久居留身份就更談不上了。因此，對於已被限定畢業後要先回國兩年的外國學生來說，如何解除這一定限就變得極其重要了。

根據移民法專家HOWARD D. DEUTSCH提供的資料，這一定限祇有在以下四種情況下才有可能解除：

一、如有一美國政府機構為你提出正式申請，並得到美國國務院的建議。

二、如果你的配偶或子女是美國公民或具有永久居留身份，而你離開美國會給他們帶來特殊的困難。

三、一旦你回到原先的國家就會遭到迫害。

四、如果你能從自己的政府那裏得到一份書面證明，表明不反對你不回國兩年，而且美國國務院在與你的擔保機構（AGENCY SPONSORING YOUR PROGRAM）磋商後也樂於建議解除這一定限。

從中國大陸來的持J-1簽證的學生（不管是自費還是公派）中，一旦IAP-66表上註明要回國兩年，要通過上述情形申請解除恐并不容易。其中第四點需要特殊的「門路」，非常人可得；第一、二兩點條件的人不會很多；第三點，好像人人有份（「劫後餘生」嘛！），但真的做起來，却非得有憑有據才有希望成功。『中國之春』總第十六期上刊登的許東民律師的文章「有關在美尋求政治庇護問答」，相當詳盡地提供了這方面的知識。另外，『中國之春』總第二十七期上有關留學生王思蜀取得政治庇護的報導及總第二十八期上讀者高康的來信也是很有啟發性的（需要的讀者可向『中國之春』編輯部函索這些文章的複印件）。

根據移民法，美國領事館核發簽證的官員及入境口岸的移民局官員，祇給下列三種對象加註畢業後回國兩年的限制：①其求學期間的費用，部份或全部來自本國政府機構或美國政府機構；②其所學得的技能為本國所短缺；③來美國接受醫學方面的研究生教育或訓練。來信的同學其實并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情形，筆者認為他或許可以延請有經驗的律師，根據一九七四年通過的關於個人隱私的法令（THE PRIVACY ACT OF 1974）向移民局索取自己的檔案的副本，並提出更正的要求。如能獲准，對日後改變簽證身份及申請移民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另外，從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或訪問學者，所持的簽證都祇是一次有效的。因此，暫時離開美國，然後重新申請簽證也不失為改變原有簽證的一種途徑。按照慣例，美國領事館核發簽證的官員對因原來的簽證已經失效而提出的重新申請，是要從頭開始另作考慮的。因此，也許會有機會改變原有的簽證。但有意取得永久居留身份的讀者應該注意，到第三國重新申請（如果第三國是加拿大或墨西哥，需住滿三十天以上）要比回中國大陸申請來得安全，另外領事館的官員在核發簽證時的主觀判斷是一個很大的未知因素，徒勞往返也是很有可能的。

歡迎其他讀者介紹經驗。

（魏中民答）

體制改革關鍵在於發展私有制

——趙紫陽醞釀新的突破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林秦俠

繼「馬丁風波」之後不久，大陸經濟理論界又有人出來冒險突破，向公有制這個禁區開刀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厲以寧最近在大陸「經濟參考」上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與否，取決於所有制的改革，而不是價格改革。」

厲以寧教授是五十年代初北大畢業生，主要研究西方經濟思想史，著述甚豐。五七年亦難逃右派羅網。厲教授近年來思想突進，是趙紫陽總理推行經濟改革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與胡啟立書記亦有同窗之交（胡啟立當時為北大學生會主席）。故筆者認為，厲教授此次出面突破，有很強的政治背景在裏面。熟悉中國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旦輿論揚出，必有重大改革舉動隨之出現。

厲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真正的自負盈虧的公有制企業（受政治環境所限，還要用「公有制」一詞），企

業不僅要享受獲利的好處，更要負擔虧損的後果。」這種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公有制的弊病所在——不能自負盈虧，職工沒有生產積極性。即便在美國也是如此：美國的郵電系統是國有的，服務質量堪稱美國第一糟糕。自負盈虧，自然割斷了國家與企業的實質性聯繫，轉變成集體性質的企業（大陸以往祇有集體所有制企業要自負盈虧），國家從財政上放手不管。

那麼，如何由國家補貼維持生存的國有企業變成自負盈虧的企業呢？厲教授開了一劑靈藥，就是企業主權股份化！厲文指出：「股份化主要不是指股票賣給職工或個人所有（用語很藝術，見下文分析），而主要是指各種所有者之間按股分紅。」這是調動經濟活力的關鍵。按股分紅，把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所有者的切身經濟利益聯繫起來，何愁沒有積極性？如果今後的經濟體制改革真能做到這一點，那麼中

國之經濟體制改革才叫見了真章！改革有望矣！中國有望矣！

然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除了國家這個大股東（又是沒有錢的大股東）外，誰來入股呢？國營企業資本，動輒就是幾百萬、幾千萬，談何容易？厲教授在文章中也承認：「投資有關各方（中央、地方、部門等）投入擴大再生產資金的企業本身以及職工各人（在中國目前條件下，比重不可能太大）都成為股東，在此基礎上建立董事會，形成可以改變企業行為、決定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的決策機構。」

從前文的「主要不是指股票賣給職工或各人所有」，和這段的「在目前的條件下」職工各人股份「比重不可能太大」，看得出厲教授欲言又止的一個重要概念——股份私人化，也即私有制。企業股份化，必然要股票公開化，誰有錢，誰來買。全讓國家來買（中央、地方、部門都是國家機關），豈不是有「股」沒「份」，和原來一樣？祇有實行私有制自由經濟，才能使中國的經濟繁榮，這已是明擺着的事實。

其實，世界銀行早在前幾年就向中國政府開出了「企業股票化」的藥方，但未能得到採納。問題的關鍵是，中國雖無「中間大」（中產階級），確有「兩頭小」，就是國家與個人都沒錢。個把萬元戶，還成不了大氣候。怎麼辦？很簡單，發展私有制，要有鄧小平當年提出「白貓黑貓論」的勇氣，破除意識形態教條，讓個人富起來。否則，股份化免談！體制改革免談！國家富強免談！

最後聲明，在中國現實政治條件下，厲教授說話要「講藝術」，筆者全無責怪之意。直言不諱地講私有制，惹來「左鬼」纏身，可不是鬧着玩的！

截江築壩發電聲中一個未為人

所注意的問題

(香港) 戴重鈞

中共「截斷長江三峽水流築壩發電」的大計劃，近日甚囂塵上，據說中共副總理李鵬與美國政府代表團秘密洽商當中的問題已經不止一次，似有事在必行的趨勢。國內外人士以至國際學者，頗多質疑的意見，大都毀多於譽：正面說的，認為破壞生態平衡，忽視水患；淹沒良田居民，以百萬計大量移民，勞民傷財。側面說的，則視計劃對於發電、防洪、航運均非其道；實際上政治的作用大，經濟民生的作用小。據云：美國專家認為要達到中共這程度的發電供電要求，儘有不少其他途徑可行，既節省投資，更減少後患顧慮。（見香港「明報月刊」二四三期鄭竹園「中共截江築壩得失的探討」）然而按諸中共三、四十年來好大喜功、一意孤行的作風，最後能否順應民情、接納民意，幡然圖改？似屬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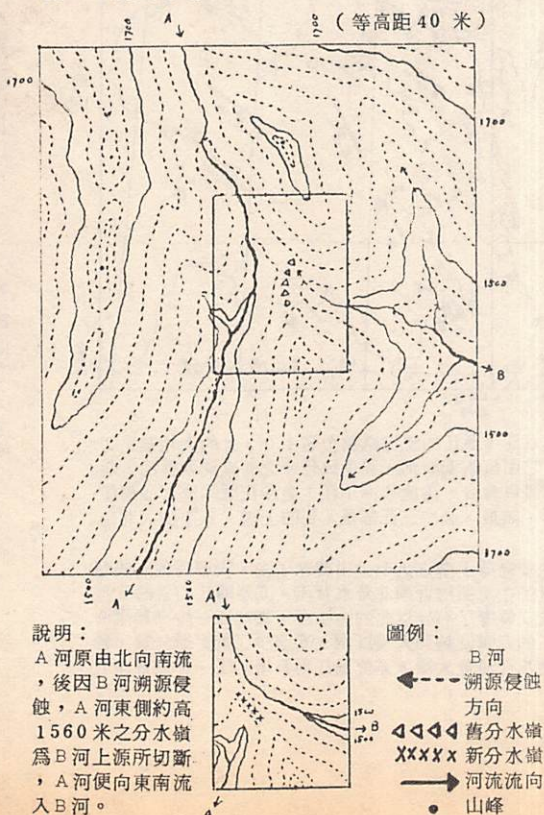
討論聲中，有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似尚未為人所提出。地理學上的問題往往是長時間的慢性現象，其不易為世人所察覺者亦往往由於它屬性變遷。然而破壞生態平衡的人為措施，則更往往由於地理現象之慢性變遷不為世人注意之所致。筆者不揣謬陋，試為提出，不敢謂為發聾振聵，欲以就教於國人耳。

× × × × × × × ×

我國西南邊區年降水量一般都在一千至二千毫米之間。（參閱香港天地版陳正祥「中國地理圖集」及台灣國防研究院「中華民國大地圖集」第五冊）根據北京地圖出版社八四年版「中國自然地理圖集」，該地區由南至北的年降水量為：景洪一二二一毫米，河口一七六四毫米，瀾西一六三一毫米，昆明九九二毫米，興仁一三〇一毫米，大理一〇八八毫米，麗江九五三毫米，西昌一〇四三毫米，雅安一八〇五毫米；這雖不能算作多雨區，然亦已算雨量充足。此一北起青海巴顏喀拉山南坡、南至滇西中緬邊界之地帶，通稱之為橫斷地帶，北為青康滇縱谷，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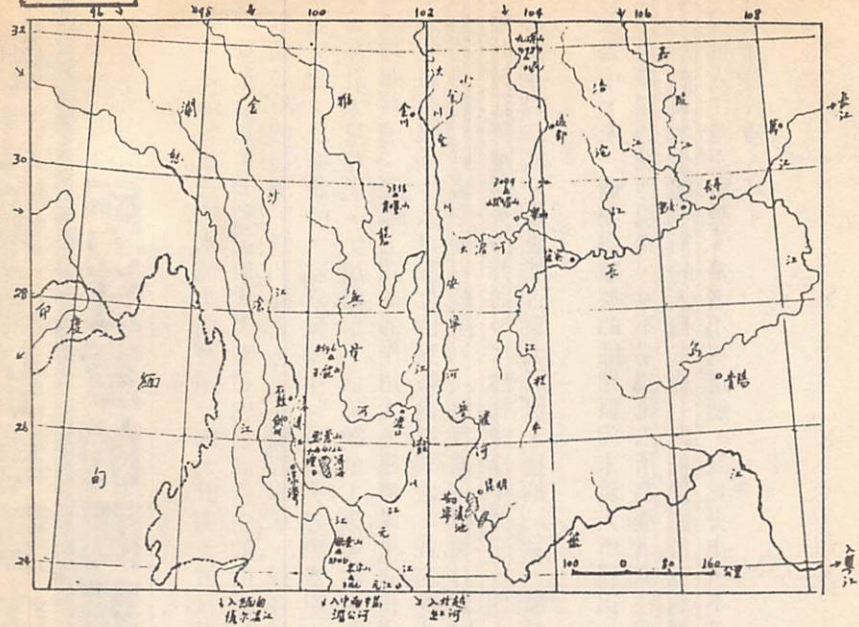
滇西縱谷。地勢北高南低，大量水流集中在這狹長地帶，向南切成無數南北走向的並列縱谷；每一縱谷兩側都是高山，構成落差二千米以上的高山深谷相間。這些河道上源都不斷向北伸展，河源日遠，這就是地理學上所謂「溯源侵蝕」。

圖一：河川爭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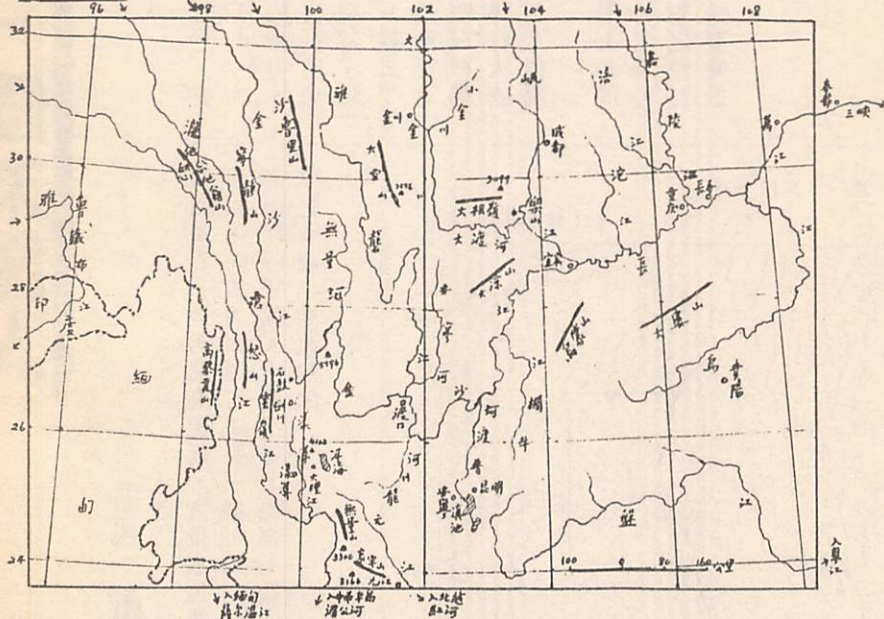


一般河流都發源於較高地區。此地各河河源海拔已相當高，相對的這些河道上源的分水嶺就不見得很高了。經過長時間的溯源侵蝕，分水嶺被切斷，分水嶺另一邊水位較高的水流就迅速接上，灌入襲奪河，成為襲奪河的上游。切口兩側逐漸堆積，不久又成為兩道與原分水嶺大致垂直走向的新分水嶺。這樣的一種自然現象，地理學上名之為「河川爭奪」。（參閱圖一）

圖二：
A、古代：



B、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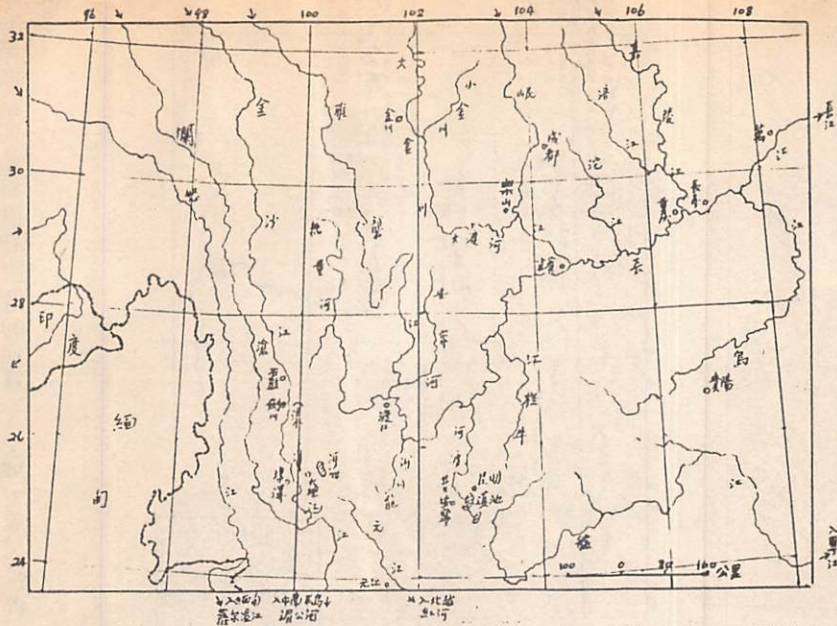
- (1)金沙江原非長江源流，長江古源流為岷江，長江的支流原都不逾103E的大相嶺。(2)大相嶺以西的大小金川原非長江水系，它南流入安寧河，再南流經今之普渡河入盤江，隨盤江東流入粵江。(3)雅羅江無量河原在渡口會合，南流入詞川江；金沙江原南流入漾濞江與龍川江在大理以南會合入元江。雅羅、無量、金沙三江都是元江的上游，東南流入北越，注東京灣。
- (4)岷江支流的大渡河向西溯源侵蝕，把安寧河上游之大小金川襲奪了去。安寧河則與雅羅江合流東向；普渡河成了倒流河，與盤江在昆明附近南北分水背流。(5)雅羅江西邊的支流向西溯源侵蝕，襲奪了無量河，再向西又襲奪了石鼓以北的金沙江。漾濞江一段則為瀾滄江所襲奪；龍川江也成了倒流河。元江的源頭便縮到大理以南。(6)金沙江折東與無量、雅羅、龍川諸河會合向宜賓東流，不特使長江流量大增，亦使長江河長增加了一千三百多公里。

這一北起青海南部、南至滇西的縱谷，是隨青康藏高原之隆起，帶動而成的地形，地質年代較新。縱谷裏的河流都屬幼年河，河床一直在繼續發育中，下切力與溯源侵蝕都旺盛，因而上源互相襲奪之發展亦盛。過去的水流系統：大小金川原屬安寧河的上源，安寧河經普渡河南流入盤江，亦即南盤江的上源。今則大小金川變為大渡河的支流，隨大渡河東入岷江，由粵江水系變為長江水系了。安寧河則為西面的雅羅江所襲奪，隨雅羅江入金沙江；普渡河更由自北南流變為自南北流的倒流河

，與南盤江分別以滇東烏蒙山的南北麓為河源了。(參閱圖二A B)
金沙江原向南流入漾濞江的，雅羅江則南流入龍川江，兩江會為元江的上游；再東南流，為富良江(即紅河)入東京灣(今名北部灣)。現在則金沙江從石鼓東折，挾雅羅江向宜賓流去，成為長江的源流。龍川江亦由自北南流變為自南北流的倒流河，成為石鼓以下金沙江的支流；漾濞江一段也為西邊的瀾滄江所襲奪，南流入中南半島。元江的源頭已經縮到洱海以南了。(參閱圖二A B)

長江的源流原是岷江，「禹貢」就說過「岷山導江」。當年黃河上源止於青海湖以南的鄂拉山（禹貢也有「導河積石」之句），今之積石山以西一段黃河源流實為昔日的岷江源流；由於黃河的溯源侵蝕，把岷江積石以上的一段襲奪了去，「禹貢」說的無非河川爭奪前的景觀。（禹貢為戰國時作品，黃河之襲奪岷源，當然不會遲至東周時代，但這顯

圖三：可能的未來



如果三峽束水以後，長江宜洩的流量被人為限制，石鼓至重慶一段河牀日淺；一旦漾濞江的溯源侵蝕，把劍川石鼓間的分水嶺切斷，金沙江就會轉向南流，隨瀾滄江入湄公河。那時雅羅江就成為長江的源流，長江的河長就至少短了七百公里，長江的流量也減少了三分之一。

然有其古代地理景觀的民間傳說作為根據。）那時長江從西面來的支流，河源都不逾東經一零三度的大相嶺。後來從大涼山那邊來的支流向西溯源侵蝕，逐漸把從西北南下的雅羅江襲奪了去，再向西，便遇到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大黑山與海拔五千六百米的玉龍山，逼它的溯源侵蝕折向北行，便在石鼓附近切破了金沙江東側的分水嶺，把金沙江也襲奪了去，長江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丟了岷江上游一段，得回更長的金沙江，使河長增加了一千三百公里，造成這條浩瀚的世界第三大河。我們不妨想想：要是東邊的三峽不能宣洩這麼大的流量，把瀾滄江之東大片土地的降水量都容納了，金沙江是不是還要向南流經中南半島出海呢？（參閱圖二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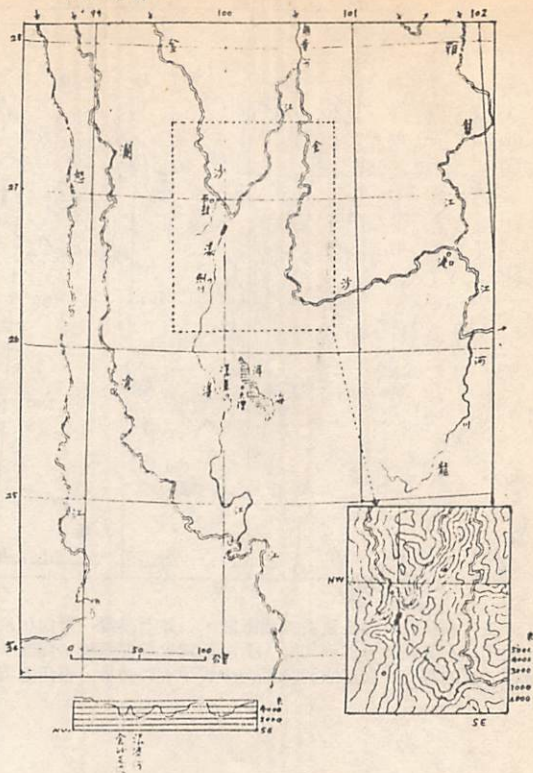
截江築壩以後，壩西水位據說要增高一百五十米至一百八十米，沿江各縣被淹沒的，上溯至距重慶不足八十公里的長壽。這麼一來，重慶（海拔二百九十九米）以西的水流速度就大大減弱了。石鼓以下的金沙江落差本已漸減，流速減弱，從源流帶下來的「河流泥沙」便由懸移變為推移，沉澱力增大，兩岸的沖刷力也相應減弱。換言之，石鼓至宜賓這一段金沙江的河牀將必日漸淤淺。而西南方隔著雞足山與老君山的漾濞江，其溯源侵蝕程度不會改變。那麼，有一天石鼓劍川間的低矮分水嶺為漾濞江的溯源侵蝕所切斷，金沙江就重回到漾濞江的「懷抱」，隨漾濞江入瀾滄，成為中南半島湄公河的上游，留下雅羅江作為長江的源流；這就使長江的河長至少短了七百公里。（參閱圖三）

現屬金沙江流域的石鼓與現屬漾濞江流域的劍川，南北相去約為六十公里，兩地從分水嶺流下來的溪澗，其源頭相距更不足十公里。（參閱台灣國防研究院「中華民國大地圖集」第四冊二百五十萬分一圖及北京地圖出版社「中國分省地圖集」六百萬分一圖）這十公里距離的低矮分水嶺讓漾濞江進行溯源侵蝕，要多少時間才能把它打通？這只要在該地搜集幾十個具有代表性的侵蝕樣本，就可以計算出來，並不是怎樣難以辦到的事。那麼，三峽束水發電大計完成之日，西南地區地理景觀如何改變，就可以拭目以待了。（參閱圖四）

水庫設計是以長江現在的水流量作為根據的，設若金沙江改道南流，經中南半島入南中國海，長江每年的總流量就要減少約三分之一。（筆者手頭沒有金沙江每年總流量的數字，姑以中共發表「與金沙江上

半平行、流域面積約與石鼓以上的金沙江相等」的瀾滄江資料作比較：瀾滄江河口的徑流總量為七四二五〇億立方米，長江徑流總量為九九三三五億立方米，兩者一比十三。且不說河牀日淺影響水庫的壽命；水庫的儲水量要是與原初設計的預算不相符，這又是否須有一番補救工夫呢？

圖四：石鼓劍川間的低矮分水嶺為漾濞江的湖源侵蝕所切斷的地形圖。



人定勝天這個觀念似乎是本世紀初文明社會的共同信仰；五十年代開始，生態平衡的觀念就逐漸介入人類思想裏了；到了八十年代，似乎任何人類的作為都得接受生態學的訊息，重視生態學的警示。這並不等於對人類智慧的否定；實在是人類文明的昇華。中共目前執掌實權的核心理人物除去那些土草包不談，其中曾在早年受過正規教育的，經過「勝利沖昏了頭腦」、長期地以俄為師進行「階級教育」，他們已有的知識早就棄置不用。要不是文革這齣好戲讓他們也嘗一下「被專政」的滋味，他們又那裏會想到優越感的敗事，以及實事求是的價值呢。我們現在

也把這些按下來不談，只就他們過去所取得的知識看：經過三十多年與世界自由空氣隔絕的日子，從前在學校裏書報裏所學到的，也都早已落後了幾十年。即使他們今天確有一番與民更始的決心，標榜的「四個堅持」無非一套「護身符籙」；他們那用作施政設計基礎的知識，也不過二、三十年代的舊東西，何況這些舊東西又是經過翻天覆地的俄式改造的。這個截江築壩發電的大計，縱使除去他們好大喜功的思想因素，仍不過從人定勝天這個本世紀初期的共同信仰出發，動機即使十分純正與善良，也已忽略了今天人類文明活動的大方向——接受生態學的訊息、重視生態學的警告的大方向。

這幾十年裏，中共移風易俗的豪情壯舉，著實不少！每一件都可以供作「新社會」、「優越性」的註腳。可惜的是：也幾乎每一件都事後證明它與生態平衡相抵觸。比如把吐納湖沿岸的氾濫台地圍作農田，美其名為與天爭地、增加生產；到頭來就洞庭鄱陽都失去調節江流洪潦的作用（至少減低了）。又比如大量砍伐林木作器材供燃料，大量抽用地下水，到頭來就水土流失、地層陷落。最可悲的還是倡言「人多好辦事」，當年上講人海戰術、下求百子千孫，朝野都得意洋洋，以「人口最多」去傲視天下。曾幾何時，就要出於強制執行「只限一胎」的命令了；行見二十年後更嚴重的人口失調，其患正不知伊於胡底！聽說擔任中共水利部副部長達三十年的李伯寧在中共政協六屆四次會議後發表講話說：「說起三峽工程，人們總認為是爲了發電與航運之利，實則三峽工程是一項綜合效益很大的工程，其首要作用在於防洪。從六十年代開始，大陸進入持續乾旱時期，人們對於洪水的危害日漸淡忘。其實防洪十分重要，不可掉以輕心。」這段話無疑有其安撫反對者的作用，骨子裏則爲一項避重就輕、轉移目標的「戰略」；反對者每以忽視水患爲理由，認爲中共只圖發電航運之利，罔顧關係民命安危的水患，李伯寧正是針對這一輿論「釜底抽薪」，高呼「三峽工程是要爲人民防洪水患」。其實要說三峽壩足以防洪，防的當然不是壩西的洪而是壩東的洪。然則構成壩東洪患最直接的原因是甚麼呢？上游童山濯濯、水土流失；中游則湖泊的吐納量日減。李伯寧說「三峽工程已經籌劃了三十年」，果真爲了防洪，這三十年裏爲甚麼屢屢四川的植被破壞日大、中游兩大湖的容量日縮呢？一邊興建大工程去防洪，另一邊則長期破壞生態景觀、製造洪患因子：這算是甚麼類型的施政呢？（長江洪患背景當另爲文論述）身繫億萬黔首福禍安危的中共領導人們，是否可以拿出理性來，眞的實事求是，對事情看遠一點、看透一點呢？

台海兩岸間接貿易的 經濟利益與政治涵義

(台灣研究生·美國) 鄭威旺

當今世上三個分裂國家中，以中國的二方接觸最少(1)。然而，台灣與大陸之間，近年來實質經濟關係日益增進，形成一種不易退却的「互賴」。中國大陸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因而倡言台灣經濟與大陸經濟之間有「互補性」(2)。

自從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以來，對台灣改採和平統戰策略，高談統一。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的「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國大陸要求「三通四流」——開放與台灣貿易、郵政、及旅遊(3)。一方面由於中共極希增加與台灣的接觸，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開放」政策需引進國外貨品及技術，台灣與大陸的間接貿易乃急速成長。

就純粹經濟層面而言，間接貿易為台灣的廠商、香港的經紀商，及大陸的地方貿易幹部均帶來大量利益。它也稍為滿足了大陸上廣大消費者對「舶來品」的需求。但鉅大的風險和極端不穩定性，也曾造成台、港商人的重大損失。然而，間接貿易的政治層面，尤須特別注意，因為它蘊涵台海二邊關係最有「突破」的可能性。它對二方面的意義，都超過金額所顯示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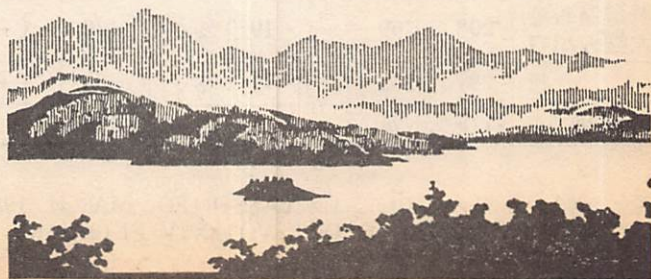
本文將探討台灣與大陸間接貿易的演變、現況，及未來。本文將檢視以下四項命題。

(一)大陸與台灣的貿易是大陸全盤貿易的縮影。因此大陸全面性的貿易政策對台灣之間接貿易有影響，一同放鬆，一同收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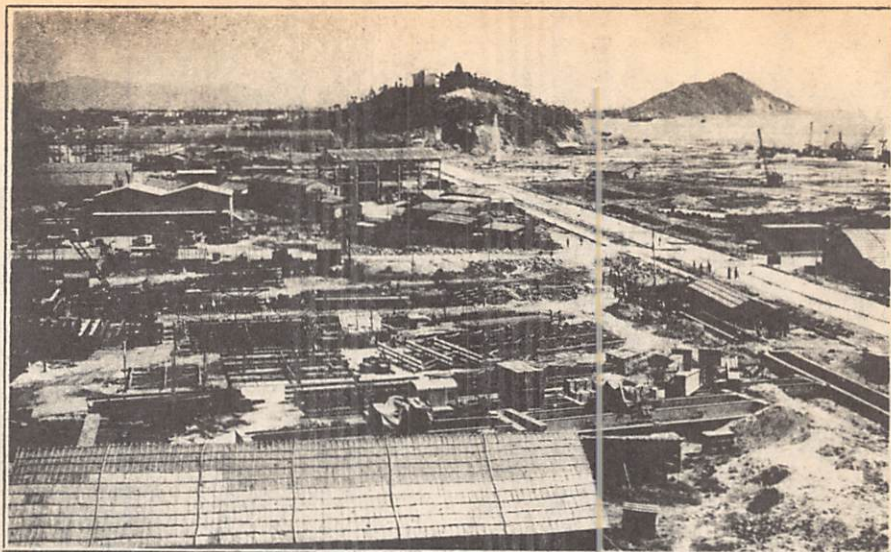
(二)大陸與台灣間接貿易的主要成因是經濟上的自然需要，而非設計的政治圈套。然而，導致其仍為「間接」的原因則是政治的。

(三)大陸自台灣進口——就如同其自其他國家進口——之目標是發展「進口替代」工業一樣，冀以獲致經濟自足。此外，它希望與鄰邦在經濟上競爭，特別是號稱「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S)。

(四)由於台灣對其他市場之貿易增長趨緩，而大陸又需要大量「昨日商品」，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將繼續成長。利之所趨，政府很難禁止。然而，此種貿易將持續多久，將視大陸科技



發展之速度而定。倘若大陸能充分並有效率地製造其目前自台灣進口之商品，則其自台灣之進口即將減少。



蛇口湖臨深圳灣，位於深圳市區西面二十多公里。由香港招商局投資興建，並創造了「蛇口方式」。

台灣與大陸間接貿易之演變

儘管台灣與大陸是政治上的對手，彼此的市場却相互配合。對於台灣某些「夕陽工業」而言，大陸的市場似為其過時商品的理想出處

。論者分析轉口（間接）貿易蓬勃發展之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國大陸近年對外貿易較趨分權化，地方貿易單位乃有較多自主權。第二是外匯存底增加，而民生消費品欠缺，地方貿易單位乃大量進口⁽⁵⁾。此外更重要的是：貿易「提議」是中國大陸冀圖達成與台灣和平統一的重要手段⁽⁶⁾。事實上，中共正運用貿易以擴張其在西太平洋區的影響力，如此才能確保「四化」成功所賴的外界穩定⁽⁷⁾。

香港具備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政治環境，又有優越的金融及航運服務，因此成為台灣與大陸間接貿易的最大「轉口港」⁽⁸⁾。據估計：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間接貿易是在香港進行的⁽⁹⁾。另二處重要轉口站是日本及新加坡⁽¹⁰⁾。

透過香港進行的台灣與大陸轉口貿易，近年呈現巨幅變動之勢。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分析：一九七四～七八年間，台灣商品售往香港，再售往大陸的，總值自港幣四一、〇〇〇元（美金五、二五六元）上升至港幣一七二、〇〇〇元。從這微不足道的數目開始，一九七九年金額成長了三七〇倍，一九八〇年再增加十倍，一九八一年又加倍成長⁽¹¹⁾。一九八一年間接貿易總額達到美金四億九千六百萬元。接著一九八二年降了四一·五%，金額是美金二億九千七百萬元⁽¹²⁾。衰退之情形自一九八一年第四季起連續七季，至一九八三年第三季始再上升。儘管一九八三年第三季貿易額增加了二二%，第四季增加了八〇·三%，一九八三年全年總額只有美金二億六千五百萬元，比一九八二年少了八·七%（真實幣值）。這顯示了港幣大幅貶值，貿易並未真正增加⁽¹³⁾。一九八四年，貿易額彈升至美金五億五千四百萬元⁽¹⁴⁾。同年所有各地轉口貿易金額為美金五億六千萬，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七⁽¹⁵⁾，其中美金四

億三千萬元是台灣對大陸的間接出口⁽¹⁶⁾。去年貿易金額更是超過了美金十億元⁽¹⁷⁾。表一是台灣與大陸近年間接貿易之演變情形。

表
透過香港的台灣與大陸轉口貿易 1982~1985
(美金百萬元)

年份	1982	1983	與上年 相比較	1984	與上年 相比較	1985	與上年 相比較
大陸透過香港對台灣的出口	89	96	(+ 6.8%)	128	(+ 33.3%)	-	-
台灣透過香港對大陸的出口	208	169	(- 19.0%)	426	(+ 152.1%)	-	-
總額	297	265	(- 11.2%)	554	(+ 109.1%)	1,000*	(+ 80.5%)
大陸逆差	-119	-71		-298		-	

來源：美國商務部，CABLE, UNCLASSIFIED, MARCH 1984 HONG KONG 04518 P. 2；CHINA TRADE REPORT VO1XXIV FEBRUARY 1986 P. 1.

* 估計數字

香港確實扮演中國大陸在東亞推展「經濟外交」的重要角色。受大陸日漸擴大的進口市場之吸引，就連與中國大陸尚無外交關係的南韓與印尼，也大幅增加與大陸的經濟貿易⁽¹⁸⁾。南韓更時常冒充台灣貨，以享受「國貨」優待關稅，成為台灣與大陸間接貿易的最大競爭者。表二為中國大陸透過香港與其他國家進行的貿易。表一及表二皆顯示：大陸一九八四年與台灣、南韓、美國及日本透過香港所進行的間接貿易均有大幅增長。這個發現證實了本文第一項命題——大陸與台灣的貿易是其全盤貿易的縮影。

表 二

大陸透過香港與台灣、南韓、美國及日本的貿易(美金百萬元)

年 份	1983	1984	成 長 率 %
台灣對大陸出口	169	426	+ 152.1
大陸對台灣出口	96	128	+ 33.3
南韓對大陸出口	45	161	+ 257.8
大陸對南韓出口	115	185	+ 60.9
美國對大陸出口	203	375	+ 84.7
日本對大陸出口	467	1,216	+ 160.4

來源：由香港政府統計局數字計算而得

至於本文的第二項命題——大陸與台灣間接貿易的主要成因是經濟上的自然需要，固然貿易數字支持這項發現，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張榮峰（譯音）亦在最近出版的「經濟季刊」中指出：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期間，政治不是大陸購買台灣商品的主要原因⁽¹⁹⁾。然而，經商會貿易組顧問武之璋亦提出警告：「大陸市場的政治色彩濃厚，外匯管制嚴格，如果倚賴過重，一旦政策方向改變，廠商就會吃大虧。」⁽²⁰⁾

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一九八四年中國大陸超額發行人民幣八十億元（約合美金三十億元），造成市場上搶購物資的壓力，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為力挽幣信，中國大陸採取緊急採購（消費品）措施，希望以物資換回通貨。因此，放寬進口管制，授權地方政府核發「進口許可」，使得握有自由外匯的地方單位，得到運用外匯的權力與機會，靈時引發一場難以遏止的「進口狂潮」。

然而好景不常，據專家分析，中國大陸經濟措施常流於「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狀態。由於經濟特區及開放城市大量進口消費品，大陸外匯存底迅速下降⁽²¹⁾，再加上進口設備利用率偏低，高層領導政見分歧和微妙的政治鬭爭，促使中共在一九八五年二月採取全面「緊收」政策。地方機構接獲指令後，除經商業部門或特殊批准，一律停止使用外匯三個月，以便清查。

這樣一來，幾乎所有與大陸做生意的外國商人都蒙受巨大損失，尤其是台灣的廠商。七月中，台灣最大摩托車製造廠百吉發公司陷入財務困境，因為香港商人突然取消一筆價值新台幣八千六百萬元的四千二百輛摩托車的訂單。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因而提出警告：「中

共最近的緊收政策，目的是在不景氣時期，打擊台灣的經濟」。⁽²²⁾可見，間接貿易絕不能只從經濟的角度來分析。美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鄧大衛（DAVID DENNY）博士更表示：造成台灣與大陸貿易仍停留在「間接」階段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的，否則雙邊的貿易當不致如今天之懸殊⁽²⁴⁾。

台灣與大陸間接貿易之分析

台灣與大陸的間接貿易，具有幾項特色。第一是：由表一及表二可得知，近年來台灣始終享有鉅額順差。倘若台灣目前「嚴禁與大陸直接貿易，但不干涉間接貿易」的政策持續下去，台灣的順差還要擴大，因為台灣向大陸出口，比大陸向台灣出口增長快得多。但這貿易額並不大，只佔台灣貿易總額的一·一%，和出口總額的一·四%。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趙岡比喻「台灣每年賣給美國大百貨公司，像SEARS，的商品，可能就超過了對大陸的總出口」。⁽²⁵⁾

第二個特徵是二邊出口結構極不相同。如表三及表四所顯示：台灣向大陸出口，最主要的是製造品（其中最大項目是紡織紗及人造纖維），其次是機械及運輸設備。相反的，大陸向台灣出口主要是草藥及食物（如魚類）等。出口結構的迥異，更加導致貿易的懸殊。

第三個特徵是：台灣若干產業已對大陸市場依賴過深。由表五可知：近年來紡織業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這些產業在傳統市場面臨拓銷的困難，自然視大陸市場為生存所必需且有利可圖。許多人憂慮這種過深的依賴，將對台灣不利。經過一番熱烈的政策辯論，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對間接貿易採取較為實際

表 三
台灣透過香港向大陸出口的產品結構
(美金千元)

商 品 分 類 \ 年 份	一九八三年前三季		一九八四年前三季		成 長 率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1. 食 物	362.8	0.3	411.5	0.2	+13.4
2. 初級原料	994.3	0.9	8,731.0	3.4	+778.1
3. 化學製品	1,355.0	1.3	6,875.1	2.7	+407.4
4. 製造品(按原料分)	75,336.5	72.6	151,716.7	59.0	+101.4
——紡織紗及 人造纖維	63,018.7	60.7	143,519.9	55.9	+127.7
5. 機械及運輸設備	14,917.6	14.4	63,269.9	24.6	+324.1
6. 雜項製造品	10,689.5	10.3	25,555.1	9.9	+139.1
總 計	103,791.2		256,952.9		+147.6

來源：以真實幣值，由美國商務部，CABLE UNCLASSIFIED JANUARY 1985 HONG KONG 00892 PP3-4 計算而來。

的政策。去年四月二十八日經濟部長李達海重申他所謂政府對間接貿易不加干涉的一貫立場。(20)他引述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報告(27)說：政府的干涉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政府官員也對過份依賴大陸市場提出警告。一方面是擔心中共日益短絀的外匯將導致取消大量訂單(百吉發即是一例)；另一方面是擔心中共會利用貿易作為獲取政治讓步的手段。(28)

台灣的一個紡織業者說：「如果不做轉口貿易，我們將如何生存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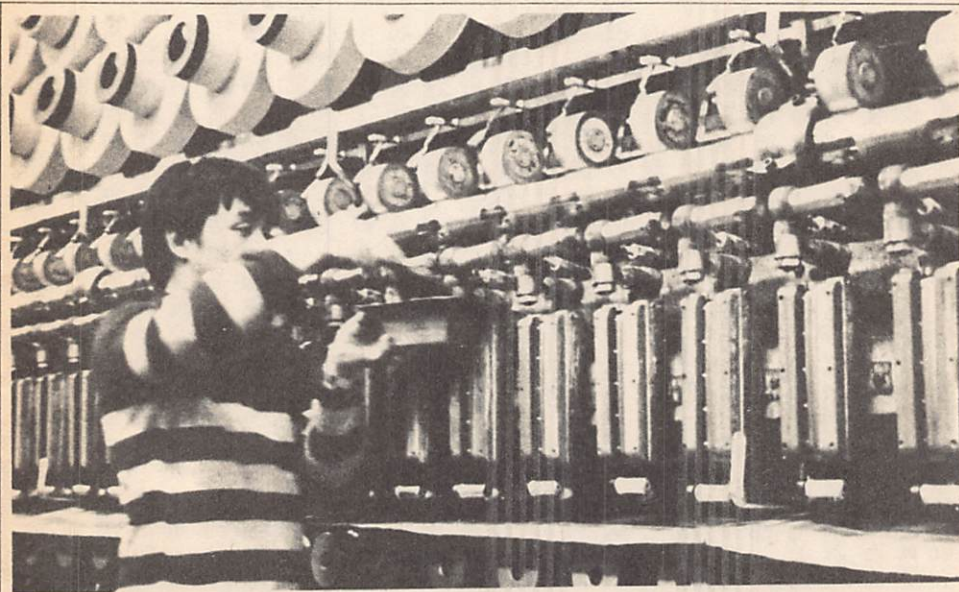


表 四
大陸透過香港向台灣出口的產品結構
(美金千元)

商 品 分 類 \ 年 份	一九八三年前三季		一九八四年前三季		成 長 率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1. 食 物	9,325.8	14.4	19,394.0	19.4	+108.0
2. 初級原料	43,902.7	67.9	57,860.0	57.8	+31.8
——初級動植物原料 (醫藥用植物)	36,233.6	56.1	41,230.0	41.2	+13.8
3. 燃料礦	308.5	0.3	1,398.2	1.4	+570.6
4. 動植物油	0.0	0.0	32.1	0.03	—
5. 化學製品	7,564.0	11.7	8,197.8	8.2	+8.4
6. 製造品(按原料分)	3,265.9	5.1	12,449.5	12.4	+281.2
7. 機械及運輸設備	52.3	0.1	64.7	0.06	+23.7
8. 雜項製造品	256.0	0.4	511.8	0.5	+99.9
總 計	64,639.1		100,041.7		+54.8

來源：以真實幣值，由美國商務部 CABLE UNCLASSIFIED JANUARY 1985 HONG KONG 00892 PP4-5 計算而來。

第四個特徵是這個貿易的政治層面。中共與國民黨關於統一的談判。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張五常指出：轉口貿易雖然是商業行為，但亦有統戰成份。(29)自從中共自一九七九年提出「三通四流」以後，一九八〇年更宣佈：自台灣進口的貨物將被視為「國貨」，享受免稅優待。因此，台灣貨，以及冒充台灣貨的南韓貨

表 五
台灣某些貨品對大陸市場之依賴程度
(轉往大陸佔其總出口量之百分比)

項 目 年 份	1981	1982	1983
人造纖維、起毛梭織布	19.0 %	72.7 %	98.2 %
矩形玻璃	—	—	54.8 %
機器腳踏車	17.1 %	—	34.7 %
絲狀合成纖維布	67.2 %	67.3 %	29.4 %
未列名玻璃	—	3.5 %	19.1 %

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引自溫曼英，前揭文，第八頁。

及香港貨充斥於大陸市場。中共隨即取消給予台灣貨的免稅待遇，而改採較平均關稅為低的「調節稅」。自一九八三年起，中共要求凡欲享受免稅待遇的台灣商人必須辦妥四件事：(一)必須與一個對台貿易的機構接頭；(二)必須提供四種文件的影印本，包括台灣的商業登記證明、台灣商業機關所簽發的進出口許可證明、台商的身份證明、台商為某公司的董事或股東之證明；(三)台商須往大陸簽約；(四)貨船直接由台運貨停泊大陸的口岸卸貨。³⁰凡與台灣有貿易實績的中國大陸地方貿易機關，將獲優良考績。³¹與台灣僅有一水之隔的福建省，尤其是廈門市，已將推展與台直接貿易定為要務之

一³²。凡此目的均極為明顯：中國大陸希望造成某種形式的「直接貿易」，以取得更大的政治效果。

然而，台灣政府希望在直接貿易與間接貿易之間劃一條線；³³但大部份商人則希望在政治與經濟之間劃一條線。

去年七月四日台灣政府發言人新聞局長張京育宣示官方的「三不」政策：不與中共直接通商、我國進出口業者不得與中共或中共設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機構或人員接觸及交易、對可能被貿易夥伴轉運其他地區的出口產品不加限制³⁴。論者認為：台灣以「可否認」標準來處理對大陸的貿易——任何交易只要不是從買者到賣者都可查清的，都可以接受³⁵。直接貿易仍在禁止之列。去年夏天有三人以與中國大陸直接通商而遭逮捕；十二月又有四人遭逮捕。但大部份與大陸從事商業談判的台灣商人都

有雙重國籍身份。

第五個特徵是貿易層次升高、形式特殊化。形式包括間接貿易、直接貿易，及直接投資。間接貿易包括：(一)傳統的透過香港的間接貿易，此種形式佔現有貿易的絕大多數；(二)雙向三角貿易：從價格較低的地方，如南韓，進口商品，附上台灣產地證明，再經香港輸往大陸；或經香港自大陸進口商品，附上台灣產地證明，再以台貨名義輸往其他國家。³⁶直接貿易則包括：(一)台灣省物資局招標採購的草藥³⁷；(二)台灣與大陸漁民間的「物物交易」³⁸；(三)某些第三國國旗的商船直接航往大陸³⁹。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台灣商人希望在大陸從事直接投資，至今已在福建省設立二家鞋廠，其中一家是合資經營，另一家則完全屬於海外投資者所有⁴⁰。某些商人正計劃從事整廠設備輸出⁴¹

最後一個(但不可忽視的)特徵是：台灣與大陸貿易的潛在利益及風險均很大，這反映了大陸市場的不穩定。為改進商情並減低香港捐客的暴利，台灣商人和大陸貿易機構均在香港成立分公司⁴²。大陸市場的訂單常常為數驚人，合格大廠商不願盲目擴充生產規模，惟許多小規模或不合格的廠商則趨之若鶩，匆忙擴充生產設備。有時趕工製造的產品不合水準，等於是砸台灣貨的招牌。每一筆大訂單均使台商、港商及大陸地方貿易官員獲得鉅額利益。然而，間接貿易比正常貿易風險要高得多。無論如何，台灣所面臨的政策上的兩難——嚴重依賴無法預測的大陸市場，否則在其他市場遭遇拓銷的困難——將在台海兩岸今後的經濟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

台灣與大陸間接貿易之展望

中國大陸現今「開放」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要達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也是中國傳統追求自立自強的一種表現。進口外來商品及科技的目的是在發展進口替代工業。這也反映了中國「師夷之長以制夷」的一貫途徑。很明顯，中國大陸目前擁有龐大且廉價的勞動力，加上其工業逐漸發展，勢將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構成經濟上的嚴重挑戰。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嗣岳(譯音)指出：台灣在其三個主要市場——美國、日本，及香港，均已面臨大陸貨品的強烈競爭，而彼此相似的商品結構與相互之間的敵視態度，使得情況更為惡化。目前已有十二項雙方均外銷的商品，在美國展開競爭，這些商品佔台灣輸美商品的十二·三%，佔大陸輸美商品的十二·二%。據分析，在不久的將來，雙方將有另外一百三十

二項商品在美國較量。在日本，雙方有七十五項商品正在競爭，佔台灣輸往日本商品的九八·五%，大陸輸日的六·六五%。他的研究報告發現：台灣在以上市場的所有主要出口項目，均已面臨大陸貨品的直接挑戰。這包括在美國的服裝、玩具、手工工具等；在日本的服裝、玩具、紡織、漁業及農產品和傢俱；以及在香港的自行車、農產品、電子產品及旅遊器具等⁽⁴³⁾。

這項研究證實了本文第三項命題：中國大陸商品將對東亞四條龍的商品構成挑戰，而且這種挑戰似已是真實而迫切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副所長馬凱（譯音），更直率地指出：大家不要以為中國大陸喊「經濟學台灣」的口號，就沾沾自喜，大陸的經濟改革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實際衝擊，是強烈而迫切的⁽⁴⁴⁾。由於國際貿易是台灣經濟的命脈，與就業穩定及價格結構密不可分，來自大陸商品的競爭，已到了絕不容坐視的地步。馬副所長認為：不但台灣在海外市場的佔有率會遭遇大陸廉價商品的直接威脅，而且會愈來愈難與充份利用大陸廉價原料的新加坡及南韓競爭⁽⁴⁵⁾。政府應儘速擬定應變計劃，以免遭受更大衝擊，對大陸目前進行的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應以較實際的眼光，詳細研究，未雨綢繆。

本文最後一項命題認為：轉口貿易在可見的將來仍將持續。其繁榮景況將短暫持續，最後終將漸趨沉寂。這蘊涵的意義是：目前轉口貿易的繁榮（及台灣的鉅額順差）是過渡性的。但無論風險有多大，由於廣大的大陸市場仍需求大量進口商品，轉口貿易仍將對許多台商有吸引力。台灣對與大陸貿易的態度會漸趨緩和與實際。但值得注意的是：轉口貿易的規模，決定於大陸市場的需要，而非在台灣的供應



台灣的經濟部長李達海說：「廠商需拿出智慧來做轉口貿易，以免吃虧。」

，台灣商人不應一廂情願，盲目擴充，而疏於向其他市場拓銷。欲充份獲得轉口貿易的實惠，減低損失，必須：（一）強化對大陸市場的商情掌握——國貿局已呼籲業者成立「預警制度」；（二）分散市場。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泰英建議政府應勸告業者不要銷售超過三〇%的貨品到大陸，以免大陸市場成為台灣商品的主要市場，而無法擺脫對其之依賴⁽⁴⁶⁾；（三）技術昇級，擴大台灣商品與大陸商品的技術差距。然而，轉口貿易的久暫，將視大陸要多久才能在科技上趕上台而而定。此外，中共外匯存底的多寡，將直接決定轉口貿易的數量。一九八五年據中共海關總署的資料，大陸貿易赤字是美金一百三十七億元（對外經濟貿易部的數字是美金七十六億一千萬美元）⁽⁴⁷⁾，這顯示去年初宣佈控制外匯，及約束交通工具、電子產品，及其他非必需商品之進口的政策未見成效。

由上述分析，吾人應思考一問題：台灣應否、能否協助大陸現代化？到甚麼程度？從長期眼光而言：漸增的經濟貿易交往，將有助於彼此間關係的緩和，達成一種共同默契（MODUS VIVENDI），甚而某種程度經濟體系上的融合。然而從短期而言：大陸將不可避免對台灣構成威脅。台灣對其拒絕與大陸貿易將愈來愈難自圓其說，更無法負擔由別的國家對大陸貿易所搶走的利益。但台灣有理由要謹慎提防對大陸市場過度依賴及中國大陸可能利用貿易為政治手段將台灣帶上談判桌的潛在危險。胡啟立說，台灣市場與大陸市場之間有「互補性」，還言之過早，畢竟兩邊貿易懸殊，產業結構迥異，是不平等的「互賴」，是不均衡的貿易。許多人認為：台灣可自大陸進口原油，以降低自中東之進口，但中國大陸原油（除大慶油田之外）多屬含硫量較高的低級石油。為進口大陸原油，台灣必須重建整套更為昂貴的提煉設備，且無法確定來源之穩定⁽⁴⁸⁾。不論如何，經濟仍將是決定台灣與大陸貿易發展之主因。然而，這貿易仍將在兩個發展程度相差很遠的經濟體系間進行。

更重要的是：日增的經濟接觸是否將導致台北與北京之間具有更多的共同政治利害關係，有待吾人注意觀察。凡此，皆使得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特別具有意義。

編者註：作者在撰寫此文時，查閱參考了四十八篇文獻資料（在此從略），如讀者有興趣，可向本刊編輯部或作者索取。

中共應從支持馬科斯事件中總結教訓

——從人民日報一幅照片談起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慎之

下面這幅登在今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照片，今天變成了對中共的絕大嘲諷。中共用這幅照片侮辱了菲律賓人民，也為自己留下笑柄。

應該說，中共高層人物那種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反潮流」勇氣是頗令人佩服的。你看，阿奎諾夫人在兩個月裏風靡了菲律賓，風靡了全世界，而貪污腐化、嗜血成性的馬科斯變得聲名狼藉，為千夫所指，然而中共却偏向馬科斯大送秋波；在菲國大選中出現的群眾保衛投票箱，修女阻攔坦克，平民保衛兵營等許許多多令人感動催人下淚的場面，中共一概無動於衷，却偏偏要登出集貪婪奸詐之大成的馬科斯夫婦，來加以美化。這是很需要一點不尋常勇氣的。不尋常的程度只有後來的蘇聯北極熊祝賀馬科斯當選總統一舉可以與之媲美。

有人說，這是中共的一次外交失誤，肇因於外交部信息失靈。這種說法則未免太有一點小看中共外交機器的效率了。中共一向強調「外事無小事」，對外交事務的拍板和發言也從來都是由政治局裏常委級人物掌握的。在大陸，即令普通幹部尚有一「小參考」一「大參考」這些篩選過的國際信息可看，至於中共政治局一級，那是有一天數次的最新國際形勢簡報的。其他部門可能信息不靈，但是中共的外交、軍事、特工部門的信息是絕對靈的。



馬科斯在菲律賓總統選舉中獲勝。圖為馬科斯和夫人在慶祝集會上打手勢表示勝利。

▲馬科斯曾用作弊偷竊菲律賓的總統選舉，全世界只有兩個專制政權——蘇聯和中共，承認和祝賀馬科斯的非法當選。這是人民日報二月十七日的祝賀照片和說明。

慾望使靈魂看不見一切。正是想要保住馬科斯的慾望，使得中共對馬的來日無多、對阿奎諾夫人的崛起、對菲律賓人民的意志、對世界的輿論一概視而不見了。

中共為什麼想保馬科斯呢？這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利益上的一致。馬科斯曾經警告美國，如果美國撤銷對他的支持，他就要和北京結盟。也許這只是馬的一廂情願，但却足以說明他與中共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繫。第二，中共高層一向對大小獨裁者特別鍾愛。如果不信，可以看一下歷史記錄：屠殺了三百萬柬埔寨人民的波爾布特、血洗孟加拉的巴基斯坦軍事強人葉海亞汗、雙手沾滿剛果人民鮮血的蒙博托、以及人權記錄極壞的霍查和齊奧塞斯庫等就都會是，或者仍舊是中共的座上佳賓。第三，讓不可救藥的馬科斯政權把菲國推向更加貧窮不堪的地步，從而為共產黨接管政權創造更成熟的條件。總之，不管中共一意孤行要討馬科斯歡心的做法，看去多麼愚蠢可笑，却有一條清晰脈絡可尋的，即是完全從中共自身利益和自己口味好惡出發的。

近來，中共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新政，使中共的形象有很大的改觀，以致鄧小平去年第二度榮膺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的頭銜。但是人們不要忘記，中共今天開明的做法如是出於其此時此地的自身利益需要採取嚴酷手段的時候，它是決不會手軟的。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與這些良心囚犯今天正在中共監獄中受難，不就是證明嗎？人性、人權、良心這些名詞，中共不僅不懂，而且是公然加以蔑視的。因此，在我們歡呼中共開明新政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它那暴虐的一面。這幅照片也許是一個提醒吧！

倒是古希臘一位哲人的話或許可替中共的顛預行為做出解釋：對於一個特定對象的強烈

鄧小平、陳雲之後的中國將發生什麼？請看：

中共高層鄧陳各派實力的新衍化

(國內)
董旭生

人人關注鄧·陳之後
的中國局勢

鄧小平、陳雲這些第一梯隊的中共元老們，已年過八旬。誰也逃不過自然規律，鄧小平最近在接見外賓時，還自嘲說，他即將去見馬克思。

中國是個人治社會，誰掌權，誰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一段時間的走向。因此，鄧小平、陳雲之後，中國會發生什麼，一直是海內外共同關心的大問題。

要深入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對中共高層各派的分野、各派的實力、各派的觀點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基礎及其最新衍化等，做一全面的分析。

中共高層各派分野圖

理論上，中共決策機構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執行機構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實際上，由於中共的決策程序尚未制度化，大權往往集中在頂上層幾個人手中，而每個人都有一班子人馬，人馬的多少及對各自人馬的控制程度，決定了各派的勢力大小。

那些名義上已退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人，由於與尚在位的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也由於每人都有一班子舊部，並不意味著權力的喪失，有的甚至較現任政治局委員還有影響力。如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副主任、中央整風辦公室副主任薄一波，比現任政治局委員倪志福和書記處書記王兆國的權力要大得多。

因此，在分析中共現時的權力結構和派系分野時，只看政治局和書記處是遠遠不夠的，要包括那些不在位、但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在此基礎上，我們以中共高層人物的政治觀點、出身派系為基礎，繪製了中共高層各派的勢力總圖（見圖一）。

鄧·陳對抗圖的補充說明

繪製這張中共高層各派勢力總圖並不容易，我們在高幹子弟中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以便做到盡量準確。該圖較為複雜，為便於理解，乃做如下幾點說明：

(一) 鄧小平的作用：鄧既是中共改革派的首領，又擔當與陳雲派的協調、平衡角色，所以，在圖中他的大半個身子屬改革派，小半個身子位於中間。胡耀邦、趙紫陽在某些方面較鄧小平開放。如鄧小平要批電影「苦戀」，

遭胡耀邦暗中抵制。八三年底鄧小平同意搞「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胡趙後來力諫鄧小平，方告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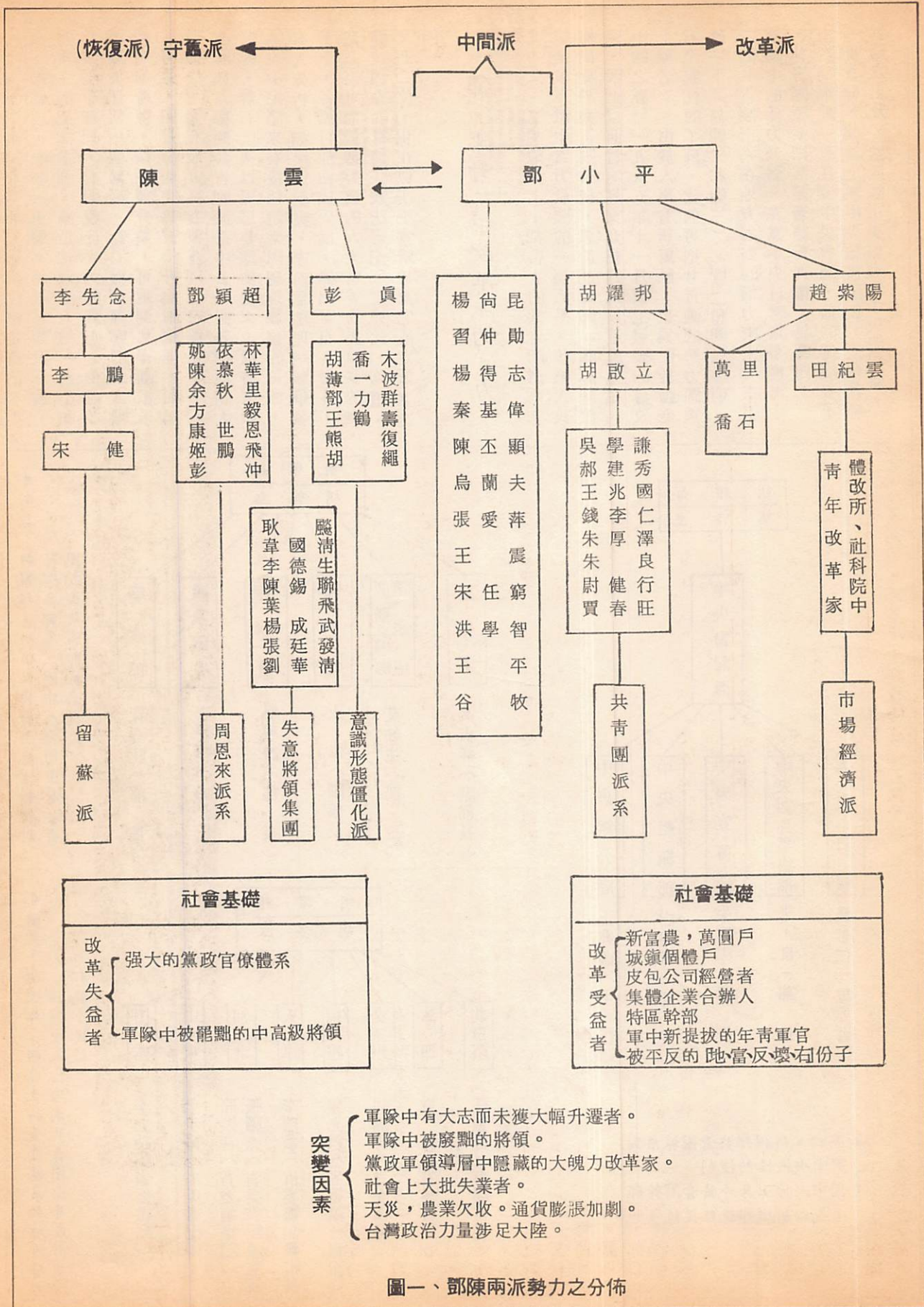
(二) 中間派：中間派包羅一大批政治人物，成份比較複雜。此派人員分為好幾類：

第一類：在鄧陳對抗中，當前基本不明顯偏向哪一方，是真正的、比較超脫的中間派。如烏蘭夫、陳丕顯、谷牧、宋任窮、王震等。他們採取中間的立場，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如王震與鄧小平私交不錯，但思想偏於保守。谷牧以前堅定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政策，但最近對老鄧頗有微詞，說：出了問題老鄧總是把責任下推——谷牧大概指海南、深圳等特區問題。

第二類：服鄧小平，但不服胡耀邦。鄧只要在世，他們是局勢的穩定因素。然而，鄧百年之後，他們是否擁戴胡耀邦，却是未知數。這些人包括楊尚昆、習仲勛、秦基偉、張愛萍、洪學智、王平等。他們多是軍人，論戰功，都比胡耀邦顯赫。

第三類：內心不易被人猜透，暫歸入中間類，如楊得志。楊表面上很支持鄧小平、胡耀邦，但在很多事情的具體執行上，又不那麼積極。

總之，中間派目前在穩定局勢中，作用頗大。鄧之後，他們將倒向哪方，亦至為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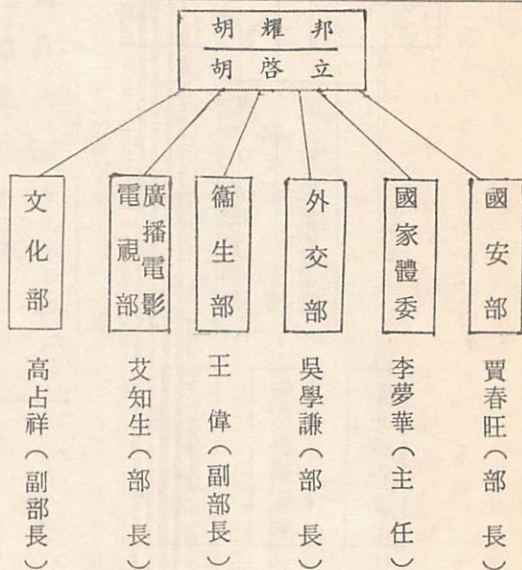


(三) 萬里和喬石：這兩位都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職務很重要。萬里思想很解放，資本主義意識很強，原是總理的人材。他不和趙紫陽爭總理，說明沒什麼大的野心，但他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幫派。喬石與胡耀邦的共青團派系有淵源，按一般分類，可劃到共青團派系。可是，四月份他突然被提升為副總理，崛起得很快。喬石最近努力塑造自己的獨立形象，不願被人編到共青團派系中去。據幾個機關大院傳，喬石這次以黑馬姿態衝出來，很有來頭，說不定將來有接任趙紫陽總理職務的可能。有人分析，如果田紀雲，李鵬為總理一職爭執不下，各派可能造成妥協，擁出喬石。另外，喬石也可能接替彭真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職務，因喬石目前任政法書記。基於此，萬里、喬石二位，現在似乎不宜歸於其它既定派系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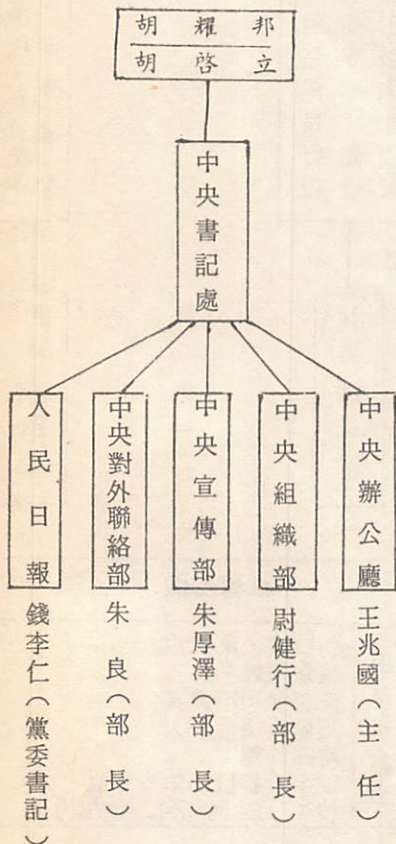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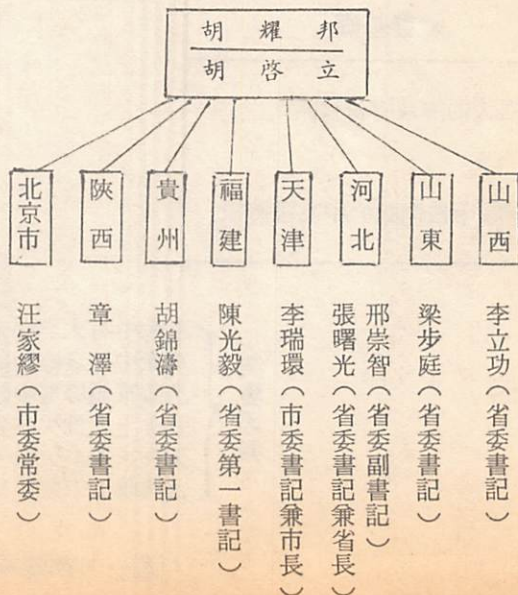
鄧·陳對抗中改革派的實力

(一) 胡耀邦——胡啓立的共青團派系：這是改革派中實力最強的一個派系。該系人員均出身於共青團系統，忠於胡耀邦。關於該派系，我們以前曾有專文介紹過（見董旭生在「中國之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上發表的專文——編者）。由於人事有新變動，也為便於讀者有全貌性的了解，我們再把共青團的勢力圖重繪一下（見圖二和圖三）。圖二和圖三表明，胡的共青團派系在地方省委的權力較大，在國務院中的權力較弱。在黨中央日常辦事機構中，共青團派系則掌握著絕對實權（見圖四）。由於胡耀邦一直任團中央書記，他的確培養了一批骨幹。胡當上黨中央總書記後，這些骨幹就隨之上升，造成團中央領導黨中央的局面。

◀圖二：胡耀邦、胡啓立共青團派系控制的國務院各部委（圖中人物均出身共青團或由胡耀邦提名提拔）



◀圖三：胡耀邦、胡啓立共青團派系的地方勢力（該圖中人物均為共青團出身或由胡耀邦親手提拔）



▲圖四、胡耀邦共青團派系對黨中央機構的控制（圖中人物出身於共青團幹部，或由胡耀邦親自提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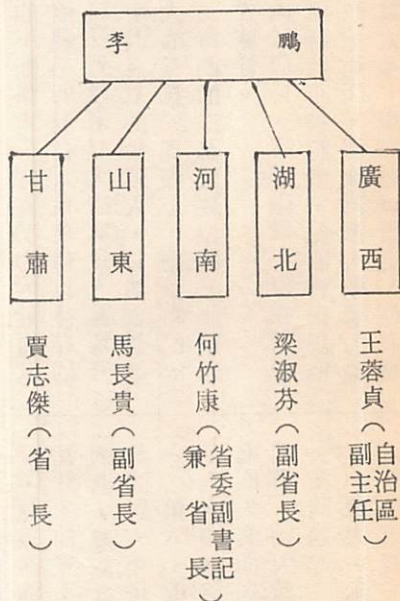
(二) 趙紫陽、田紀雲的經濟改革派：這是改革派陣容中已經形成的另一個派系，唯人數較少，力量較小。雖然這個派系遠不如胡的共青團派陣勢大，但由於趙的關鍵位置，該派系在當前的經濟改革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該派中的領袖當然是趙紫陽，副領袖是田紀雲，然而缺少一批部長、局長級的中層骨幹。這個派系極為有價值的組成部分是一批四十歲上下的青年經濟改革家，分佈於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和社科院的某些研究所中。這些青年經濟改革家們常常聚會，並將諮詢意見上達田紀雲、趙紫陽。體改所所長陳一之（四十出頭）等，是趙紫陽、田紀雲與這批青年改革家之間重要的穿針引線人物。趙紫陽、田紀雲做出的很多重要經濟決策，並不是找計委商定的，而是與一批青年改革家商定的。

關鍵問題是，這批青年改革家都沒什麼實權性的職務，當前只擔當參謀的角色。趙紫陽有心提拔一些青年改革派，但因為他們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背景，以及守舊派的阻撓等原因，趙紫陽心有餘而力不足。

鄧·陳對抗中守舊派的實力

(一) 意識形態僵化派：胡喬木、鄧力群、熊復（紅旗雜誌總編輯）和胡繩（社會科學院院長）等人，僵守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處處給改革製造阻力，這是不爭的事實，不必贅述。彭真的意識形態較為僵化，但不是這個派系的最高首領，最高首領是陳雲。

(二) 失意將領集團：這是一大批因為不是鄧小平的嫡系、或思想與鄧相左而被削職的軍隊元老。值得一提的是張廷發（前空軍司令）和劉華清（前海軍司令）兩人。前者雖是



▲圖五、李鵬留蘇派的地方勢力
(圖中人物均曾留學蘇聯)

鄧的部下，因過分反對胡耀邦而被視為不穩定因素，遭到鄧小平割職。劉華清原與胡耀邦關係不錯，因海軍涉及海南島倒賣汽車大案，被陳雲、胡喬木抓住辮子。在壓力下，胡耀邦不得不忍痛割愛，勸劉華清退出權力舞台。張、劉二位自被貶後，牢騷滿腹，覺得鄧、胡不夠「意思」，情緒上已加入反對改革派的陣營。

失意將領集團人數不少，但缺乏領袖人物，未擰成一股繩，故實力大小難以估計。如果有一位領頭人把這一股舊將串聯在一起，那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大力量。當前，還看不出他們緊密結合的可能。在某些契機下，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可能會擁出華國鋒為首領。

(三) 周恩來遺留派系：這批人在文革中受到周恩來保護和重用，對周恩來忠心耿耿。鄧小平在文革中兩次被徹底打倒，命運與周恩來遺留派系迥然不同，這派或可稱作文革遺留派，思想模式是計劃經濟型的，多認為鄧胡的改革步子邁得太大。他們對鄧顯超——鄧大姐，都極為尊敬。這派人對鄧小平重新評價周恩來也群起抵制。

(四) 李鵬——宋健留蘇派：宋健在四月份的人大會議上，被提升為國務委員，比副部長高了一級，成了留蘇派的副首領。這批人都是五十年代的留蘇學生，傾向蘇聯的經濟模式。關於對留蘇派的詳盡分析，我以前曾有一文（詳見「中國之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編者）。現在，我再用圖五、圖六把李鵬——宋健留蘇派的力量總結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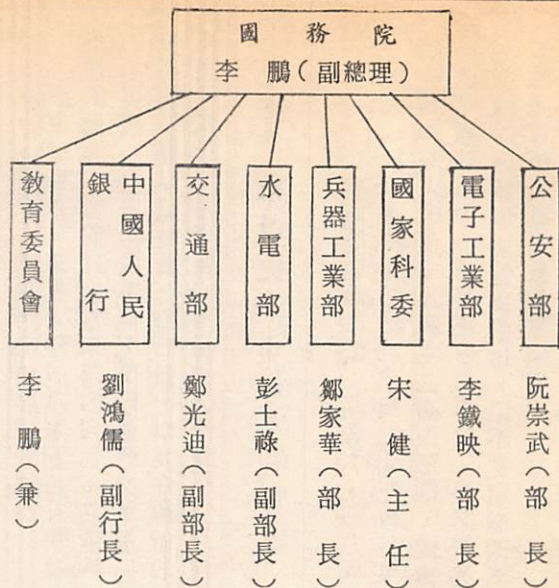
李鵬、宋健留蘇派深得陳雲、李先念、鄧穎超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賞識。由於對蘇聯體制有深刻印象，他們對改革原有體制有一種下意識的抵制情緒。

鄧·陳兩大陣營的路線鬥爭

關於鄧、陳兩人的思想分歧和路線鬥爭，國內高層領導之間，都心知肚明。

意識形態：陳雲派恪守正統馬列主義；鄧派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已經過時（但不敢指出具體的過時之處，並且宣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 圖六、留蘇派控制的國務院
各部委（圖中人員均曾留學蘇聯）



政治：陳雲、薄一波、胡喬木等主張加強共產黨對各方面的控制和領導，而鄧小平、趙紫陽主張在企業單位實行黨政分家，加強技術幹部的領導權。鄧小平甚至曾建議在企業單位中撤銷黨委，此建議立即遭陳雲、李先念反對和封殺。

經濟：陳雲派想將中國經濟恢復到文革前的模式，故有「恢復派」的稱號，又稱「小鳥籠」派。陳派是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守護神。鄧胡趙則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既堅持大企業國有，又使之按市場規律生產。鄧派亦有「大鳥籠」派的稱號。

鄧·陳兩派的社會基礎

陳雲恢復派：此派的強大支柱是從中央到地方的龐大官僚體系。這個體系自覺和不自覺的對抗改革，因為，改革的實質就是祛除某些官僚體系（關於此問題，請參閱本期「論中共改革派的處境、作爲及前途」一文——編者）。

鄧胡改革派：凡在改革中受益者，或在改革政策下即將受益者，顯然都支持鄧小平的改革，如：萬圓戶、新富農、經營皮包公司者、城鄉個體戶、專業戶、集體企業合辦人、軍中新提拔的年輕軍官等。

現在，陳雲守舊派的社會基礎——官僚集團的力量還相當強大。另一方面，改革派的社會基礎雖然已經形成，但由於缺少有形的、協調一致的組織把這些分散的力量統一起來，故改革派的社會基礎力量還不夠雄厚。然而，社會基礎是一個變動的因素。隨著改革不斷向前推進，守舊派的社會基礎將不斷被削弱，而改革派的社會基礎將不斷加強。

誰勝誰負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守舊勢力的社會基礎——黨政官僚體系的利益（他們賴以生存的大鍋飯制度）將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黨政官僚體系及其在中共高層的代理人，必然會對改革表現愈來愈大的抵抗。實際上，兩派格鬥的佈局已經擺好，搏鬥的序幕已經拉開。誰勝誰負，海內外都在關注。

兩派目前處於僵持、膠著階段，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僵持狀可被打破，隨即會出現令人難以預料的政治局勢。鄧陳兩派大較量的最終結局，因變數太多，現在難以斷定，但有幾個因素值得特別重視：

第一：鄧、陳、彭真、李先念等辭世的先後順序。在「人治」社會，天下之危繫於一人。哪派首領先亡，哪派就處於不利地位。

第二：改革派能否及時進行政治改革，以聚積自己的政治力量，削弱陳雲恢復派的社會基礎。政治改革進行得越早，對改革派自己就越有利。如放寬結社自由，可讓個體戶、專業戶等組織起個體戶協會、專業戶協會等，以此形成堅實的力量。再如，及時改革接班制度，以消除「你辦事、我放心」式的梯隊接班造成人們的不滿情緒，等等。

第三：改革派能否借到大量外匯。足夠的外匯可大大緩解國內的經濟壓力，解決大批失業問題，減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當然，外匯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類似重病人手術後的輸氧輸血。

第四：鄧小平能否把軍權移到可靠的人手中。

第五：改革派是否敢於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革，用新的意識形態逐步取代原有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在穩定中國社會中一直起著巨大的作用，文革後，馬列主義已被年輕一代徹底懷疑，意識形態做爲穩定中國社會的基礎，已遭瓦解。如果不及時引進另一個意識形態去替代的話，整個社會大廈將處於不穩定狀態。關於此問題，今後有機會再專題論述。

第六：改革派敢否及時擴大私有制，擴大私人企業。這個因素單獨提出來，乃因中國城鄉的失業問題太嚴重，失業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擴大私人企業，擴大招工，可及時緩解失業問題。

總之，未來幾年，由於第一梯隊的共產黨人年事已高，中國政局面臨關鍵性演變，我們這一代人，應積極參與這場大變革的過程。

論中共改革派的處境、 作為及前途

(中國民聯)

王炳章

——從世界經濟改革潮流談起

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及密西根大學的演講

●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五日和二月十七日 ●

編者按：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五日和十七日，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先後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EAST LANSING 市）和密西根大學（ANN ARBOR 市），就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及中共改革派的問題，發表了演講，兩場演講都吸引了不少聽眾，會上會下討論非常熱烈。在討論中，王炳章先生徵求了多位大陸、香港、台灣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對演講的意見，對原講稿的內容進行了修改、補充，現發表如下。

剛過了中國的春節和西方的情人節，首先向大家拜個晚年，向在此地伴讀的留學生夫妻表示良好的祝願，并祝願正在辦理伴讀簽證的留學生夫妻今年能夠儘快團聚。我希望，我們將來回國時不僅要帶回先進的科技、管理方法

、自由民主的思想，也可以帶回一些西方的民俗，像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等，以沖淡階級鬥爭的觀念，使我們的社會增加一些人情味。

下面要講的，并非學術報告，而是一篇闡述個人觀點的演講。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思考中國的前途問題，也喜歡與別人交換意見，今天我先開個頭，然後大家共同討論。

當前世界經濟改革的潮流

八十年代以來，改革成了世界上最時髦的字眼。改革就是改良，英文字都是 REFORM。中國共產黨過去把改良主義批得體無完膚，很忌諱改良二字，故把當前國內的新經濟政策稱為經濟改革，鄧小平則稱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當前，全世界都在進行經濟改革。首先看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

國、自由經濟的典範，也在面臨一系列改革。雷根在其待國會批准的稅制改革方案——雷根稱爲美國的「第二次革命」——及最近的國情諮文中，明確表達了他的經濟改革路線：壓縮政府龐大的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肯定市場經濟的原則。

美國的鄰國加拿大，進步保守黨前年以壓倒性優勢從執政十多年的自由黨手中奪走了政權。加拿大人民感到，自由黨的福利社會主義政策已過了頭，它養了懶人，剝奪了勤奮者的勞動成果，因此，人民要換一個政府，換一條經濟路線。新總理馬龍尼執政後，立即改革經濟，原則是縮減社會福利、創造條件吸引有錢人投資。有意思的是加拿大魁北克省，長期執政而主張獨立的魁北克黨於去年的選舉中，慘敗於自由黨之手，理由是經濟困境無法擺脫。自由黨在魁北克重掌令符後，一反過去由黨魁特魯多建立起來的福利社會主義色彩，在該省大力推行自由經濟的政策，大砍福利開支，以挽救停滯不前的經濟。

在地球的另一側，中國和印度都在進行經濟改革。印度四十一歲的總理拉吉夫·甘地，由民主選舉而繼承其母位之後，正朝自由市場經濟的方向邁進。印度的經濟決策者，深受蘇聯斯大林主義及英國社會主義的影響，在印度搞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國營企業佔全印工業的四分之三，產值却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拉吉夫經濟改革的措施是：增加企業的自主權；放寬進口和對外貿易的管制；減少財產稅和所得稅而鼓勵私人投資；等等。一句話，拉吉夫正在「走資」，而且比鄧小平走得更遠。但現在還看不出他將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開放民營的决心。

大洋洲的新西蘭，最近使全世界刮目相看

位於南太平洋偏遠的新西蘭，近來在國際舞台上却扮演着一個受人重視的角色。在過去一年半來，執政的工黨一反其傳統的政綱，推行全面經濟革新——減少及消除對各種經濟活動的管制與保護。所採取的措施包括滙率與利率的浮動、輸出與農產品津貼的減少、社會福利與費率的調整。這是工黨新政府主持經濟改革的財政部長道格拉斯。



。除「彩虹戰士」事件外，新西蘭大刀濶斧的經濟改革，備受外界的注意。一九八四年七月，新西蘭工黨當選，國家黨下台。令人震驚的是，工黨并未拘泥於其一貫的自由主義色彩，反而在四十一歲的年輕首相朗吉領導下，大膽採用新保守主義的措施：解除政府對物價、工資、利率的管制，減少政府對工業、農業、出口及國營企業業的補貼，減少關稅和對進口貨的管制。一句話，新政府朝經濟自由化的方向大幅度跨步。新政府之所以痛下決心，乃因為過去的社會福利主義路線已將新西蘭的經濟帶

入困境，國民收入按人口比例，從一九五五年的世界第三位降至一九八二年的第十六位。

在歐洲，蘇聯的戈巴爾喬夫眼看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成效，正躍躍欲試，準備擴大市場經濟的成份，改變蘇聯經濟體制的僵死狀態。

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法國密特朗政府，最近被自己的國有化政府搞得焦頭爛額，不得不向自由經濟原則低頭，將某些國營企業售予民營。

甚至連工業發展迅速、市場經濟受到充份尊重、問題相對較少的日本，也在努力改革自己的經濟，而改革的重要項目之一，是將包袱沉重的、連年虧損的國鐵（最大的國營企業），拋售給民營。

環顧這一切，整個世界的圖像似乎是：八十年代新保守主義思潮興起，左傾社會主義思潮低落，與六十年代左傾思潮洶湧澎湃的年代形成對照，這是經過七十年代反省的結果。新保守主義興起在經濟上的反映，則是重新肯定資本主義的某些經典原則，包括企業自由、市場機制、保障私人資本、提倡競爭等。多數國家的經濟改革，都大同小異地朝這些原則靠攏。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新保守主義回潮是當前的一個事實。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可能下個十年，社會主義思潮會捲土重來，但至少目前左傾思潮尚未見抬頭的跡象。

中國經濟改革趨向

在世界經濟改革的潮流中，中國也在進行經濟改革。這場改革的動力主要來自內部，來自文革十年動亂、經濟大崩潰後全國上下求變的急切心理。有趣的是，它的主旨也是尊重市

場機制、擴大私有的成份和減少中央政府的控制等。似可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當前世界新保守主義潮流中的一個浪花，就像中國的文章是六十年代世界左傾思潮中的一個巨浪一樣。

自一九七八年至今，中國的經濟改革已採取了如下重要措施：

- (一) 農村包產到戶，將土地租給農民，減少黨官僚對農業的控制；
- (二) 解除政府對部份工農業產品價格的控制和統購統銷政策；
- (三) 私人小企業、小商業和小服務行業開放（但僱工人數受到法律上的限制）；
- (四) 引進外資；
- (五) 設立經濟特區；
- (六) 企業管理權部份下放；
- (七) 向民主國家派遣留學生，等等。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任何背離馬列教條的努力都會引起世界的矚目。為什麼要改革？道理顯而易見，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這種極端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及其伴隨的龐大官僚體制，像癌症一樣纏磨着中國，不痛下決心進行手術，則必死無疑；動一下手術，雖有危險，但還有一線希望。改革派在猶豫之後，選擇了冒險手術的方案。這種決心，值得稱許。

接着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是徹底手術、根除癌症？還是祇割除部份腫瘤，留下病根？

第二，改革派有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手術？

第三，改革派能否忍受住手術後短期的痛苦（不管手術徹底與否）？

無可否認，像其它國家的執政者一樣，中國當權的改革派們在當前的經濟改革中，發揮

着關鍵性的作用。因此，要回答上述三個問題，就必須認真分析中國黨內的改革派，使人們認清改革派（或稱改良派）的特質、所處的環境及其出路，這對評估當前的經濟改革及其前途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剛才分析的，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經濟改革，連那些實行市場經濟的最先進的強國，如美國和日本，都在進一步向自由經濟方向擺動，以便刺激經濟的發展。我們國家本來就搞極端的計劃經濟，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改革，以便使中國在世界經濟的競爭中取得一席之地，可以想見，改革派的任務是十分艱巨的。

改革派面臨的挑戰

中共高層的改革派以趙紫陽、胡耀邦為首，鄧小平起平衡各派的作用，但他顯然偏向於胡趙。

改革派目前至少面臨四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最上層的「左」派份子（我們常稱為恢復派），如陳雲、李先念、彭真、胡喬木和鄧力群等。這些大員以捍衛馬列主義的正統性為由，處處給改革派設置障礙。這批人在口頭上并未反對改革，而祇是要求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改革」，把中國的經濟恢復到文革前的小「鳥籠」計劃經濟模式。人們普遍擔心，在鄧小平百年之後，恢復派會進一步阻礙經濟改革。

第二個挑戰：來自整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這是中共數十年來自己修建起來的，現在成了自己向前邁步的阻力。我們重點談一下這個官僚機構。

中共興建起來的官僚機器有很多套，其中直接對抗經濟改革的有兩套：一套是政工系統

，管思想、管人事，并與公、檢、法的官僚系統相結合，監視人們的行動。政工系統的幹部，由於過去的客觀條件，多無特殊專業技能，他們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黨培養起來的，如果講什麼專業的話，黨給他們進行的專業訓練是：監視、整材料、打報告、搞運動、調動人。他們是無辜的，那是整個制度的產物。

第二套官僚機器是經濟計劃系統——從中央到地方的「計委」、「經委」和各工業部、廳、局。這是一支十分龐大的隊伍，一個省的各種工業局和商業局有時達數十個。這個官僚機器的組成人員不直接參加生產，而是計劃、指揮生產。他們是靠計劃經濟吃飯的。

搞經濟改革，任何擴大市場機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其它經濟自由化的措施，都是對上述兩個龐大的官僚機器的直接挑戰。說得直接一點，任何重大的經濟改革，都意味着使官僚機器組成者喪失原有的權威、特權、既得利益，甚至舒適的工作。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本能，官僚們雖然口頭上也擁護改革，但却有意、無意地抗拒改革。

高層改革派似乎已認識到了這種挑戰，他們一再批評的所謂「兩頭熱」（中央和人民群眾熱），中間冷」、「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對策」及「中梗阻」等現象，都是龐大的官僚機器抗拒改革的表现。

第三個挑戰：來自激進的民主派和民主運動。來自人民的民主派由於沒有既得利益的考慮，往往思路開闊，提出一些更為大膽而合理的主張。儘管民主派和民主運動主觀想幫助黨內高層的改革派，但由於改革派自身的局限性（稍後再分析），他們常被改革派誤認為是破壞改革的搗亂份子。在某些情況下，改革派甚至以打擊民主運動來換取保守派的讓步。

第四個挑戰：來自改革派自身。改革派在推行改革中要不斷地向自己的局限性挑戰，這或許是改革派難以逾越的最大障礙。關於改革派的局限性，下面將以專題討論。

由此可見，與其它各國的經濟改革比較，中共的改革派面臨着更大的困境。

改革派的局限性

改革派富國強民的強烈願望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們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改革派的局限性首先表現在意識形態上的束縛。中共改革派一向信奉馬列主義，讓他們完全拋棄信仰了一生的「哲理」，是十分困難的。他們或許認識到



推動世界經濟改革潮流的政治巨頭人物。

了馬列主義的某些個別論斷已經過時，但是對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局限性缺乏認識，或認識到了也沒有勇氣放棄。

私人企業僱工受限，就突出表明了改革派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據說，允許僱工七人的數字，是鄧小平最後拍板的。為什麼允許七名，而不允許十名、七十名？是否頭腦中還有剝削論的魔影？難道僱工七十名有剝削，而僱工七人就沒有剝削？

其次，改革派自身的既得利益，是局限其改革政策的一大障礙。舉例來說，胡耀邦在四人幫垮台而未復職時，常鼓勵青年去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造輿論，給華國鋒、汪東興施加壓力，並主動提供內部消息。然而，當他被起用、重新掌權後，立即叫他的孩子和一幫青年民主派不要再到西單民主牆去，理由是：「西單民主牆有壞人。」

台上與台下，掌權與無權，由於既得利益的不同，對事物的態度也就不同。我常用乘公共汽車來比喻既得利益對態度的影響。國內乘公共汽車往往很擠，尤其是上下班時間。當你還沒有上去時，會使勁推前面的人，并喊：「裏面還有空，再上幾個。」可是，當你一旦踏進車門，却常常不自主地不再往前推擠，反而有時會轉過頭來喊：「別擠了，裏邊沒空了，等下輛吧！」你看，已上車和沒上的利益是不同的，其態度差別有多大！掌權的改革派也是一樣，當他們坐上了權力的車子上時，能夠完全體會無權平民的利益者却為數不多。當黨內恢復派向改革派施加壓力而威脅到改革派的權位時，以不惜丟掉烏紗帽來維護改革派利益者，才稱得上勇者，然而，能有幾個這樣的英雄？知識與經驗的局限性是改革派的第三個局

限性。應該承認，任何人都具有知識與經驗的局限性。中共改革派由於對多元民主社會的理論與實踐缺乏親身的感受，對市場經濟運作也缺乏具體的瞭解，故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知識的局限是不言而喻的。從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世界上還沒有現成的成功經驗可資利用。

沒有知識與經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偏見，因為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如果某些改革派人物誤認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這些人類美麗的東西都屬於資產階級的，如果還相信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最腐朽的制度，那就不是缺乏知識，而是存有偏見的問題了。

最後，中共改革派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其力量上的弱小。數一數，中共官僚架構中，為經濟改革廢寢忘食、呼號奔走的，到底有幾人？根深蒂固的龐大官僚體制，造就了一批明哲保身、無所事事的官員，真正敢冒點風險、為人民做點好事的當權者，人數并不是很多。

改革派的這些局限條件，決定了它的軟弱性、搖擺性、矛盾性及改革政策的不平衡性和不徹底性。

改革派與民主運動

民主運動對改革派的總的原則是「支持改革、推動改革、批評改革、超越改革」，這是中國民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制訂的策略（見「中國之春」雜誌一九八六年三月號）。具體一點說，在共產黨內各派別之中，民主運動支持改革派，支持改革派的一切正確政策，因為改革派畢竟是使社會突破舊秩序的一股力量。所謂推動改革，指的是我們出主意，提建議，并打擊恢復派對改革派的阻礙。當然，民主派對改

革派的支持并不是無原則的，對於改革派的不徹底性、搖擺性和改革政策的不平衡性，民主派向來都是提出直言的批評。支持、推動、批評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超越改革，即爭取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把中國推向一個多元社會。

黨內改革派對民主運動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有時他們想利用民主派向恢復派衝擊，揭露恢復派的陰謀，以緩解一下自己受到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們有時又害怕民主派的主張激怒了守舊的恢復派，「打亂」了他們的部署。他們也害怕恢復派懷疑他們挑動和聯合民主派，因為恢復派（保守派）是絕對容不下民主運動的。在恢復派的壓力下，為了迎合恢復派，以證明他們「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有時會壓制民主運動，并稱這種壓制行為是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排除來自右的「干擾」。

在守舊的恢復派的壓力下，改革派不僅有時壓制民主運動，有時也會犧牲支持改革派的黨內激進人士（這些激進派人士或可被視為民運思潮在黨內的反映產物），如黨內思想較為解放的原人民日報社長胡蹟偉、副總編輯王若水等人，就是迫於壓力，被胡趙改革派「忍痛割愛」的。

改革派祇有在受到保守派（恢復派）的致命威脅，感到自身難保時，才可能想到向民主運動尋求援助，但達到這種程度往往為時已晚——民主運動已沒有充份時間聚集足夠的力量支援改革派。

還有一種可能性令人十分擔憂：當民主運動在某種契機下大規模興起時，改革派惟恐民主的力量危及自己的權力，可能會聯合保守派的力量，一齊將民運壓制下去。

改革派與保守派

我們常稱黨內的保守派為恢復派，因為他們想把中國的經濟恢復到文革前的模式。

恢復派的力量是強大的。他們有領袖、有骨幹、有理論、有龐大的官僚組織。恢復派的強大并不在於人數——在全民中他們不見得佔多數，而在於擁有現成的官僚機器——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健全網狀組織。組織就是力量，一個連的軍隊很容易驅散臨時聚集起來的成千上萬的群眾，乃因軍隊是世界上紀律最嚴明、步調最一致的組織。

據估計，全國中層行政幹部達數十萬人，他們自上而下形成一個「葡萄串」狀的、結構嚴密的組織網，這是一支不拿槍的「軍隊」，是恢復派的力量基礎。

改革派的力量并不很強大。從中央到各省市，真正有魄力、有能力、有智慧、想幹一番事業的改革家，人數實在有限。

由於力量有限，改革派往往力不從心，為了能夠做點事業，他們必須獲得恢復派的諒解，就必須遷就恢復派的一些要求。中共意識形態保守派的代表之一鄧力群遲遲下不了台，是胡趙改革派遷就陳雲保守派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改革派向恢復派妥協的另一個體現是：改革派往往把意識形態的陣地割讓給恢復派，以便換取實際經濟政策的推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長期被守舊的恢復派把持，即很能說明問題。

改革派的窘境

在恢復派、改革派和民主派三派當中，應該說，最難做的是改革派。保守派可以拍着胸

膛、直言不諱地宣稱捍衛馬列主義（像陳雲、胡喬木和鄧力群）；民主派可挺立着大聲疾呼地要求自由和民主（像中國民聯）；唯有改革派在祈求中過着生活——他們必須祈求恢復派網開一面，也祇有改革派在說違心話——他們口裏喊着堅持馬列主義而手上却在幹着擴大私有制的事情。

改革派就是這樣處於黨內保守勢力與社會上民主力量的夾縫中間。改革派的窘境在於：他們痛恨保守派勢力的阻礙，但又覺得無力推開保守派勢力，他們像小媳婦一樣，看着保守勢力的臉色行事。另一方面，改革派明明知道民主派人士是推動改革、突破舊局面的力量，却又常常不得不壓制、以至犧牲他們。

幾年來改革形勢的發展，已顯示了這樣一個圖像：人民及民主派要求進一步改革的呼聲提高時，改革派就將政策放鬆一下，改革就往前提一步；然而，當改革超過黨內高層保守派的容忍限度時，保守勢力便進行反攻倒算，改革派於是收緊一下政策，壓制一下民主派的要求。停滯一段時間之後，人民群眾和民主派的呼聲再起，又一次的政策放鬆，開始了下一次循環……整個改革就在這鬆緊緊緊、緊緊鬆鬆的狀態中進行。

中共高層改革派為何自陷如此窘境？原因就是前面指出的局限性，尤其是他們害怕喪失既有的權力和地位。害怕心理的產生，乃因改革派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民主運動是抵消保守勢力的最有效的因素。

改革派的結局及出路

剛已分析，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之所以強大，在於其有現成的官僚組織架構。改革派要

想改革成功，必須解除這個官僚機器對經濟發展的窒息，也就是說，改革就是向臃腫的官僚機器開刀，搬開這個絆腳石（農村搬開了這個絆腳石，改革就取得了成績）。

可是，要解除城鎮系統的龐大官僚組織的臃腫狀態，要排除這個官僚組織代言人——恢復派的干擾，力量弱小的改革派是不能單獨勝任的，它必須依靠另外一支新的生力軍——民主運動。

問題在於，擁護和推動改革的民主派人數雖然可觀，但大多數處於無組織的分散狀態，因為中國缺少，更確切地說是沒有結社的自由。民主派人士不能聚集，就形成不了力量，也就不能有效地支持和聲援備感孤獨的改革派。怎麼辦？有效的辦法是改革派利用手中暫時的權力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相應改革，做到兩個「解除」。

一是解除言禁，按照憲法，允許民辦刊物和民辦報紙的出版和發行。人民可以利用輿論的力量，箝制恢復派，監督貪官污吏，並給改革出謀劃策。開放言禁不但不會致亂，反而會止亂。有了群眾輿論的監督和制衡，利用經濟改革違法亂紀的現象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止。改革派或許擔心，言論開放了，輿論的矛頭會對準改革派，對改革派不利。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事實證明，誰先相信人民而大膽地解除言禁，誰就會獲得人民和民主運動的衷心擁護，而且絕不會成為輿論的矛頭所向。

二是解除對結社自由的限制，真正按憲法辦事，讓人民有集會和結社的權利，民主運動的散在小組織祇有集合為大團體，才能真正成為一支力量。

社會改革大體上有三種模式：（一）自上而下；（二）自下而上；（三）上下結合。

當前，中共改革派採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即高層制訂改革政策，爾後通令下面貫徹執行。我們并不否認改革派想儘快把經濟搞上去的良好願望，也不否認上面的某些政策的正確性，然而，正如我們剛才一再指出的，由於龐大官僚組織的存在，高層改革派的良好願望無法實現，高層的改革政策也無法順利地貫徹執行。「中梗阻」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中國歷史上數次改良運動失敗的教訓已經證明，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模式難以奏效。

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就是大規模的群眾民主運動興起，或迫使當權者讓步，或迫使當權者交出權力。單純自下而上的運動模式，往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

較為理想的是上下結合的模式，運用得當，收益最大，代價最小。上下結合，就是高層改革派與群眾民主運動結合，這種結合，不見得是組織上的，而可以是政策上和輿論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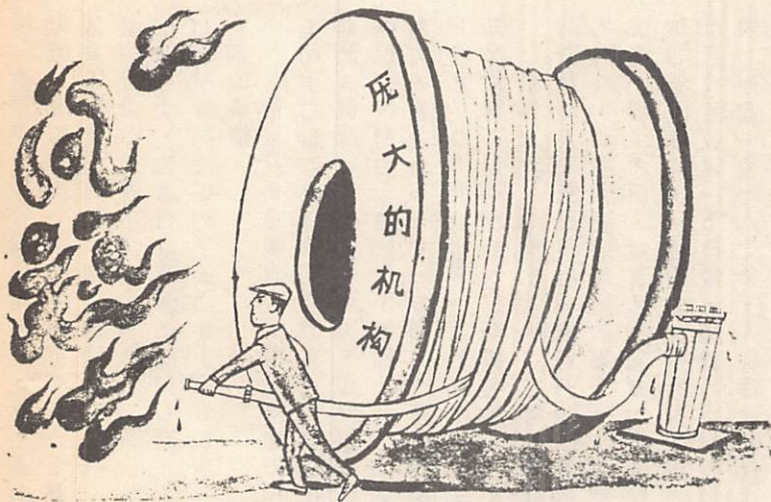
目前，中國存在着實行上下結合模式的可能性。上面，有幾員改革派大將，他們有一定的權力和決心；下面，有強烈要求改革的人民群眾，有遍佈各地的青年民主派，而且，不少民主派已做好了與改革派合作的心理準備。要把上下結合的可能變為現實，祇需上層改革派痛下決心，利用手中尚有的權力，做一些政治上的改革，給青年民主派聚集力量創造條件。

我們堅信，上下力量一旦結合，就能有效地打垮恢復派勢力和官僚機器對改革的阻撓。在當今的世界上，應用上下結合的模式進行社會改革，最為成功的例子，當推西班牙的卡洛斯國王。他在佛朗哥死後，大刀闊斧地開放了政治民主。起初，包括軍人在內的右派勢力十分反對改革，右翼軍頭目甚至揚言政變。但卡洛斯特大膽而巧妙地運用了民主運動的力量

。黨禁開放後，西班牙新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一位去過西班牙的朋友告訴我，黨禁開放的頭兩個月，大大小小共組建了三千政黨。民主派迅速聚集為強大的政治實體，他們雖然政見上互不相同，但在改革上，一致支持卡洛斯，成了卡洛斯迫使右翼軍人讓步的巨大法碼。

卡洛斯國王能夠做到的，中共改革派也應該能夠做到，西班牙人民能夠做到的，中國人民沒有理由不能做到。

過去，中共高層改革派曾有與民主運動合



近水救不了近火 徐進(北京)

作、採取上下結合模式來推動改革的成功例子，那就是一九七八年西單民主牆運動時期衝擊凡是派的鬥爭。那時，鄧小平開放言論，胡耀邦等人主動向民運人士提供信息，上下結合，巧妙地利用了民主牆和民辦刊物的輿論陣地，揭露了華國鋒、汪東興和吳德等凡是派的大量問題（如汪東興在中南海大興土木，修建私宅；吳德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彭真的平反大造輿論，最終迫使了凡是派交權。不採取上下結合的模式，不動員民衆的力量，鄧小平是難以那麼快就打垮凡是派的。

中共改革派如果採取卡洛斯或西單民主牆的上下結合模式推動改革，他們將成為創造中國歷史的英雄。

改革派的前途與結局，取決於他們自身，取決於他們能否依靠人民的力量，取決於他們敢否與民主運動配合而採取上下結合的改革模式。

如果中共改革派繼續屈從於恢復派而壓抑甚至打擊民主運動，不但改革的前途不樂觀，改革派本身的命運也十分令人擔憂，即使最終不被恢復派廢黜，也不會幹出什麼大成就，至多是歷史舞台上的平庸過客。

改革到一定程度，出現種種問題時，在恢復派追究問題的壓力下，改革派有三條路可供選擇：

第一，為求自保官位而緩慢、甚至停頓改革，向恢復派投降。

第二，頂住恢復派的壓力，繼續把改革推展下去。這樣做，就會從根本上觸及官僚機器及其代理人——恢復派的利益，矛盾激化時，恢復派可能會以改革出現亂子為藉口而將改革派趕下權力寶座。

在世界經濟改革潮流中，各國競相拋售國營企業給民營。中國國營企業向民間拋售股票也是遲早的一步，改革派正在這方面的輿論。



各國競相拍賣國營企業

國家	開放民營項目	國家	開放民營項目
加拿大	航空與太空、能源、電訊	西德	石油、航空公司、鋁業、鋼鐵業
美國	監獄、醫院、大眾運輸系統、美國大陸鐵路公司(Conrail)	西班牙	汽車、卡車、旅遊、一般工業
墨西哥	旅館、一般工業、200家企業	義大利	航空公司、一般工業、銀行
智利	銀行、退休基金、能源	土耳其	航空公司
巴西	Petrobras石油公司、鋼鐵、運輸、資訊業、電訊、石油配銷	日本	電訊、鐵路、香煙、航空公司
英國	電訊、石油、港口、汽車、航空太空、煤氣、機場、航空公司、飛機引擎	菲律賓	旅館、糖、椰子、製糖廠、水泥廠
法國	100家國營企業海外分公司、16家巴黎市立服務公司	泰國	電力、航空公司
荷蘭	金礦、礦物檢驗、航空公司	馬來西亞	航空公司、電訊、證券、旅館停車場、自來水、廣播中心
		新加坡	航空公司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

第三，及時進行政治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大膽改革，動員和依靠民主派的力量，打退恢復派的反撲，將改革進行下去。

現在的形勢發展使我們非常憂慮，由於不平衡改革政策的結果，出現了急遽的通貨膨脹、嚴重的幹部違法犯罪、外貿赤字和特區失誤等混亂現象。在恢復派的反撲下，改革派似乎又有收的趨勢。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運動（改良運動），從

王莽新政到王安石變法，從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都沒有成功過，改革派的結局大都很慘。其原因都是由於兩條：

其一，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龐大的官僚體系）力量過強（主要是他們有完全的組織）；

其二，改革派（改良派）不敢發動和依靠處於分散狀態的進步力量（現今為民主力量）。

回到世界的潮流

我是以當前世界經濟改革的潮流來開始這場演講的，現在，讓我們把中國的經濟改革放進這個潮流中去加以分析，這樣，能夠進一步認清我們國家面臨的問題。

第一，中共改革派過份地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而民主國家的經濟改革者多不恪守固定的意識形態。如新西蘭工黨及加拿大魁北克省自由黨上台，他們經濟改革的一條重要措施就是削減社會福利，這似乎與工黨和自由黨的宗旨背道而馳。雷根（保守派）的小政府政策，却是若干年自由派的主張。西方改革家多採用實用的政策，不宜稱堅持某某主義。

第二，中國的經濟改革在人民沒有自由的環境下進行，因此，政策缺少輿論的監督和制衡，也不能把人民群眾的智慧集中起來。反觀自由民主社會，言論及新聞的自由是促進改革的重要力量。

第三，我們國家龐大的官僚機器及軍人干政的傳統，都是民主國家所沒有的。

對於這些問題，改革派是否有清醒的認識呢？我們國家有沒有有利的條件呢？當然有的

！我們有億萬聰明智慧的人民，有世界上潛力最大的最廉價的勞工市場。然而，如果在改革中，人們的才智不能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廉價的勞工市場不能通過自由僱工而挖掘出來，有利的條件是派不上用場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當我們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時，我們充滿希望地吶喊：「十月革命，驚天動地，現代強國，由此興起！」現在是一九八六年，十年過去了，我們國家的工業還是個爛攤子。十年是個不短的時間，人生有幾十年？香港、台灣、新加坡、南朝鮮的工業起飛，也就是十年的工夫。可是，我們的國家還需要多少個十年？

世界各國都在力行經濟改革，這就意味着，先進的將要更加先進。在世界各民族的競爭中，我們要免於最終遭受淘汰的命運，就必須以比別人更快的速度向前邁進。然而，以我們國家當前這種左右搖擺、進兩步退一步的速度緩進，我們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是越拉越大呢？還是會越拉越小？

改革的替代與催生作用

從政治上講，改革通常有三大功能：一是瓦解；二是替代；三是催化。

瓦解：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向舊有的體制開刀（否則就不叫改革），缺口一旦打開，不管改革派的主觀願望如何，由於既往的內部壓力過高，缺口會越來越大，以致逐漸瓦解原有的體制。

替代：如果改革的政策正確，並且改革派能夠結合群眾的力量，在原有體制瓦解的同時，逐漸建立新的體制，那麼，改革的結局將是新體制代替舊體制。如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并建

立生產責任制，就是較成功的例子。但改革發揮替代作用的前提是：（一）依靠群眾的力量，即上下結合；（二）替代物——新體制的設計要相對合理而及時。

催化：倘若替代作用的兩個前提未能滿足，那麼，改革的瓦解作用仍會繼續，儘管改革派有時會回頭來修補原來的體制。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必將催化民主運動。張之洞、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和康、梁的改良催化了辛亥革命即為一例。催化作用的機理是，人民是要前進的，當改革派無力以新體制取代舊體制時，人民將尋求新的政治力量來完成替代作用的歷史使命。

如何避免重蹈中國歷史上改革派的覆轍？肩負重任而又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共改革派們，你們大概也在日夜思考這個問題吧！

我就講到這裏，謝謝諸位。

補記

1. 關於中共龐大的官僚機器對改革的阻礙作用：第三梯隊代表人物胡啓立最近對此問題有了進一步的闡述。他在四月份「紅旗」雜誌上撰文，提醒人們注意如下現象：一談改革，都舉手贊成；實行起來却不盡其然。

2. 關於法國經濟改革的新保守主義趨向：

本講稿草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中旬。三月份法國國會大選揭曉，保守派囊括多數席位。左派的密特朗總統順應民意，邀右派領袖席拉克出任總理，重新組閣。席拉克對法國經濟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準備將水電公共設施之外的、高達二百卅五億美元資產的所有國營企業都恢復民營，其中包括三十八家銀行和國有達數十年的雷諾汽車公司等。此外，他還計劃對企業和個人大幅減稅、削減福利開支。企業界對此反應異常熱烈，巴黎股票交易創出歷史記錄，外國大公司紛紛赴法投資。面對席拉克的魄力，中共改革家們是望洋興嘆呢，還是步其後塵？

3. 關於改革派的不幸命運：本演講結束後

二個多月，中國新聞社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九日從北京發出一則引人注目的電訊：在前段經濟體制改革中湧現出的一批改革者（本則電訊主要指中層改革者——筆者），紛紛中箭落馬，遭到那些吃慣「大鍋飯」、安於現狀的官僚主義者的誣陷打擊。該則電訊大聲疾呼應關注改革「新星」們的命運。

4. 關於改革派不幸命運的實例：本演講之後

後的二個多月，人民日報國內版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三日在頭版刊出轟動性消息：鄭州市第二交通運輸公司機動車輛廠廠長、成績斐然的改革家宋北方，因功得禍，遭到對改革反感的上級公司黨委書記的嫉恨，被罷去了官職。河南省委、鄭州市委對此束手無策。中層改革

者受壓在國內是普遍的現象，另一個較著名的例子是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主任、人大代表），他最近說：「我感到了很大的壓力，很苦惱。我現在已經心力交瘁，難以支持了。」（見青島省「人才天地」三月號）。幸好，宋北方、溫元凱等得到高層改革派胡趙的支持，或錯索得以暫時糾正，或尚可勉強支撐下去。然而，人們要問：目前胡趙掌權時尚且如此，在胡趙高層改革派備受壓力、自顧不暇之時，中層改革者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5. 關於上下結合的模式促進改革：正值本文交付打字時，欣見「人民日報」今日（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在頭版發表一篇醒目的評論員文章，題為「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文章指出：「唯有依靠人民，訴諸人民，我們才有力量克服前進路上的一切困難，包括產生自內部的弊病與阻力。」可見，共產黨改革派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上下結合模式推動改革的必要性。現在，就看黨內高層改革派有沒有決心去做了。

6. 最後說明：改革派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地位愈高，權力愈大，責任也愈大，同樣，局限性亦愈大。本演講所指的中共改革派，多指中共高層（政治局）的改革派，只有高層改革派，才能對政治改革和意識形態改革做出決策，中層改革派尚無此權力。

王炳章補記於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

中國民主社會的前鋒

貪官與奸商

——中產階級的社會功能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黃 淘

一部近代文明史，就是 中產階級開天闢地的歷史

一個新社會的崛起，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必有一股新的社會力量從舊的社會層次中衝殺出來。十七、十八世紀西歐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的脫胎，民主政體之產生，便是由於社會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新興勃發。這中產階級，為其本身的經濟利益，上跳下筮，其猖狂氣焰脅迫不可一世的君主、神聖不可冒犯的教皇和實力雄厚的封建貴族。他們不能忍受上層社會對社會財富的壟斷、不能忍受封建體制的封殺攔阻。他們要求經濟上的獨立自由，從而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他們最反對君權神授、特權世襲，而絕對贊成人人的尊嚴、平等和民權。為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最贊成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最強烈地要求施法公正，最尊重法律的尊嚴

。這個階級有錢有勢，它最恨政府腐敗無能，最恨專制，而熱衷革命，勇往前闖。這個階級赤裸裸地、不擇手段地攫奪社會財富，而正是它們迅速地完成了社會的資本積累，使工業革命昂首濶步前進，使西歐雄視整個世界，為美、英、法等經濟強國奠定鋼鐵實質的基礎。

中產階級亦即社會的中等階級，非極富，亦非赤貧。上涉資本家、地主，下及販夫走卒，都是或多或少地有錢生息謀利者。早期的中產階級成員，主要是小手工業者、商人、小土地所有者、官吏等等。

一部近代文明史，幾乎就是中產階級開天闢地而引發種種事件的歷史。這階級越壯大，社會就越豐足。它不但將社會無數赤貧者捲進行列分金，且將控制在一小撮權貴手中的社會財富搶過來。它激勵著社會經濟的急速向前，財富再生。它填平了貧富懸殊的鴻溝(並非絕對平均)調和了階級的仇視對立，而均衡了社會的經濟勢力，從而均衡了政治權力。如三權分立，多元黨派；又如州權、地方權、個人的

人權，對中央權力的削弱等。這階級的積極挺進，產生了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念和人的價值觀念。一個民主的社會政體、民主的社會意識為此而確立。中產階級越壯大，民主社會的政制、意識就越根深蒂固，就越長久。

從來沒有任何政治力量比為爭奪和捍衛切身的經濟利益而爆發的力量更有力量。沒有任何階級比中產階級更愛民主這個命根子，為了民主，最有力地捍衛她、壯大她、美化她。美國的民主能繼往開來，雄深萬象，是因有一個龐大強悍的中產階級。民主因中產階級而產生。

中國尋求民主之路，自辛亥革命至今，歷大半個世紀而未可得，正因為中國未能長成一個堅強有力的中產階級。每一次為民主的爭戰，總是失敗，或得而復失。民主玩弄在權力者與愚民手中，或扭曲壓偏、或吹長鼓漲、或被強姦、或被冷落，受盡諷刺羞辱。

西歐起步快，中產階級的成長雖然不易，但總算順利。海外商品市場的開拓、財寶疆土的振撼刺激，賦予他們不可抗拒的進取魔力。落後國家起步遲，喪失了天時、地利、人和。故社會每與工業革命開闢的路向背道而馳，或繞圈拐彎。中產階級的成長所面對的主要是兩個仇敵：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官僚特權階級。這兩個階級雖然勢不兩立，其共同之點便是政治專制。社會的權力、財富緊緊地控制在少數人手中，中產階級只有哭喪著臉的份兒。國、共治下的中國如是，南美洲、非洲、亞洲、東歐各國也如是。結果，所引發的革命，總是以暴易暴，以專制取代專制，歷史的悲劇一再重演。

中共治下的中國，中產階級更見式微。但並不滅絕，一支紅色資本家隊伍，是這階級的

中堅。鄧小平重新執政後，農村的個體戶、包產戶、城鎮的私有企業者、小販，是這階級的補充隊伍，使這階級更形壯實。而貪官、奸商（經濟犯），更是這階級的前鋒鬥士。

中產階級在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大陸）現時的社會狀態下：

無產階級——純粹出賣勞力、無私產的農民、工人。社會的財、政行使權天生與他們無緣。他們的社會地位神聖偉大，但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在政治上則鼠目寸光，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新社會藍圖，所以，他們的政治行為總是被動的。他們的切身利益信條只是社會給予他們多少福利，他們並不怎麼計較社會的專制或民主。他們在強權威迫下，普遍地畏縮，不知所向；在窮絕無路時，麻木忍受，或暴亂；在福利之下，則忘乎所以，極易受均富，分田分地，大鍋飯共產主義的誘惑。

任何一個階級，並不是一個同一政治意向的絕對統一體。基於階級中個人的人生觀念不同，對所得的社會利益審度不同，在社會的行為上自然地分出勢力不同的保守和進步兩派力量。階級的界定，也是一個同一經濟地位的社會群體的社會特性，是大致的，而非絕對的界定。無產階級，雖然其人數眾多，勢力最龐大，事實上却又是社會中最笨重的力量。正因為其政治地位的被動性，其進步派會是社會變革的追隨者，但不是先鋒。而社會的民主、富足、進步就意味着徹底剷除這活在社會最低層、窮愁潦倒的階級，而將這階級的人向更高的層

次提昇。

知識份子——其經濟地位各不相同，作為政治社會的一個層面，他們無根無底，最激動又最懦怯，最革命也最奴才。他們並非一股立足社會經濟的實力，頭重腳輕，輕易被斬首示衆。先進的知識份子，無疑是民主社會的前鋒。然而，其有賴一股雄厚的社會力量的支持。否則，我們的民族並無太多祭神的李一哲、魏京生。



所謂「經濟犯罪」去年深圳發生四萬宗，從上至下的
經商浪潮，已使政府無法控制。

中產階級——由於他們直接地操縱社會的財、政權力，他們的社會行為極為主動，主要地，只有中央極權使他們被動。作為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又不滿現狀者。他們自然地亦分出保守與進步兩派。甚至一個進步派的社會改良者，同時是一個猶豫不決的保守者。反之亦然。所以，其既是極權專制的鋒利爪牙，亦是最傑出驚人的叛徒。無論如何，這階級的總的社會傾向是：向中央明偷暗搶更多的社會財、政權力。以本身利益而言，金錢權勢令他們情不自禁；以社會利益而言，他們既是社會實權的掌握者，最明白社會的財路所在，最能操縱經濟運作，故社會欲動，他們先動，他們一動，社會牽動，他們不動，社會反動。

作為中產階級的前鋒鬥士——貪官、奸商，無論中共的無產階級拳頭多麼鐵硬，他們不知畏縮，一再犯科作案；無論共產主義的教條多麼美妙，他們沒有迷失。中共治下的工人，沒有一次出息的罷工；農民餓到鍋底朝天，沒有一次規模較大的出息抗議。只有貪官、奸商的壯舉，前仆後繼，波濤洶湧，驚天動地。這前鋒力量夾在社會的中間，上頭刀砍，下面火燒，而他們始終不渝地表達人的自然本性慾望，爭求人的生存權益，要好的生活，要富足，要豪華。在中國，只有這些貪官、奸商向抹殺人性的權威作最血性的挑戰和格鬥。這並非出自某種政治意識的蓄意而為，而僅僅是人的本性流露。

官僚特權階級——中共的高層官員。作為社會的既得利益階級，他們總竭力保守現狀。既為現存社會的創立者，對新社會、社會的變革最反動。一個社會最高權力的操縱和純寄生在權力上的階級。一方面，在保持既得利益和謀求更大權力上他們極其主動，強頑悍勇。而

另一方面，在社會各種勢力的衝撞游移中，他們又相當被動，因其必依賴下層勢力供養。雖然，權力的異化，通常可令他們神化，如毛澤東，但這種脫離塵土的權力天馬行空總會很快地回歸塵土。所以，單就這階級本身利益而言，感應情勢，迫於下層的變革社會壓力，其必然地也分出保守和改良兩派。但這階級的總傾向，始終會是不擇手段剷除異己的。無論改良派姿態如何高雅，改良總是有限，因為徹底的社會民主改革，說到底是社會搶奪、分割、壓制他們手中的權力。他們都希望國家強盛，國家威風，做個狗官也八面玲瓏。但他們總樂於界定一種絕對主義，這便是從馬克思的大部頭中抽出的這種或那種絕不會動搖他們權力的真理，而他們也總相信他們的權力越大越牢，人民會聽話，社會就一定會很好。這便是所謂的「四個堅持」。

並不否認人性和人的主觀精神對社會的功用。人的思想意識並不絕對地奴從於物質世界、經濟利益的轉移而轉移。任何一個階級，具社會良知、政治遠見、情操高尚的都不乏其人。任何社會都崇尚其自認美好的人格和社會道德。而這種意識力量雖社會功用偉大，却不甚可靠。甚至，故有的社會意識正是新社會最凶頑之敵。故並不懷疑中國共產黨人有治好國家的良心，但這種良心夾雜太多個人利益得失的牽纏和其自以為是的社會價值取向。社會的客觀存在，總使我們的民族過於指望道統和好皇帝，而不甚明瞭現代社會中各派勢力對社會政治的功用。有好的統治者固然好，而事實上好的統治者總可遇不可求，且絕無不受社會某種或多種勢力制約、護持的英雄偉人。故與其寄望運氣、寄望統治者的天良，不如寄望社會的實力；與其寄望人的大公無私，不如寄望人的

利字當頭。利益所繫，主要地決定了人們的社會意識。利字總在挑大旗，領導歷史潮流。故我們有很多優秀的民主鬥士，却得不到社會起碼的支持，得到的是最無情、最無人性的殘害；我們有很多可哀的、為國為民的中共領導人，如劉少奇、彭德懷，都死於非命，死在他們同志手中。鄧小平可說權傾天下，萬眾喝采，曾幾何時改革又大開倒車，又有多少人頭落地。翻翻捲捲，是權力者的窮凶極惡，權力者派的利益爭鬥傾軋。正因為社會沒有一股基於本身利益而激發的、雄厚的新社會力量，確定社會的追求方向，支持和保護他們的鬥士，有擔當、有能耐、不罷不休、死纏爛打地勇往直前，故所有本改良社會願望的明君良臣、仁人志士，或受思想、路向所限、或受權勢牽纏挾制，所作所為都非社會真正所望，甚至禍連天下，得出反效果。而勢孤力薄者，一遇阻力、強敵，不是藏頭縮尾，便是賠命受罪，一切都付之東流。

中共改革派的社會改革， 為中產階級的勃起打開了缺口

中共高層改良派的一系列社會改革，無論其有意或無意，都為中產階級的膨脹突開無數缺口，社會意義深重極大。其改良的動因，出自社會窮極思變的壓力，出自改良派本身治好社會的利益感和責任感。由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和西方經濟模式的成功，他們明白「市場經濟」、「私有企業」的妙用。但他們甚或整個社會似乎都未明白，一個中產階級成長的重要性（事實上，中共高層改良派的徹底性根本就可疑）。沒有一股中產階級激銳的力量支持和迫

使，高層改良派的走向勢必是理性專制。既不失其中央極權，社會又達至某種改良，是他們的最佳路向選擇。如此，則「四個現代化」僅見皮毛而已，因其失却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此外，理性專制全憑權力的自控，此一時的理性並不保彼一時的瘋狂。

中產階級的存在已歷史悠久，但作為一個可與社會各大勢力分庭抗禮、在政治上舉足輕重地位的階級，中國前所未有。中產階級的成長壯大，緣於人類向上追求的天性、緣於工業革命給社會帶來更多人發財致富的可能，進而有賴其本身實力的衝擊、社會意識的現代覺醒，亦有賴特權階級的開明禪讓、甚至扶助，以及社會的廣泛響應支持。一旦其勢力形成，其必追求社會更大財富，從而其必始終信守自由經濟、民主政治。事實顯見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一個工業革命開創的現代先進國家、一個人人民生活富裕的國家不可或缺條件。否則，它無以適應機械的急促運轉、生產成本的最底計算、商品的最快流通、生產力的最盡力發揮。

中國民主社會的前鋒聞士 ——貪官與奸商

我們每見貪官就咬牙切齒（假如他們不是我們的親戚好友）。我們總要求官員的廉潔、要求社會公平、要求對貪官嚴厲制裁，却不給出路。在中國的現實中，假如我們是一個普通的官，怎麼辦？一個月的薪水，不足買妻兒的微笑，不足供稍為豐富的食用，去海外公幹，堂堂民族的代表，雖然有公費補貼，還是像個乞兒。兒女下放農村，吃的是蕃薯、稀飯、窩

窩頭、鹽水，我們能不管？能不走後門子謀善策？能不掙外快、送禮交結、有讀大學的機會、有好的工作職位、有出國的門路，我們能不先爲自己的兒女設想？（我們在洋人面前總十分誇耀中國的家庭倫理）。中國十億人口，擠塞在耕耘了幾千年的窮山惡水裏，且長期備受極權均富主義的壓制，斷絕財路，人與人爭食，狗與狗惡戰，有幾人能在伸手可及的福利面前，保持窮鬼的操守，甚至禮讓？

官不是青天大老爺，也不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的代理，要請好的代理，就得出好的價錢。

中共黨官可說無官不貪，不貪污錢財便貪污權力——憲法賦予的權力，甚或黨賦予的權力。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似乎黨官的權力無限膨脹，以致無法無天。事實上，其只有較大的執行指示權，而無半點執法權。因而，在公事上、在權力範圍的施政上，他們只有被動地奴從指示，對指示誇大或縮小。至於偏離指示，也是對指示的領會錯誤、愚昧或精明的解釋，而有所謂的獨斷獨行；在私事上，也是對指示似是而非的胡亂、轉彎抹角的解釋，而假公濟私、偷雞摸狗、濫用職權。蓄意背離指示，則已是反黨行爲。所以，這些人民的代理的權力實在小得可憐，根本沒有法定、受法律保障的施政權，沒有法定的、天公地義的營私權。因而動輒犯錯誤，被扣帽子，鬥倒鬥臭、撤職查辦，收監扣押。

一個省長、市長，甚或廠長、鄉長、村長（黨官）的起碼權力是，他們根本不須理會黨中央、黨主席放什麼屁，只依法辦事、一個辦事得力的官員，無論其權力來自黨或人民，其必須有獨立專有的權力，權力的監督平衡是另一會事。



▶ 重慶人民賓館前的小商販。



▲ 海南島掛著紅旗的走私船。

我們每見奸商（假如他們不是我們的親戚好友）也恨，如果我們在他們手上吃虧，就尤其恨。貪是人的本性本能，也是人類社會的推進力。誰都希望賺更多的錢，過更好的生活。奸則是貪的策略。貪而奸意著奮發鑽營，其首先帶給社會的是好處。其次貪而奸的極端傾向才是壞處。所以，一個正常的社會首先必須給社會中人充分的機會去貪去奸，然後才是可免則免的立法防範。從而社會才有最高的積極性與競爭性。尤其是一個正在起步的落後社會，政策更宜一隻眼開一隻眼閉，所謂放手發動，且有容忍錯誤與小罪行的雅量。追求社會的絕對公平正義，凡是監查壓制，勢必導致專政機構的龐大，和極權獨裁。結果，理想與現實恰好相反，社會總是吃大鍋飯，看著鍋底朝天，被專制極權剝盡自由。

其咬牙切齒。這種人，唯利是圖，奸謀百出，尤其當他們發財致富，一身銅臭的暴發戶嘴臉，最令人憎惡。現代社會，無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是商品交易的生產方式。爲富不仁，商人、企業家、投資者無不以利潤爲首要目的，無不各出其奸。官是政治的代理，商人等則是經濟的代理，同樣地，要請好的代理，就要出好的價錢。只有這些人在社會的重賞之下，顯其智勇，削尖腦袋，苦心經營，才能使社會的財富迅速擴增。現代的社會十分明顯的表明，只有少數人極富，才有許多人的中富，而有多數人的小康小富。絕對的平均絕對不可能。均富只是程度上的均富。人的存在就是基於本身的機能需求和慾望而存在。私是本性，公是私的極端傾向的平衡約束。

在目前的中國大陸，我們可以知道誰是危害中央極權的貪官與奸商。但誰是真正危害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發展的貪官與奸商，却沒有定

義。在現代社會，天公地義的經濟行爲，中共却橫加罪名，既無法可循，更無所謂真正立法。祖先代代留傳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却似乎一代代地被忘掉它的含義。貪官、奸商是水，水可以害我們，亦可以利我們。施高壓，堤堤壩壩，水仍是決突而出，挺而走險，禍害社會；開缺口，引導放縱，水却造福天下。

一個社會要真正強盛、 民主 就得有一個強悍 壯大的中產階級

要社會真正強盛、民主，就得有一個強悍壯大的中產階級，要造就這樣一個階級，社會就得給出路。這並非意味階級對立、階級優劣。一個壯大的中產階級的成員來自社會的四面八方，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無業遊民，正意味社會的富有共和。

無論中共治國的功過如何，今日的中國已遠非二、三十年代中共起家時的社會狀況。無論社會歷經如何的艱苦厄運、重重災難，工業的體系已經建立，社會已相當程度地擺脫純農業國的社會意識，這是現代社會的必然走向。工業社會的出現，使社會的個人、小群體的社會能力史無前例地極度增大、抗天逆命，任從人的才能發揮，社會不再是一個聽天由命、信息遲鈍、孤立無援的社會，從而社會不再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獨裁的中央強權對社會作絕對唯一的統一規劃、通達信息、甚或救苦救難。

因而，當社會實行自由經濟，人民自然會力求公平競爭、力求依法獨立公正，這是根本利益所係和競爭中勢力平衡的結果。當人民掌

握到社會的經濟權力，就勢必尋求他們的政治權力、他們的政權代表，而有民選議員、甚至總統。他們勢必隨時警惕，群起監督他們的政治代表和所有的政府官員，隨時隨地地揪出任何貪官污吏。進而，一個以消費者爲衣食父母的社會，奸商自然會減少。雖然不孝子總會出現，這是人性的矛盾，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當社會政治清廉，法律清明，自然對奸商做有效的約束。

這種自然趨勢，只有社會的貧窮落後造成落後的民族意識和專制極權可以阻擋。專制、甚或理性專制，權力失却平衡，總陷於泛政治層面的人事改良、腐化、改良、腐化的病態循環。事實上，專制權力越強，貪污腐化越驚人心魄。中共三十多年強權政治，從未有一刻遏止黨官的敗壞。真正有效的權力監督，來自權力的平衡，來自掌握經濟權力、真正意會自己是社會主人的人民。

一個貪官、奸商猖狂的社會，並不一定是壞事，而要看我們的社會如何處置而已，處置得好，就帶給社會無可估價的利益。

民主、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首先是物質生活的需要，然後才是精神生活的需要。這不是出自權力者的施捨，不是一種泛政治層面的修飾；而主要是社會的一種勢力，去求生存、求生存得更好，自發地，排除萬難地去建造，自覺地去執行，勇敢地捍衛，不斷地去完善。這個勢力便是社會的中產階級。今日台灣的民主呼聲日高，南韓的民主力量激昂，菲律賓民主力量的大捷，正顯示了其社會中產階級的雄姿英發。沒有中產階級這雄厚的社會力量，民主永遠是獨裁者奢談風月的、壓抑扭曲的、而人民普遍不關痛癢、莫明其妙的一塊無可奈何的空靈假（賈）寶玉。

●時事評論●

一項公開的民意測驗

「中航」與「華航」談判有感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帥晴霞

台灣中華航空公司與大陸中國民航——實際上是國共兩黨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首次談判。這一事件轟動了海峽兩岸，也轟動了全世界。報導、評論、分析文章，浩如雲煙。

我祇想強調二件事實，并略作評論。

第一，台灣國民黨當局原來總是宣傳：一旦與中共接觸和談判，台灣民心必垮，台灣就會大亂，并用此作爲自己怯懦的擋箭牌。這次國共借「機」談判，台灣黨內黨外齊聲稱讚，海外輿論一律鼓勵，台灣民心穩如泰山。事實做了最好的民意測驗：台灣人民并不怕與中共談、與中共通，怕談怕通的，祇是國民黨少數人而已。

第二，塗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華航貨機在廣州和北京停留時，吸引了大批中國大陸民眾，大家紛紛拍照，留下了這一歷史鏡頭，有人專程遠道而來，生怕目睹不到華航貨機的「豐采」。這說明，中國大陸人民對國民黨的「影子」重現中國大陸，抱著一種好奇、甚至歡迎的心理。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對中國大陸人民的一種民意測驗。

面對海峽兩岸的民意測驗結果，國民黨大頭頭們，你們還怕什麼？

中國大陸的強迫墮胎和戮嬰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鮑福

編者按：共產黨並不鼓勵殺嬰，但共產黨自五十年代末批判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鼓勵生育造成人口膨脹，到七十年代限制生育，推行「一胎化政策」，直接造成了目前的惡果。生育問題乃是人權問題，共產黨應在政策導向上制止殺嬰現象。據「人民日報」載，六十年代後期鼓勵生育時出生的一代，將在近年內形成更大的一次生育高峰，共產黨推行嚴厲的人口政策，將會導致許多不堪設想的惡果。本文作者是中國大陸的一名醫生，是「一胎化」政策的見證。

假如你問一個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什麼是「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他多半會搖搖頭，或者眨眨眼，事實上他的確也不曉得。但如果你問他什麼是「計劃生育」(BIRTH CONTROL)，你一定會得到肯定的答覆：「每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孩子。」儘管在大陸只講「計劃生育」，但當局對外却只使用「家庭計劃」這個字眼。其目的主要並不單是為了和國際上用詞統一，而是如一位官員私下透露的：「這種提法可以避免外國人反感，他們那邊是不准『處理』胎兒的」。

過去幾年，中國大陸的計劃生育確實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有當局發表的輝煌數字為證。筆者不打算在這裏撰文歌頌，而想唱點反調，揭露在這些數字背後駭人聽聞的另一方面。

在中國，上由國務院、各省、市、自治區，下及縣、區、鎮，乃至街道、里弄、廠礦、機關、農村村一級機構，都設有「計劃生育委員會」或「計劃生育辦公室」，以黨的書記兼主任，委員則多數是上了年紀的婦女們。這些委員工作十分起勁，包探包聽，能掐會算，諸如某某人上班時噁心，某某人近日喜歡上街買酸葡萄吃，某某人的丈夫最近自部隊回來探家等等，無一不在委員們掌握之中。委員會甚至還發表格要求每位育齡婦女登記月經來潮日期。假如那位婦女真的懷孕，是難以逃脫委員會雪亮的眼睛的。一旦發現了懷疑對象，所有有關人物都會出馬說服不該生育者墮胎，稱謂「做思想工作」或簡稱「做工作」。雖有時風聲鶴唳，將一時貪吃剛上市李子的女工誤認為妊娠反應而上門「做工作」，被人家臭罵一頓，撞了出來，但委員們對此是不會介意的。委員會向上邀功的總結報告常以被動員對象漫罵而堅持「做工作」作為資本。「做工作」常以軟的一套開始：我們當年子女太多如何如何的苦，你們今天只生一個怎樣怎樣的甜，這種回憶對比可以反覆多次。假如你實在不識抬舉的話

，好，對不起，委員和書記臉孔馬上一變：扣獎金、停工資、「辦你的學習班」，直至開除等等，反正你得答應墮胎不可。中國的計劃生育可謂天羅地網，很少有人能逍遙法外的。各地制訂的「土政策」更是百花齊放，令人聽了哭笑不得。生孩子要輪候名額，稱為「指標」。今年該你有指標了，發你一張「准生證」，憑准生證才能辦理戶口和糧食供應等。沒有准生證而懷孕的，叫做「計劃外妊娠」，胎兒必須刮掉或弄死，俗稱「處理」，拒絕「處理」而生下孩子的，叫做「超生」，是要遭受嚴厲懲罰的，地方報紙不時便登載有某某職工因「超生」而被開除公職的新聞。前幾年還允許生第二胎時，有些城市規定：即使有准生證的第二胎嬰兒，也只有任一方到醫院做絕育手術之後，憑醫院證明才可以登記戶口。這幾年一些地區更規定：凡某單位哪怕有一位職工「超生」，全體職工均要扣除全年獎金。這樣，一妻有喜，千夫所指，誰能抵抗四面八方的冷眼甚至責罵呢？所以這一手着實的靈光。挑動群眾鬥群眾，原本就不是四人幫的專利。農村地區的土政策更是五花八門。多數地區搞「雙聯包」，即有超生嬰孩者被收回全家承包的土地，有的規定由民兵拆除其住屋。也有懲罰較輕的，只征收罰款，超生一個罰五百元至

一千元不等，可以分期付款，五至十年還清，首期約二百元。筆者的一個農村親戚，即因超生而向筆者借過一百元去還罰款。比較而言，城市只准生一個，處罰「超生」較「文明」，以戶口和開除作威脅。農村則部分地區可以生兩個（特別是邊遠地區和山區），但處罰則很野蠻。「計劃生育手術隊」下鄉時，全村的男女「絕育對象」都被幹部和民兵集中起來，坐在臨時佈置的手術室門口等候結紮手術。「計劃外妊娠」的婦女東躲西藏，境遇和越獄份子一樣扣人心弦。被捉到了時，墮胎是免不了的。

中國大陸每年墮胎數字數以千萬計。當然這裏面大多數是自願墮胎（包括雖然希望再生一個而又懼於政策不敢違抗者）。三個月以下的胎兒一律使用人工流產（刮宮）。胎兒四個月以上者，用水囊引產：將一個伸縮性極大的橡皮囊（可用陰莖套改裝）置入孕婦子宮，再注入數百毫升無菌鹽水，若干小時後，被擴張了的子宮強烈收縮，把水囊和胎兒一起排出。六七個月以上的胎兒在排出後，即使扔在手術室的垃圾桶裏仍能存活幾小時，無人過問。近年來，更安全更方便的中期引產方法是注射天花粉，這是一種自中藥中提取的成份，效果非常可靠。不過，當局并不滿足，醫生們被要求研究自小剖腹取胎直至注射前列腺素等終止妊娠的方法。每年都有數百篇討論終止妊娠的文章發表於全國各級醫學期刊，有些還附有英文文摘。

然而，境遇最悲慘的莫過於父母拒絕墮胎而足月分娩的「超生嬰兒」了。凡到醫院分娩而沒有「准生證」者，嬰孩出生後即被置入一個特大的罐中悶死或浸在水中溺死。當此項運動初始而沒有經驗時，一些農村衛生院甚至使用沸水燙死嬰兒。不過這幾年，所有的醫院都



逃過殺戮大劫的嬰兒何其幸運



大街上的政治宣傳欄已讓給生育宣傳欄

統一地採用了一種「人道」的殺嬰法：當胎頭從陰道初露時，助產者即用一根長針頭刺入胎頭顱門，注入大量純酒精。一個沒有「准生證」的小生命就這樣「處理」了，他不會呼吸，不會哭，不會睜開眼睛來望一眼這個不要他的世界。助產者平靜地向產婦及其家屬宣佈她生了一個死胎。家屬除了狐疑之外毫無辦法，那怕你向法院投訴也不會有何結果，在這類案件中法院絕對偏袒被告一方。中國的「法治」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偶然有一些例外。一九八一年，一個青年工人因為第二胎孩子被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處理」了，怒火中燒，持刀闖入一個李姓婦產科女醫生家中殺了她。不湊巧的是「處理」他孩子的是另一位值班助產士——產婦本人分不清戴着口罩的接生者，錯認為姓李的。這位工人當然被槍決，法院佈告上羅列的犯罪動機故意模糊其詞：「因其妻在醫院分娩期間與醫護人員發生口角，遂萌殺人之心」。這個事件之後，該醫院至少幾個月不敢「處理」胎兒。不管這個青年工人的動機如何，客觀上他拯救了幾十條小生命。事實上即使是那位僥倖逃生的值班助產士也是迫不得已，假若她不幹，便會遭受記過、降級乃至開除等嚴厲處分。筆者有一位當助產士的好友說：「頭回幹那種事的時候，手直發抖，心像跳到喉嚨口。現在我『處理』了怕有百把個了，也不太怕了。只有一回夢裏那些被『處理』的胎兒扼着我的脖子討命，驚醒過來，才發現是我那寶貝兒子摟着我的脖子睡得正甜。」

出生在家中的「超生嬰兒」的命運也不見得好多少。計劃生育幹部們會毫不客氣地闖入產婦家中，迫她交出新生兒去「處理」。這種殘忍的謀殺常是另一樁更大流血事件的導火線。筆者曾目睹一樁：一個農村基幹民兵連長，

在他的家門口槍殺了五個威脅要「處理」他剛出世孩子的幹部，作案後他狂笑一陣，再將槍口對準自己腦袋，扣動板機。他的妻子和五歲女兒躲在屋裏瑟瑟發抖，旁邊是那個夫妻倆盼望多年的初生小男孩。

在公開場合，中共當局歷來否認這種「國營」的戮嬰事業，對無法遮掩的血案則全將責任推給具體執行政策的基層幹部。可是，如何解釋在從黑龍江到廣東，從上海到新疆這樣遼闊國土上千千萬萬的「超生」嬰兒被官方屠戮，而沒有一個兇手受到法律制裁呢？事實上，最高層決策人物才是這一系列慘劇的導演者。一九八一年，當時的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在一次計劃生育工作積極份子大會上傳達了鄧小平的「最新指示」：「只要你的人口降得下來，你用什麼辦法我都不管。」鄧小平是否真的講了這句話，人們不知。但陳慕華的確是這麼傳達的。陳慕華還給她的積極份子打氣說：「有（黨）中央給你們撐腰，你們怕什麼？」

至於外界早已熟知的親生父母溺斃女嬰的現象，可謂「民辦」的戮嬰事業。中國政府並不否認這種慘劇的存在，只是大大縮小其數字而已。這種民辦的戮嬰有三個特點：第一，只發生在農村而極少出現於城市；第二，規模比國營（即合法）的戮嬰小得多；第三，被殺嬰兒並不是「超生嬰兒」，只是因為父母希望獲得另一次准生證生個男孩而把女嬰殺了，因而這種戮嬰是非法的，是會受法律追究的。中國人歷來重男輕女，但近幾年來這種傳統的觀念也開始發生動搖。筆者接觸較多的城市市民中，多數認為：現今老了有退休金，用不着兒女贍養，只希望病痛時有個人在身邊照顧。既然只能生一個，女孩子倒是更有良心、更能體貼

些。男孩子娶了媳婦，就把爹娘給忘了。自然也有不少希望生男孩繼承香煙姓氏的「頑固份子」。但是在農村，情況大為不同。除了封建傳統比較頑固外，更重要的是農村沒有退休、勞保制度，農民需要男孩來負擔家庭重擔。女兒長大了嫁出去只能隨丈夫和公婆一起生活。雖說目下政府鼓勵男到女家，又保證要逐步解決農村「老有所養」的問題。但中共歷來朝夕改，說話不算數，何況將來家家都是一個孩子，誰願意獨生兒子到別家當倒插門女婿呢？爲了避免日後年老無依無靠的悲慘境遇，走投無路的農民只有忍痛殺了親生女嬰以獲得第二次「准生證」，希望下次能生個男孩。試想，假如中國真的不存在強迫墮胎，誰會忍心殺戮自己親生的女兒呢？

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最近訪問北美時，竭力爲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辯護，矢口否認中國存在強迫墮胎。筆者覺得：即使有那麼一天早晨，中共的領袖們真的在其他一切問題上實事求是了，他們對自己在計劃生育上的所作所爲也一定會百般抵賴的，他們幹的太見不得人了，連他們自己也未必敢正視。

寡頭政治、國家壟斷經濟和腐敗無能的幹部隊伍造成了中國大陸今天貧窮落後的局面。然而，到頭來受最慘烈懲罰的不是那些高官，也不是那種制度，反而是沒有做過一件錯事，本不應承擔半點責任的嬰兒。嗚呼！良心何在，天理又何在啊！

最近，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中國當局宣佈它將允許某些「有特殊困難者」生育第二胎。據筆者的經驗，在中國大陸，任何政策的最先受益者必是官僚特權階級。只有他們才容易爲子女謀取第二次「准生證」，再享幾次當爺爺奶奶的樂趣。至於普通老百姓，問題恐怕沒

那麼簡單，那管你真的有什麼特殊困難。

隨着包產到戶和個體經濟的繁榮，一些人開始衝破當局的壓力爭取「強行超生」了。全民所有制職工中也有不惜以身試法的。筆者有位當貨車司機的朋友，原已有一個女兒，四年前妻子又懷孕，死拖活賴地在親戚家躲到足月臨盆，廠領導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一窩蜂擁到他家，「做工作」要他把孩子「處理」了。外間正在軟磨硬頂，裏屋「哇」的一聲嬰孩出世了。朋友慌忙進屋一看，又是個女的。跟着腳後跟闖進去的委員們喜不自禁：「那就『處理』了吧！」朋友失望地徵詢妻子的意見：「怎麼辦？要不，就給她們吧？」滿頭大汗的產婦艱難地搖了搖頭。一條小生命就這樣保存下來了！到底因爲他人緣好，更重要的是廠裏只有他這個司機，所以沒有被開除，只是降級、記過、扣獎金、全局通報等處分。筆者臨出國前，這位朋友牽着那個不准出生的小女孩來筆者家中送行。不知是爲了節約支出還是爲了表示抗議，那小姑娘手中拿的「氣球」竟然是朋友用免費發放的陰莖套吹脹而成的。望着這天真活潑的小女孩和我的孩子開心地玩耍，我不禁稱讚道：「老弟，到底是你行，都長這麼大了。」朋友憂鬱地望着孩子嘆了一口氣：「早呢！現在還沒戶口，沒有糧食供應，連上托兒所都沒資格。將來不能上學還難說。到她長大了沒有工作會責怪我們：『當初你們爲什麼要把我生下來，還不如交給那些人去弄死好些！』」你說到時我會怎麼想，該怎麼回答呢？」

在中國大陸，強迫墮胎和戮嬰過去幾年一直在發生，今天也沒有停止，將來當然還會這麼幹下去。除非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自己起來制止這種慘無人道的、禽獸不如的暴行。

致中國之春的一封信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們：

到美國（紐約）一下飛機，便接到你們的刊物，到學校報到不久，又收到郵寄來的「中國之春簡訊」，你們的工作，可真做到家了。在國內就聽到「中國之春」的大名，當然對你們的雜誌也有幾分興趣。然而，在連續讀了幾期之後（有幾期是從這裏的老留學生那裏借來的），有些看法必須向你們指出。

（一）當前，國內上下一心都在搞經濟改革，幾年來，情況頗有改觀（這點你們不能否認吧！），發展下去，很可能突破原有體制。可是你們在那裏一味宣傳「改革必然失敗論」，你們在為改革打氣，還是洩氣？

（二）當前全國的大事是「把經濟搞上去」，三十多年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共產黨過去一直強調政治鬥爭，結果走了大彎路。現在，共產黨的改革派已在集中精力抓經濟，這是一條正路，一個大轉變。凡有志氣的青年，都應投身到實際的經濟改革中去。經濟上去了，人們才能逐步有民主的要求。現在，你們在那裏空喊民主，能夠解決什麼具體問題？百分之七十的農民歡迎你們的民主高論，還是歡迎包產到戶的經濟政策？

（三）我並不是說中國永遠不需要民主，我只是說，當前中國最需要的發展經濟，趙紫陽總理最愛說的就是：「請把具體辦法拿出來！」我很欣賞這句話。空喊是沒用的。只有經濟發展了，出了一大批萬戶和一批企業家——中國的中產階級，才能考慮民主的問題。否則，我懷疑你們無的放矢。像美國這樣的兩黨選舉，我們有錢搞嗎？

（四）發展經濟需要安定的環境。我擔心，如果像你們所說的，共產黨領導立即開放民主，則必然導致混亂的局面，那樣，連經濟建設也搞不成了。經濟不能搞大躍進，政治也是不能搞大躍進的！很多人不是說台灣民主程度強於大陸嗎？但那是經濟起飛、造就了一批中產階級的結果。

因此，我還是勸你們的大多數人回到大陸去，多「把具體的辦法拿出來！」，把經濟促上去。

不對之處，請海涵。

（中國大陸研究生）于世濟

一九八六年元月

中國之春的公開覆信

于世濟同學：

你的來信反映了一種流行的思潮，類似的信我們也接到一些，放在此一併作答。

你的來信中，有著「經濟決定論」的深刻陰影，即：經濟是決定的因素，經濟上去了，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才會到來。要全面說清楚你信中的幾個問題，是不容易的，但我們願表達如下數點意見：

一、我們對大陸經濟改革取得的成績，一直採肯定、支持的態度，這在中國民聯二大決議中，有具體體現（見中國之春三月號）。我們並不是「改革必然失敗論」者，但我們堅信，如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經濟改革，尤其是城市經濟改革，不會取得預期的成效。何謂改革失敗？何謂成功？要討論清楚，先要界定一個共同標準。深圳特區算不算失敗？你可以認為它很成功，但一般認為，與台灣、南韓當年的加工出口區比，深圳應該算（起碼到目前）夠失敗的了。

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過程和所取得的成績本身已經做了說明，在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對於經濟改革是必不可少的。鄧小平先展開「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推倒了毛的神像和人民公社的神話。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果斷的政治體制改革——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於是，包產責任制才得以順利貫徹。可惜，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上，改革派未能表現出以前那樣的大的魄力。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清楚：如果不在意識形態上為私有制、私人僱工等問題鳴鑼開道，如果不能解除各級黨委對大企業的控制，中國的工業起飛是辦不到的。至於具體建議，我們一直在提，如實行地區承包等。但是，思想不進一步解放，一些合理的建議，改革派是不敢採納的。

三、我們並非要求中國一下子達到西方的民主程度，這是不可能的和不現實的。但中國應該開始向民主起步，如允許民辦刊物的出版等，先給老百姓自由討論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權力。我們目前只要求參加討論的權力，這能叫政治大躍進嗎？

為更好地答覆你的問題，本刊組織了一些專家進行討論，希望你、也希望各位讀者在讀完本期專題後，進一步發表意見。

祝好！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六年五月廿日

制度！

政治、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必須齊頭並進

楊力宇教授談中國大陸的改革形勢

● 本刊記者 ● 楊漫克



编者按：楊力宇教授，生於一九三三年。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後來美就讀於斯坦福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楊教授早期研究興趣為中國現代文學，著有「中國現代小說論」。現任西東大學亞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轉為中共政治和政策，在海外各報刊雜誌上發表了許多中國問題的評論文章，提出很多精闢見解。

本文發表前，已經楊教授本人審閱。

文中「中」代表中國之春「楊」代表楊力宇教授。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問題

中：我們今天採訪楊教授，主要想請您談談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問題，現在大陸有些人深受「經濟決定論」的影響，認為中國目前急需的是發展生產。祇要經濟上去了，出現中產階級，中國才有可能走向民主的道路。而現今生產力的水平，還不適於搞民主化政治。您可否對此看法，給予一個總括性的評論？

楊：我個人完全不同意「經濟決定論」的觀點。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先要問這麼一個問題。如果說目前的經濟改革就是為了

經濟本身一個目的，那麼這個改革，在我看來意義不大。進一步說，中國現存的主要問題、關鍵問題在哪裏？有人說，中國的基本問題是經濟，我認為不然。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國幾十年，即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所遭遇的問題，從根本上說，絕大部份是政治問題。這些如果不被正視和解決，大陸經濟很難搞上去。過去，中國大陸三十多年裏，也搞過許許多多轟轟烈烈的經濟運動，如五八年的「大躍進」，成績是「慘不忍睹」，確切點說，是完全失敗。政治搞不好，還停留在原來的階段，不能保證和配合經濟發展，經濟是上不去的。經濟想超越政治，跳過政治，在我看來可能性不大。

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民主政治是經濟發展的保障。美國在荒原上建成世界第一強國，足以說明問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能

說明此一問題。

中：我們也想研討一下台灣例子。就政治而言，多數海外學者都認為，她還是一個權威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但多數人也會同意，台灣政治民主化程度，要領先於大陸。持「經濟決定論」觀點的人，認為台灣民主化程度之所以高於大陸，乃因台灣的經濟比大陸好許多，出現了中產階級，才推動了政治的改革。故大陸也祇能按此途徑來發展，您如何評論這種說法？

台灣的例子並不支持

「經濟決定論」

楊：對這種見解，我是持保留態度的。台灣經濟起飛，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事情。大約在同時，台灣政治也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如台灣縣、市長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自由選舉。至少可以說，台灣的經濟、政治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同樣，在七十年代中期，台灣經濟持續發展，而在政治上，黨外反對力量也明顯化了。這說明，政治與經濟發展，是齊頭並進的。至於有人說，台灣的政治改革是中產階級出現以後的事，這不符合事實。在中產階級尚未變成一個重要力量以前，台灣的民主程度已經相當高了，台灣已經開始自由選舉了。大陸到今天還沒有做到真正的普選。

中：您以前曾談到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蔣經國在獲得權力過程中，對台灣政治進行了一些改革，給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您可再詳述一下這個過程的細節，因為我們大陸來的學生，對台灣瞭解不多。

楊：七十年代中期，蔣經國在台灣主政後

，對政治做了三個方面的改革。第一，對台灣黨外的反對聲浪和民主要求，增加了容忍性。政治上容忍反對派的存在，是很大的進步。很顯然，黨外運動日趨強大，是蔣經國上台以後的事情。當然這種容忍，還有所謂「限度」，黨外如果進行獨立運動或推翻政府，我想國民黨還是不會容忍的。

第二，蔣經國一改蔣介石時代限制台灣本省人權力的做法，增加了台灣本地人的政治參與與代表，李登輝副總統等許多台灣人權力上升，即為明證。蔣經國認識到，台灣人畢竟是多數，多數人的政治權力一定要加以重視。所以，今天國民黨的中常委十四人是台籍，佔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三，在言論上，蔣經國做了很大程度的開放。黨外言論、民刊言論，可以自由地批評國民黨，這是民主的重要內容。當然，也發生過許多黨外雜誌被禁被抓的事件。但總體上看，容忍程度相當高。當然，要拿美國的言論自由程度比台灣，當然有相當的距離。我五八年離開台灣時，是想像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言論自由的。

以上三點政治改革，不但在政治上使台灣人民享受很多權利和自由，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大陸今天祇提經濟改革，不談政治改革，我想問題和矛盾必會積壓起來。

中：我們認為還有一點很重要，即在台灣實行的市場經濟制度，而大陸是計劃經濟制度，兩種經濟制度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後者對經濟發展束縛太大，您認為對嗎？

領導人的觀念意識亟待改變

楊：這很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束縛作用，已被近三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再加上大陸政治上犯的一系列錯誤，經濟發展自然要落後於台灣。

今天大陸的經濟改革，我認為不是根本的改革，其實是一「小腳放大腳」，引進市場經濟因素，祇是作為一種調劑，而不是做為一種基礎。很多美國人樂觀地、天真地認為大陸這樣改下去，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我想，政治上沒有相應的改變，就沒有這種可能。從中共領導人最近三番五次的講話看，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意識形態，恐怕不能容忍大陸經濟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他們祇借用了西方和台灣的一些經驗而已，基本上還是搞嚴格控制的計劃經濟，不能發揮個人和地方的才能與積極性。

中：還有一種看法說，美國和西方政治的穩定，是由於形成了兩頭小、中間大的中產階級。根據您的研究，您對此說有何見解？就是說，民主政治和中產階級，孰因孰果？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政治嗎？

楊：美國與中國政治制度不同，情況也不同。美國首先是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制度，然後有經濟的發展。美國建國時得天獨厚，資源豐富，既沒有赤貧，也沒有巨富，其政體和制度也為美國人創業和充份發展創造了機會。而中國就不同了。四九年以後，中共消滅了資產階級，全部變成無產階級。要靠無產階級創造出中產階級，我想可能性太小了，我持懷疑態度。

中：中國大陸現在不是有「萬元戶」了嗎？能否把「萬元戶」看成是中產階級的萌芽？

楊：大陸究竟有多少「萬元戶」？我問過

很多大陸來的學者們，說法不一，但不會超過十萬戶，與中國十億人比，「萬元戶」百分比太小，何時才能形成「中間大」的中產階級？再者，所謂「萬元戶」，不過三千美元左右，在中國是巨富，在世界上是算不上中產的。故「萬元戶」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來看，都太小了。中國想要創造中產階級，以現在的狀態和進程看，恐怕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了，怎麼可能呢？

中：我們先假設大陸保持今天的政治狀態不變，經濟能夠發展起來，那麼，今天這樣的政治，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會受到後者很大的影響嗎？

經濟現代化不是完整的現代化

楊：可以說，至少到目前為止，「文革」後十年的經濟發展，還沒有對政治造成很大的影響，祇是有限的局部影響。至於以後經濟發展了，政治會怎樣？很難預料。最近一些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口號和做法，都可以看得出來，還是祇強調經濟建設，很少強調政治改革。

我重申我的基本看法：經濟的發展，不可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制度問題，還有意識形態的問題和教育問題。經濟現代化不是一個完整的現代化，還要有政治、意識形態、制度和教育各個方面同時並進，才是真正的現代化。比如說，軍隊國家化是現代化國家的主要特點之一，是民主國家政治穩定的重要條件。我曾提出過這個問題。一個黨要控制軍隊，靠軍隊來維持政治，怎麼能叫現代化的國家？從今天中共領導人的

表現來看，不可能有政治上的重大進展。

中：請問楊教授，大陸開放以來，您接觸過許多大陸來的訪問學者，您也去過北京，見到了中共領導人，您是否曾把您這些觀點向他們闡述過？他們的反應如何？是否同意您的看法？

楊：我談過許多。遺憾的是，他們大都聽不進去。對海外人士，他們是客氣的，但觀點聽不進去。對「軍隊國家化」這樣的敏感問題，他們是不願意談的。

大陸來的學者，情況參差不齊。少數對西方民主看得比較仔細，觀察也很敏銳。從他們身上，還能對中國未來政治改革看到些希望。但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從我所接觸的），或祇是想學點科技，或者祇關心買便宜東西，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關心政治改革的不多。大陸派出來學社會科學的人很少，而且素質較差。

中：您指的是知識面還是能力？

楊：我說的是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大陸出來學社會科學的，對民主政治的感受，相當有限。對美國民主生活的各個層面，常常理解不了，更談不上自己的感受了。這可能與在大陸多年受馬克思主義薰陶有關。還有的人，在美國時，思想蠻開放的，回去後一當官，說話口氣完全變回老調子，令人失望，我認識一些學者就是如此。

中：有些西方學者，在研究了南美和東方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後，得出這樣一種結論：發展中國家為了謀求經濟的起飛，需要政治上的穩定。而這些國家的極權政治，正是他們政治穩定的必要方式。因此，這些國家的人民為求得經濟的發展，就要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以犧牲政治上的民主作為前提條件。對

這種結論，您有何看法呢？

極權國家難以經濟繁榮

楊：我覺得這種理論是非常可笑的。我想先反問你們，能否舉出例子，世界上哪一個政治極權的國家，享受了經濟繁榮？

中：有人舉出南韓做例子。

楊：就南朝鮮而言，究其政體和國體，畢竟不是一個極權很強的國家，也不是一個共產制度的國家，她的民主程度不比台灣差。南朝鮮的總統是選舉產生的，而且有合法的反對黨。

中：我們同意這一點。從政治學上講，台灣與南朝鮮仍屬於權威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與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是有區別的。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政體，不僅對政治，而且對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全面控制。我們想進一步探討，假如將來中共真把經濟搞上去，有了經濟王牌，會不會更加專制？如當年希特勒就是如此。

楊：首先，我認為中共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經濟繁榮的可能性很小。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達到了真正的經濟繁榮。拿蘇聯為例，以七十年的發展，以它的國力和廣大的資源，以俄國人的才華，沒有理由搞成現今的經濟水平。

但我想，中共如更加專制，回到毛澤東那樣的時代，是不大可能的，但照目前的發展，中共政治未來三、五十年也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甚至不大可能達到台灣今天的民主程度。

中：您的三、五十年，大概看得太悲觀了

些。我們想歷史發展有許多偶然因素，是出乎人們意料的。中國能像今天這麼開放，派出這麼多留學生，這在十年前，都是難以想像的。

楊：當然，我們不否認中共在發生變化，但它對不同意見、對民主要求的容忍程度，離海外的要求差得太遠了。我們要求的政治改革是「大腳」，不是「小腳放大腳」，小腳放開也是長不大的。

中：到中共第三梯隊，例如像胡啟立這樣的人掌權後，會不會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呢？

楊：我看第三梯隊實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略大，但將來的第五、第六梯隊或許更有可能。

貧窮國家亦可建立民主政治

中：還有一種見解認為：中國是農業傳統國家，現在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還是農民。那麼，在這樣一個農民國家，想建立民主政體是做不到的。您看這種說法有無道理？另外世界上有沒有一些國家是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建立民主政體的？經濟發達是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

楊：我想祇是必要條件之一。經濟落後國家建立民主政體的例子很多，比如印度。在亞洲，除了日本，印度是最民主化的國家之一。可是印度經濟那麼落後，大部份人民也是農民，所以農民國家不能建立民主制度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經濟發展對促進民主發展是有幫助的，但不是個絕對的條件。

今天大陸的經濟狀況，我認為比印度要好。問題是領導人不想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若想，可以培養民主意識，加強民主教育。大陸的社會科學教科書，我也看過，完全沒有民

主思想的教育。像中共這樣的政權，教育人民是不難的。教科書首先應該修改，培養民主意識。

中：中國最需要哪些民主意識呢？

楊：針對大陸目前狀況，多黨或兩黨議會政治的意識最需要。反對黨對民主的實行太重了。大陸所謂民主黨派，祇是一個花瓶。最近「人大」和「政協」有了一些「熱烈討論」，還僅僅是討論而已，決策權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幾個人那裏。決策過程自上而下，是沒有變的可能。

中：最近胡喬木、李鵬多次強調經濟改革不能放棄政治工作，中共意識形態還是舊的一套。

「四個堅持」是民主化的障礙

楊：中共還沒走向意識形態現代化，最好的證明是「四個堅持」，黨章與憲法都寫進去了。中共堅持馬列、毛的思想，這種做法有不切實際的地方。我認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已被歷史證明是破產的理論，給中國造成這麼大的禍害，還要堅持什麼？

中：有一種看法認為：「四個堅持」是鄧小平主動提出的，是想堵保守派的嘴，是一種很高明的政治韜略。鄧的實際做法乃與「四個堅持」背道而馳。但鄧小平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不得不這麼做，對這種合理化的解釋，您有何看法？

楊：這是很意思的見解，我倒沒有想過。但我看不能這麼解釋。鄧在上週會見香港商人霍英東時，還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不管是不是策略，我個人堅決反對「四個堅持」，因

為這已經成爲中國政治、經濟向前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也是統一中國的最大障礙之一。台灣也講：「四個堅持」存在一天，台灣就一天不談。中：那您認爲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是否應該再次修憲？

楊：是的，但修改憲法最近不大可能。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經濟決定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您對這一理論本身有何認識？

楊：馬克思主義的很多論點，都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如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按照馬克思想像的那樣發生在西歐，反而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這種理論錯在把人類社會并行的幾個因素，變成有輕有重，一個決定另一個，必會造成混亂。

中：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根據歷史上的一些例子，一種新型的社會制度出現，往往是文化模式產生經濟模式，再由經濟模式產生政治模式。但也有相反的衍化過程：先搞起政治制度，再建立經濟模式，逐漸影響文化傳統。前者如英國；後者如日本。中國古代各少數民族，也是先學漢人的封建官制，再推廣農業租佃經濟。因爲政治制度可以一下子建立起來，而經濟模式要有長期的發展才能形成，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楊：這種看法有事實根據。如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沒有資本主義經濟。但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到本世紀初，日本便已成爲現代化的強國了。但日本和台灣的例子都說明，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齊頭並進，才是較爲自然的、收效迅速的變革。

導向民主政體的六個條件

中：根據您的研究，您認為導向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有哪些？

楊：首先是教育，中國人民需要民主意識的教育。第二，經濟當然是條件之一，在此不做贅述。第三，民主需要不同政黨的制衡，反對黨的存在是重要條件。第四，要有比較完善的制度，如議會制度、三權分立等。

中：有人問：菲律賓的制度是美國的翻版，怎麼也出現馬可仕的專制呢？

楊：對，還要有第五個因素，就是人。領袖沒有民主概念的話，再好的制度也不能絕對保障民主。但是，制度建立起來，走向獨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西歐祇出了兩個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前後不過十年。第六是意識形態。統一思想的意識形態，祇講一個主義，必然走向專制。執政黨觀念的現代化，尤其重要。我講這六個因素，沒有否定經濟的作用。六個因素都要現代化，才能建立牢靠的民主政治。

中：您對大陸的民主發展，有沒有具體建議？

楊：如前述，我的建議很難發揮實際作用。

總括大陸最近十年的發展，可以說，經濟走了一百步，政治走了十步。如果領導人能夠改掉舊的觀念意識，真想實行民主，第一件可做的事就是民主教育，修改教科書。反覆宣傳民主理論，改變觀念很重要。第二就是搞各級普選。這些都是應該、而且目前可以做到的事。中共政權現在沒有外力能威脅它，有什麼理由不搞普選呢？還是領導人思想水平問題。

中：您的談話對我們啟發很大，謝謝楊教授接受我們的採訪。

●向海峽兩岸建言●



破縱連橫，

調動經濟

自身活力！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馳 遼

大陸城市經濟改革新近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搞起橫向經濟聯合，打破過去龐大臃腫的官僚體制和縱向部門經濟管理系統，擴大了企業自主權，調動起地方經濟的特殊優勢。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根據計劃經濟

模式，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縱向經濟管制系統。各部門在產品銷售、生產資料分配上都必須按部門從中央安排，形成條條分割和塊塊管死的僵化局面。例如，一個鋼廠和一個煤礦，本來互相需要原料供應，但由於部門不同，無法發生經濟聯繫，哪怕祇是一牆、一街之隔，都要從上面的主管部門按計劃調撥，既費時，又增加交通運輸的負擔。工人們形容這種管理為「脫了褲子放屁，費二便事。」經濟自身的聯繫，完全被人為破壞。經濟就像一隻大象，在密植的大樹林中，行不得半步。各部門企業之間、城市之間、地區之間，無法發生經濟活動。

自從趙紫陽總理在「六、五」計劃中提出擴大企業自主權，變指令性計劃為指導性計劃和發揮市場調節的三大重點改革內容後，以遼寧的瀋陽和湖北武漢為主的六十一個試點城市，從八五年以來紛紛搞起橫向經濟聯合體，經濟出現了生機和活力。企業由單純生產型向經濟開拓型、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出現了協調的良性循環。遼寧省迄今直接從協作項目增加工業產值十四億元，實現利稅二億三千萬元，勢頭正健。

最近，瀋陽、武漢兩大中心城市都提出了振奮人心的口號。瀋陽提出「復興瀋陽，搞活遼寧，服務全國，走向世界」；武漢則提出「復興武漢，帶動湖北，繁榮全國，走向世界。」壯志勢比崑崙。

橫向經濟聯合初見成效，正如農村經濟改革所說明的問題一樣：祇要中央一放鬆，經濟就會活起來。尼克松當年在北京曾向毛澤東介紹美國經濟成功的經驗，就是一條：「交給地方管！」祇要破除官僚人為的縱向計劃束縛，經濟本身的橫向聯繫一疏通，經濟就會上去。我們說，破縱連橫好得很！



政治和經濟……

一把剪刀的兩面鋒刃

訪齊錫生教授談大陸

面臨的政治改革

● 本刊記者 ● 中國大陸留學生 林秦俠

編者按：齊錫生教授，江西省人，生

於一九三七年。早年在台灣東海大學就讀，來美後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現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任政治學教授。齊教授對東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前途也極為關注，曾多次應邀去中國大陸訪問、講學。

本文根據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採訪錄音整理，因時間關係，未經齊教授審閱，本刊負起文責。

文中「中」代表中國之春

「齊」代表齊錫生教授

經濟決定論是畏懼

民主心態的表現

中：現在大陸中央領導人及海外留學生中，存在着這樣一種看法：中國目前的經濟尚不發達，故提倡民主政治為時過早，祇有經濟上去了，民主才能爭取和實行，甚至水到渠成。請齊教授談談對此觀點的看法。

齊：這種觀點并非大陸特有的看法，在許多極權國家，或者是不民主的國家，在走向民主的過程中，都曾經或者會出現這種言論。把它叫做「經濟決定論」也好，「經濟迷信論」

也好，都是統治者的一種心態，希望人民最好不要主動爭取民主。他們怕民主的爭取會出現一些控制不了的狀態，如流血革命，政權更疊等。

統治者總是有些畏懼民主，找出一切藉口把民主的時間向後推延，至少今天不要干擾自己的職位和現行的政策。許多當權者認為民主意味着混亂、七嘴八舌，人人不安份守己，可能打亂當權者執行政策的步驟。這是典型的極權執政者心理。

苟安、僥倖心理不能自救

中：那麼民間的心理因素是什麼呢？

齊：民間的心理因素有些複雜。以大陸來講，八二年我回去的時候，已經聽到過這種觀點，甚至許多知識份子都抱有這種態度。他們說：「三十年來，突出政治把國家搞慘了，現在終於安定些，應該搞生產。魏京生這些民運人物，雖值得同情，但事情鬧大，把共產黨惹火了，就會回到文革或五七年時的極端狀態，今天得到的一點點自由，又會被沒收了。」

這是在極權社會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民，終於有機會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喘一口氣時產生的一種近乎苟安、僥倖的心理。這種心理動機雖與執政者不同，結論却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問題是這樣的願望是否切合實際？我持不樂觀的態度。從西方的例子來看，民主是要靠全民的努力爭取才達成的。如果人們現在避開政治上刺激性或尖銳迫切的問題不談，埋頭把經濟搞上去，民主就會水到渠成，在我所瞭解的政治史上，還不能找到先例。

民主的爭取，不論是窮國還是富國，都要經過幾代人不懈的努力，而不是說，等到國民所得達到一千元或兩千元美金的標準，民主就會降臨到頭上。

民主沒有界定的 經濟發展程度

中：有人認為經濟發展後，才有教育的普及，民主意識才可能建立，否則即使實行民主了，老百姓也會拒絕接受，因為他們不懂什麼是民主，也看不到從民主能得到什麼好處。

齊：這種說法引出了很多問題。首先，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否與中產階級有那麼大的關係？最先出現民主政治的國家，該國的經

濟是否就已達到某一界定的程度？種種歷史事實的回答，可以說是否定的、懷疑的。英國的民主，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美國的民主也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什麼叫「經濟發展了」？如果我們用一個粗糙的國民經濟平均所得來衡量，英美在建立民主政體和民主生活成爲人生活主要部份的時候，兩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自然比不上今天許多經濟落後的國家。可見建立民主的經濟水平是不能界定的。經濟發展對民主建設的好處自不待言，但不能說經濟就是一匹馬，民主是後面拉的車。這樣的公式是不成立的、荒謬的。

中：您能否闡述一下民主與中產階級有何關係？有因果關係嗎？

齊：好！以英國爲例，英國民主政體的建立，與中產階級無甚關係。最初提出民主，是與皇室爭權力的英國封建貴族和領主。後來城市發展後，出現商人和行會，他們又向政府爭取民主，爭政治發言權，爭代議權。後來的中產階級，祇是民主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的參與者。美國現在有婦女爭民主，有黑人爭民主，還有同性戀者也爭民主。可見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社會角色，出來成爲民主的推動者。把中產階級與民主劃等號，是以偏蓋全的提法。

至於中產階級的概念，本身就難以界定。中產階級的說法在美國很流行，因爲很多美國人在主觀上（不是在統計數字上），自認爲是中產階級。這種主觀意識，不見得與客觀經濟事實相符。如美國的藍領階層，在民意調查中，很多都認爲自己是中產階級，他們是有錢的。而歐洲的國家，如法國、意大利，那裏的藍領階層，也很有錢，但仍把自己視爲勞工階級，而不認爲是中產階級。他們還認爲自己是被剝削的，組織工會去爭福利。美國的等級觀念

不強。

所以，把美國的民主和美國的中產階級聯繫起來看，是一種不嚴格的推理。把民主生硬地和經濟水平聯繫起來，必會忽略重要的一點：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個人生的態度，是一個處世的藝術。民主不像是一部汽車。一個政治落後的國家的人，祇要有錢，汽車很快就成爲生活的一部份。然而民主却不是這樣，要經過不斷學習，不斷琢磨，不斷努力才能成爲生活的一部份。

同理，中國現在在改革中遇到了這麼多的困難，並不是因爲改革政策和條文定得不好，而是因爲執行政策的人和被改革的對象，根本不能夠體會改革的精神。所以上面很好的一個方案，落實到下面，就搞得一塌糊塗，每個人都去搞自己的偷雞摸狗那一套。

馬克思經濟學說的人性盲點

中：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拋開現實不談，您對這一理論本身，有何評價？

齊：我不敢說對馬克思這種理論有何研究。不過我覺得馬克思主義學說裏面，恐怕有幾個大的盲點，使之不會成爲一個很堅實的社會學理論。例如：馬克思談階級性，否定人性和個性。這對於中國這幾十年來的政治、經濟的發展，造成很大障礙。中共教育大家生產勞動是爲了集體，爲了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爲了個人生活的幸福，這是天經地義的馬克思主義。然客觀結果就是大家好吃懶做，因爲幹與不幹與個人是沒有差別的。

按經濟決定論原理，民主要在一定的經濟條件具備後才能達成，這忽略了民主在西方產

生的文化淵源，同時也不能夠解釋為什麼今天許多經濟落後國家同樣可以實行民主，比如印度、菲律賓等。而按經濟決定論已經可以充份實行民主的國家，並沒有實行民主，如蘇聯與東歐諸國。我個人認為中國民主化很大的危機是到現在還沒有把民主思想的種子，播種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是現在應該做的。然而，從現實的政治眼光看，把共產黨轉變成一個有民主共識的黨，暫時是做不到的。較實際的做法是：不斷有人把民主的意識一點一滴地帶回國去，而且身體力行，把民主原則和民主風度普及在國民的生活之中，說不定五十年後，中國可以漸漸走上民主。這似乎有些悲觀，然幾年來，中國在民主教育和共識上，幾乎是一張白紙。思想傳播工作是目前為中國民主運動打根基的最好辦法。

福利社會主義比公有制優越

中：現在大陸改革實質是引進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式和市場經濟原則，但同時又抱著「四個堅持」不放，兩者形成了尖銳的矛盾。當前政治上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解決了這個矛盾，經濟才能繼續發展。從這方面講，經濟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

齊：在某一個程度內，可以不談政治問題，祇抓經濟，但這個時期很快就會過去。現在經濟要繼續發展，就要突破政治束縛，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體制。首先是制度上求改進。制度的改進，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求解放、求突破。所以，如果目的不祇是微小的經濟發展，而是要把國民的創造力、想像力和積極性都充份地調動起來，制度的改變和思想的解放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人 民 日 報

「諷刺與幽默」諷刺漫畫。



「喜劇演員」

例如，馬克思主義的特性是強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化，而資本主義的特性則強調生產成果的社會主義化，即是生產資料可以私人擁有，調動人性去努力生產，但生產出產品後，通過國家稅收和福利政策達到全社會民衆的生活水平提高。可見資本主義很重人性，承認人是自私的，故採取自由經濟和放任主義政策，強調生產過程中人性的積極因素和主動性。先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再尋求公平平均的分配。現在，西方各福利國家的分配政策已經相當合理。我們常用國民中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平均所得）和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平均所得）的比值，來衡量社會分配的合理性。這一

比值，美國是四比一左右，西歐國家也大致相仿。比若干年以前的五比一縮小了，而且有加縮小的趨勢。西方是靠累進稅收來控制社會分配的平衡；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成果，顯然不能和西方國家相比擬，中國也是如此。如果不能放棄馬列主義教條，總是這裏改一點，那裏改一點，祇是放開了社會主義小腳，但還是走不快。「四個堅持」擺在那裏，不讓你走嘛！故我認為，中國目前突破教條框框是個首要問題。

誰的民主徹底，誰的經濟繁榮

中：有些學者認為，東方國家政治上的專權，有時反對經濟發展有好處，如台灣、南韓等。他們認為，人民要想獲得經濟的繁榮，必須在一段時間裏，暫時犧牲對民主的追求。您認同這種看法嗎？

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上述這些國家，在戰後都以日本為榜樣和追趕目標，而日本戰後同戰前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從軍國主義的極權政治轉變而成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日本原是最具東方文化的經濟崛起國家，但戰後學習西方民主最徹底，得到的好處也最多。可以說，日本的例子否定了你說的這種觀點。南韓、台灣等國，是權威主義政治（AUTHORITARIAN），可以說向民主方向祇走了一半，即有民主政體，但無民主生活。假如它們像日本那樣走得徹底，它們的經濟會更繁榮，趕上甚至超過日本，亦是很有可能的。

再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菲律賓。戰後菲律賓建立了美國式的民主政體，後來馬可仕倒退到獨裁政治，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菲律賓的例子也說明：民主的種子可以在經濟落後

的國家播種，一旦成長起來，是很有生命力的。非國軍隊可以服從國家文官，服從艾奎諾夫人這麼一個女人，這是很高的民主意識。

要向共產黨宣傳民主

中：中國假如在一黨專政之下，把經濟狀況改善了，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是否更加專制，像今天的蘇聯，或者更加開放，像南斯拉夫的情況？

齊：很難預料，我想兩種可能性都有。所以不能以經濟決定論的邏輯演繹出某種答案。在共產黨威望低、人民壓力較大、形勢不太穩定時，它可能做出某種策略上的讓步和理性的姿態。但如果政權很穩固、經濟也取得了成就，共產黨可能就會居功自傲，把下放的權力再收上去。

怎樣防止更加專制的傾向呢？我想搞當年法國式激烈的民主革命，可能會傷國家元氣，也不大合乎實際。好的方法是「攻心為上」，在共產黨員和領導人中間，傳播民主意識、公平政治，使他們懂得民主的規則和秩序。在長期的努力下，使之轉變，脫胎換骨，出現民主的風氣和風度。這並不是說，祇希望當權者有菩薩心腸，恩賜民主。沒有全體人民的一致努力、壓力和不斷的要求，一切都不可能。恩賜的東西隨時可以收回，爭取來的才是真正屬於你的。

台灣民主教育始於五十年代

中：台灣的情況是否是經濟發展後才出現民主運動的？黨外運動是中產階級出現的結果嗎？

齊：五十年代，國民黨逃到台灣時，就有一些黨內的領袖開始覺悟。在非國民黨的、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配合下，在大學和公共輿論媒介方面，做了大量的民主思想的傳播工作。我在台灣唸大學時就學了很多民主觀念。所以我認為，台灣的民主化進展，並不是經濟發展後和中產階級出現後才開始的。民主播種工作早在五十年代初就開始了。如張佛泉、殷海光等知名度很高的人，當時就著書立說，并在大學教科書裏宣傳民主。

大陸情況則不同。三十年來，馬、列、毛的一家學說統一輿論，民主觀念的書根本見不到，大學裏的政治課祇講馬列主義。人民沒有辦法接觸民主思想，怎麼能夠實行民主呢？不會做嘛！共產黨也不會做嘛！台灣、南韓這類權威主義政權，根本不能和共產黨比，共產黨控制國家政權是最徹底的。

改革問題出在

人民沒有監督權

中：最近，人民日報透露，鄧小平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可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也希望靠民主的方式鞏固政權。當然，他們在民主前面還冠以社會主義一詞，但總算做出了一種姿態。

齊：這是一個很好的動向。祇要提倡民主，什麼主義倒也無所謂。中共經濟犯罪和黨風不正，整黨也整不下去，關鍵問題是人民沒有參與權，輿論沒有監督權。一出事，中央派幾位領導下去調查，被地方官官相護蒙得團團轉。上面人一走，地方照樣我行我素，不了了之。如果有民主監督，問題就好解決了。

公民的民主教育勢在必行

中：另外請教一個問題，在目前情況下，或者說，在共產黨允許的範圍內，您認為，立志於民主的有識之士，能具體做些什麼事情？楊力宇教授曾提出民主教育和普選兩方案。

齊：我想還是能做些事情的，如前面所述的宣傳民主思想。海外人士經常回去向領導人提出民主要求，是可行的辦法之一。但我認為搞普選各級官員，在共產黨國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應該在大學中開民主課程。祇要讓廣大學生接觸到民主思想，必然播下民主的種子。我個人有過這種經驗。我回國接觸到一些學生和教育界人士，向他們講述美國民主生活的經驗，他們都很願意聽。當前最基本的工作，是大量翻譯出版西方民主的書籍。西方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對民主政治怎樣產生、怎樣運轉、可能遭遇怎樣的困難等，進行了大量研究，有取不盡的寶藏。而中共三十年在文化上，可以說對民主思想堅決隔絕。他們接受西方的機器、汽車、飛機時，不會因是西方的而拒絕，認為這是現代化。但在接受政治這部「機器」時，就敏感地認為這是「西方造」，而忘記它也是現代化。

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就像一把剪刀的兩面鋒刃一樣，缺少一刃，永遠不開東西，這種道理太簡單了。中國目前祇解放了舊制度的一點潛能，而這點潛能的發揮，很快就會達到飽和。想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徹底擺脫舊制度的困境，更上一層樓。

中：齊教授，您今天的論述都很精彩，我們表示感謝！



專訪高英茂教授：

改革關鍵在於

突破政治束縛

● 本刊記者 ● 馳 遼

而把經濟搞垮了。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用政治手段來改變經濟狀態。

改革派處在經濟與政治的矛盾中

中：中共改革派是否以「經濟決定論」做為其改革的理論基礎？

高：我想這種說法不全對。理論上，中共現在還沒有放棄「四個堅持」，還強調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維護其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及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現實上，鄧小平又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了搞好「四個現代化」，發展生產力，引進不少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作法。因此我認為，中共的理論與實際之間頗有矛盾之處。

中：我們認為鄧是務實的領導人，并不注

經濟決定論的片面性

中：今天採訪高教授，想請您對目前大陸流行的「經濟決定論」，發表一些看法。您是研究政治學的專家，故我想首先請您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做個評價。

高：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它的歷史作用。在歐洲工業革命時代初期，的確有很多經濟基礎對政治發展起決定性影響作用的事實。以歐洲的經驗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結構的理論，有它特定的歷史作用，但今天不盡然。

中：您認為，中共建國三十多年的經驗，對「經濟決定論」的啟示是什麼？

高：一個重要的啟示是：毛澤東想用政治的力量、上層結構的力量來改變中國的經濟基礎，因為他主張「精神可以變物質」。結果反

編者按：高英茂教授，生於一九三四年，原籍台灣。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後來美國康奈爾大學就讀，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布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高英茂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東亞比較政治與比較政策，以及美國對東亞外交政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國角色」、「林彪事件」等，尚有大量關於東亞安全與美國政策的專文發表。

高教授近年曾應邀訪問中國大陸。本文發表前，已經高教授本人審閱。文中「中」代表中國之春，「高一」代表高英茂教授。

重理論。過去毛突出政治，把經濟搞得一團糟，鄧今天突出經濟，有它的二定意義，也符合人民的意願。但同時又打出「四個堅持」的旗號，想用共產黨的專制來阻止人民的政治民主化要求。

您認為，中共今天的經濟改革，如果沒有政治改革同時並行，會成功嗎？

高：目前農村經濟改革已有一定成果，雖然沒有很大的政治改革。可是，經濟的繼續發展已受到政治的束縛。保守派陳雲的鳥籠政策，對這種束縛作用做了生動的說明：不許鳥兒飛，只許鳥兒動。這個鳥籠，就是「四個堅持」。

西方的經濟學家多認為，目前中國的改革還是在社會主義範疇下的改革，還看不出中國將來會搞大規模的私有制。

中共前段城市經濟改革的作法是：對市場調節放一半；價格改革則造成既有國家牌價、又有市場浮動價，可以說是半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產生了新的矛盾。很明顯，經濟發展已經受到政治的束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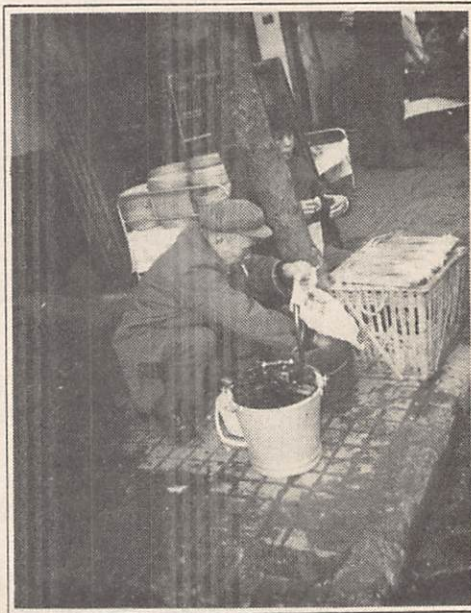
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東德想學習西德，波蘭、匈牙利也想學西方。

政治文化是獨立的社會因素

中：西方的民主政體是單純經濟發展造成的嗎？

高：這是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大體上說，兩者之間沒有一對一的單純關係。歐洲的民主發展只說明，在經濟發展出現中產階級後，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更加穩定。

大陸經濟改革後，行政幹部利用業餘時間做小生意賺錢。然而，中共能大規模發展私有制嗎？



在歷史過程中，政治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往往會變為一個獨立的因素，突出地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也會左右、影響經濟以及其它因素。雷根的共和黨，就要用其領導力來加強鞏固資本主義體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用政治掛帥來加強社會主義的「繼續革命」。

目前西方政治學中有個重要的概念——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政治文化形成某種形態以後，會發生主導作用，比如強調民主的文化，產生其政治價值觀後，就會變成對社會多方面起促進作用的獨立因素。我強調的一點是：西方經濟發展和民主發展的歷史表明，兩者之間並沒有單方向的決定作用。

經濟落後國家也能建立

民主政治

中：世界上有一些經濟落後國家，政治却很民主，您能舉例分析一下這種情況嗎？

高：印度是個好例子，印度獨立前無論經濟、社會都十分落後，但由於英國的百年統治，英國的「政治文化」滲透到印度政治制度裏面，特別是政治領導人，都在英國讀過書，受英國民主文化薰陶。這樣，儘管窮，印度還是搞起了民主。

再者就是菲律賓，在東南亞屬於經濟落後國家，但其政體算是民主的，政黨競爭比其它東南亞國家活潑。儘管出現了馬可仕獨裁，民主政體能經受住考驗，把馬可仕轟下了台。菲律賓受美國民主「政治文化」影響很大。

由此可見，政治可以成爲一個獨立的因素。民主的精神在經濟落後國家也能建立起來。

經濟發達國家亦會

出現專制

中：德、意、日法西斯專制政體的出現說明了，經濟發展了並不能保證一定造成民主，有時反而導致更加專制。

高：是的。法西斯專制的出現有其背景，二九年到三二年發生經濟大恐慌，經濟危機的衝擊力量，超過民主政治文化的力量，導致舊的政治文化重新擡頭。這說明，政治、經濟之

間沒有一對一單向關係。其關係隨不同的時間、地域和條件而改變。

三十年代德、意、日的經濟都較發達，今天捷克、匈牙利的經濟也不算落後，但都未出現民主政體。這些都是經濟決定論不能解釋的。

中產階級不是民主

的充份條件

中：持「經濟決定論」的人，常常強調中產階級的作用。好像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您認為對嗎？

高：中產階級是必要（NECESSARY）條件，但不是充分（SUFFICIENT）條件。社會出現均富，民主便容易建立和維持。但不能說，有了中產階級一定會有民主；也不能說，沒有中產階級一定不會有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個很複雜的過程，會受到中產階級影響，有時甚至受其支配，但不盡然。某些情況下，其它因素會突出出來，發揮支配作用。

我們可以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中產階級很強的國家；中產階級中等強的國家；中產階級很弱的國家。一般說來，第一類民主政治成功率可能是百分之八十。有百分之二十受到其它因素影響，沒能實行民主，如前述三十年代德國、日本還有目前東歐便是例證。第二類國家民主政治成功率可能是百分之五十。第三類國家民主政治成功率僅百分之二十，但也能成功，如前述的菲律賓、印度。

中：那麼您看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如果發達起來，會不會帶來制度的改變？還是會強化原來的制度？

高：這也沒有固定的關係。看看現實，蘇聯現在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十幾倍，經濟不算繁榮，但比較發達，其政體一直沒有什麼改變。以此類推，中國經濟增長到十倍，就會放棄共產主義，實行民主嗎？或一定保持專制？都很難說！就看中國人的民主覺悟達到怎樣的程度，付出多大的努力了。所以說，經濟與政治兩個變量，不是單向誰決定誰的關係，而是一對互相影響的因素，根據客觀情況，取決哪一個變量是主導的。

中：那麼您認為今天大陸那一因素是主導的呢？

高：只能這麼說，大陸經濟急待搞上去，但受到「四個堅持」的很大阻碍作用，共產黨自己也承認，馬克思主義「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有過了時的東西不應堅持」。

權威主義政府的貢獻與局限性

中：好！還有一種看法說：東方文化的背景是保守、臣服的政治倫理，不同於西方的民主政治倫理。故民主在東方的實行，需得經濟發展以後。還有人認為東方的權威政體的穩定，有利於改變其落後的經濟。他們舉出台灣、南韓作例子。你如何評價這類看法？

高：表面上看，如亞洲的台灣和南韓，政體尚屬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民主程度不是很高，但經濟發展很快。它們的貢獻在哪裏？第一，政治穩定，發展經濟有保障；第二，這些政府很大組成成份，是科技官僚，他們利用政治領導力量來搞經濟發展計劃；第三，目前發展中國家經濟都有這麼一個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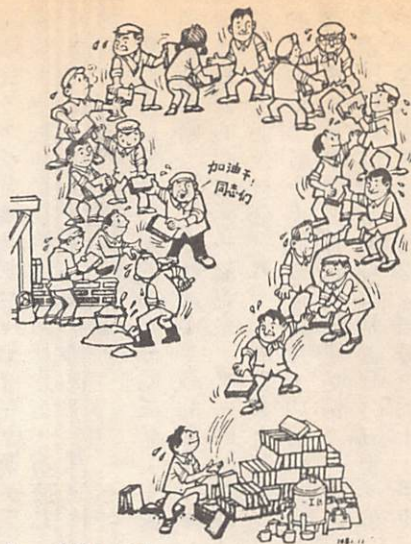
先進科技的移植、國際市場的競爭，都要有政府相當大的保護和推動作用。所以權威主義政體對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但這只是對經濟的貢獻。不能說，民主對這些國家就不需要。

中：我想，這些國家的權威主義政體有時代背景。第一，它們過去都是農業社會，有封建極權的政治文化傳統；第二，五、六十年代的東西方冷戰，為抵禦共產黨勢力的擴大，美國也支持和強化這些政府的權威主義色彩；第三，這些國家都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國家，都有一批握有軍權的政治領袖，如馬可仕、蔣經國，都是軍人出身。這樣的政治權威人物也容易搞權威主義政權。但現在的情況變了，經濟發展了，上述三個因素消失了，民主成了這些國家的迫切問題。

中國不能總在烏籠裏發展

高：我同意你的分析。可以這麼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治權威有助於經濟發展和起飛。但到了一定程度，如人口平均國民所得達到每年五千美元左右，權威政治就會轉變成不利因素，政治官僚機構太強就不利於自由企業經濟高度繁榮。四小龍正面臨這樣的問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則早已面臨這樣的問題了。如東德和蘇聯，它的經濟很難再發展上去。東德和西德在戰後科技發展程度都很高，但西德是開放經濟，東德是管制經濟，結果就大不一樣。

中國大陸也是這樣。經濟改革初期，鄧小平的強權政治領導會有一定的作用，有利於經濟改革，這我們已經看到，但要取得更高的經濟成就，就必須一步步放鬆、升級。不能總在烏籠裏發展。



繁忙的工地 段紀夫(天津)

多元社會不必強調意識形態

中：我想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公佈的資料看：一些西歐國家：如芬蘭、法國、奧地利等國，有很大比例的企業國有化、集體化，有相當社會主義經濟色彩，故叫做混合資本主義。當年羅斯福總統和霍布金斯搞的新政(NEW DEAL)，也有一種類似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事業。同時，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如利比亞、南斯拉夫和中國大陸，也有百分之五十不到的

私有經濟，故叫做混合社會主義。看來資本主義也有很大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趨勢，凱恩斯就說政府應干預經濟、計劃經濟。您對社會主義經濟方式(不是暴力革命建立的，而是西方國家自然出現的)的前途有何認識？

高：講到「主義」，都變成了政治概念、意識形態，就要強調其 PURE FORM(純粹形態)。特別是中共，講「四個堅持」，強調社會主義。而在西方國家，多元傳統使之很少講 PURE FORM，在美國和西歐如上述，有相當比例國有企業的國家到底是什麼主義，大家並不注重，不講意識形態。中國雖然接受了許多資本主義經濟方式，但總是要強調主體還是社會主義。如土地責任制，可租三十年，但不許買賣，一賣就是資本主義；僱工不能超過若干人，多了就是資本主義。這都是很勉強的講法，不利於發展。不過共產黨也沒辦法，它是靠意識形態革命起家，就一定要用意識形態來維持政權。西方民主社會就不必有這種負擔。大家都來搞，自由黨可搞，社會黨也搞，法西斯黨也搞，但沒有誰能把自己意識形態的純粹形式變成國家的统一思想。法國社會黨、意大利共產黨都佔相當多的議會席位，也推行一些社會主義政策，可以和平競爭共存。議會民主政治可以保證多元混合體的相互妥協。

誰敢說美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你剛才提到的新政，還有社會保險制度，都類似社會主義政策。美國的許多公司從某些方面看可說是「集體企業」，例如美國的郵政和某些鐵路是國有企業，但美國政府裏，很少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鬥爭。

中：美國的人民快捷航空公司(PEOPLE EXPRESS)，每個雇員同時又是股東。

高：對，福特汽車公司的股票完全開放，

可以說是幾萬人的「集體企業」。美國最大的發電系統「AEP」也是國有企業。沒有人去很抽象地辯論，美國蛻變成社會主義了。不必去搞這種思想上的精神負擔。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很好。只要人民生活好了，社會進步，不必去管意識形態。共產黨國家就是易受教條框框的包圍，犧牲人民的福利。要管制思想，要一元化，不問什麼是社會複雜的現實，什麼是學術的自由。共產黨政權生怕，只要有多元觀念就會天下大亂。

民主教育應早做打算

中：最後請問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態適合爭取民主嗎？或者應該等一些年再說？有人說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他們不懂民主。

高：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比較注重權威觀念，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有很大負面影響。正因爲此，民主意識的培養對中國有迫切需要。我很反對把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對立起來，二者是互相促進的。共產黨應該早做打算，首先改造自己的觀念，才能教育人民、樹立民主思想。印度現在還有幾千萬所謂的賤民，傳統上是不許參政的，但在民主制度的鼓勵下，也慢慢地開始發生變化。知識分子有責任負起這個民主建設的歷史任務。

中：您認爲中共在不放棄「四個堅持」的現階段內，朝民主的方向走，能做到什麼？

高：我想中共假如真正想實行民主，目前可以搞一個政黨法。在法律範圍以內，人民有權力組織政黨，把民主競爭納入安定的軌道。「四個堅持」對民主生機的發展，經濟改革的升級都有負面的壓制作用。

中：謝謝高教授繁忙中接受我們的採訪。

略談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民主之關係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黎 音

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病故、「四人幫」垮台以後，中共新的當權者開始摸索經濟改革的路子。尤其在鄧胡趙的實力領導地位確立後，更較爲大膽地邁開了經濟改革的步子，同時也取得了某些可見的成效。應該承認，現在中國的經濟比毛澤東，特別是「四人幫」當政時期，有了一些活氣，部份民衆也通過經濟改革而有所獲益。於是，在中共自我宣傳、炫耀與不明實質真相者的贊揚聲中，爲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經濟改革披上了一層充滿幻覺的華麗外衣。誤認經濟改革是解決中國現存一切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可以將中國引上現代化的富強之路，會使中國步向政治民主，甚至歡呼中華第三次騰飛已經開始。讓我們冷靜而認真地研究一下，果真如此嗎？

形勢逼迫下的反省

中共執政三十多年來，大陸經濟的發展呈馬鞍型。五十年代其經濟曾有過緩坡上升期，後來由於政策上的錯誤和一個接着一個的政治運動的干擾，特別是「文革」的嚴重破壞，使國家經濟瀕臨破產，七十年代後期至今又有回升。

我們記得，中國約有二十年之久不敢公佈國民生產數值（即使公佈的個別數字也是浮誇與不實的）。因爲中國在那些年代裡經濟非但沒有什麼發展，有些方面的生產反而降到了五十

年代的甚至是解放前的水平。隨着人口的猛增，國民平均所得一落千丈。經過「文革」浩劫，坐吃山空，國家經濟簡直成了千瘡百孔的破爛攤。如果繼續下去，不要說人民無法生活，就是中共政權本身恐怕也難以維持它的統治。

同樣在此期間，中國大陸周圍一些與其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台灣等經濟却在起飛，穩步踏入或正在踏入經濟先進國家的行列。即使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歐洲國家，經濟狀況也要比中國強的多。主、客觀的形勢迫使中共新領導不能不進行反省。擺在他們面前的現實問題是：不立即解決面臨的經濟危機，共產黨是否能繼續安然地實行專制？十億人民長期在貧困的深淵中掙扎，將會出現何等嚴重的後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訣竅」在哪裡？他們像一隻在缺氧環境下爬行的蝸牛，伸出觸角進行探索，竭力尋求和創造能使自己繼續生存下去的條件。

為鞏固一黨專制而採取的權宜之計

誰也不能否認中共是一個專制的政黨，它所奉行的是一種專制的制度。無數事實早已有力地證明或正在證明，共產黨做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歷來是將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這正是一個專制政黨的本色。可能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或某些事情上，它的黨利與國家、人民利益可並行不悖，但從總體及

長遠觀點而言，一個專制政黨的私利無法與國家、人民的利益保持永久的統一。

以今天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式來看，完全是按照中共少數當權者的主觀意願來進行的，人民群眾完全處於受擺佈的地位。無論當權者所設計的方案是否可行，是否合理，是否真正利國利民，人民都無權參與意見，即使提了意見也不會被採納。因此說今天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是中共一手獨斷包辦的改革，少數人發號施令的改革，這是一種根基不牢的改革。它可以隨時隨地按照中共決策者的意念而轉移。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歷來十分激烈，一朝天子一朝臣，政策隨着權威決策者的人事更迭而轉變，這是中共治國的特點；言而無信、朝令夕改是中共施政的大病。當年劉少奇也曾鼓吹過「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類帶有「鬆綁」性的經濟改革，後來又怎樣？毛澤東親自提倡的「人民公社」已經寫進了憲法，後來又如何？今天鄧小平的新經濟政策，誰又保得住不會重演人亡政變的歷史？鄧小平的壽命受着生理自然規律的局限；胡耀邦、趙紫陽的職務任期又受着黨章、憲法的局限，怎知他們去後中國的政、經局勢不會發生大轉變？任何一位中共的領袖都極力標榜自己的路線、政策是正確的，也都曾培養過接班人以圖維持自己政策的連續性，希望五十年、一百年不變才好。然而可惜的是迄今爲止，還沒有一位中共領袖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往往更可悲的是由他親手培養起來的、最信任的人改變了他的路線或政策。事實

就是這樣嚴酷而富於戲劇性。一個靠着專制手段而謀私利的集團，無法擺脫變化無常的屬性。以今天中共經濟改革的內容來看，實在並沒有什麼值得人鼓舞的新東西。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的經濟體制的改革，都不過是對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有限度的鬆綁，小「鳥籠」的少許擴大。所謂的「經濟特區」，不過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的一點點資本主義色彩的實驗田。藉以刺激奄奄一息的經濟復甦，挽救社會主義的經濟危機。這一切都是以加強共產黨的領導為前提，以不損害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原則，並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去尋找理論根據的。

事實說明，中共可以有限地修改馬克思主義，但中共却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就喪失了生命，黨官僚就喪失了特權，這是辦不到的。所以，為了應急救命，中共可以有限地容納一點資本主義經濟，但不會允許整個經濟性質轉為資本主義的。它有強大的專制極權統治做保障，有控制經濟改革的舵輪的條件和能力。目前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已證實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中共經濟政策的變化，絕不意味著中共本質的改變或可能有所改變。相反，它目前所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完全是為了鞏固政權、強化專制所採取的一種靈活的策略手段。鄧小平就不斷安撫那些唯恐中共變質，中國變色的幹部說：「不要擔心，變不了的，變不了的。」為什麼他的心中那樣有底？因為他最明瞭實行經濟改革的動機。

經濟改革不一定就會 促成政治民主

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否一定會促成中國的政治民主？我認為不一定，更明確一點講是不可能的。直到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共產黨

國家通過經濟改革而促成政治民主的先例。起碼一點，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問題都沒有解決，所以談不上政治民主。反而歷史與現實中却存在通過經濟改革、增強經濟實力以後使專制統治更加強化的範例。日本的明治維新可稱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的社會、經濟改革運動了，它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復興，吹響了日本經濟崛起的號角。但是，沒有多久，日本軍閥階層將改革的成果視為對外擴張的資本，逐漸形成了軍閥獨裁政體，進而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其後果是盡人皆知的。德國希特勒的法西斯獨裁，是當時德國經濟領先發展條件下的不幸產兒。沒有雄厚的經濟、科技基礎作為後盾，希特勒對內獨裁、對外侵略的野心不至於迅速膨脹到那樣瘋狂的程度。再看今日的蘇聯，戰前戰後都會進行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不擇手段地將自己的經濟和科技推向現代化。然而，非但沒有給蘇聯帶來政治民主，反而變為舉世共睹的對內強權高壓、對外擴張稱霸的超級大國。

經濟改革固然是為促進經濟的發展，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通過經濟發展得到幸福，但在專制的制度下却不盡然。民主制度下的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民主水準的上升，專制制度下的經濟的發展却不一定能促成政治民主的條件。關鍵還是社會制度、政權性質問題。同樣是翹勝，生在鳳凰身上象徵着祥瑞，而生在老虎的身上就助長了兇暴。

以中國目前經濟改革的實際情形來看，毫無可以促成中國政治民主的徵兆。現在中共一面進行有限度的經濟改革，又一面在政治上收緊，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中加強控制，事實是最好的證明。儘管中國人民渴求民主，希望政治上的變革和意識形態上的開放，但是，握有實權的中共決策者却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人民的要求，甚至隨時動用專政工具來壓制人民的要求和「越軌」行為。從任何一個角度來

觀察、來研究，我們都無法將中國實現政治民主的希望寄託在目前的經濟改革上。

政治民主是現代化的 保證與標誌

中共實行經濟改革之主觀目的是為達成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但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只有上述四化而沒有政治民主化，不能稱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而且綜觀當今世界一切先進國家，其經濟的繁榮都是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之上的。以政治民主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保障。也只有這樣，才能隨着經濟的不斷進步而相應促進民主運作能力的不斷提高。再以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為例，當時它的經濟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在百業凋敝的狀況下，由於首先公佈了和平民主憲法，確立了民主制度的社會體制，保證了人民享有較為充分的民主權力，所以，才使得經濟迅速恢復和起飛，創造了舉世稱讚的經濟奇跡。如果戰後的日本仍然是一個專制的國家，難以想像它的經濟會如今天這樣繁榮、發達。可以肯定，即使它的經濟能有一定的進步，但也絕不會成為目前這樣的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國家。甚至說不定會繼續給他國和本國的人民帶來災難，連日本人民也不否認這一點。

放眼世界，民主已成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但專制仍有其頑固的歷史根基與頗大的現實實力。民主與專制的對壘還將歷經長期的較量。專制可以轉變為民主，但民主也可以轉變為專制，轉變的因素、方式、途徑很多、很複雜。經濟可以是重要的表象之一，但經濟並非轉變的主要因素。

總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就不會有或無法鞏固經濟的現代化，沒有政治民主的國家也稱不上現代化的國家。

當今是經濟立國時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桑羊

「只有搞好了經濟才能爭取民主嗎？」這一問題正在日益為民運人士所關心；民生與民權，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些問題，將直接影響到當前民運的戰略和策略。「中國之春」特闢「經濟決定論」專欄來研討這一問題，是十分必要的。但筆者認為，抽象地討論這類問題，難以得出滿意的結果，因而本文試圖由討論當前時代特點入手，再提出一些見解。

一、三個時代

我國戰國時代著名的思想家韓非，在總結當時歷史的潮流時說：「上古競以仁義，中世鬪以智巧，當今爭以力氣。」此論是否正確，可留給史家去討論。然而我們縱觀現今歷史，似乎有一個倒過來的過程，即前輩爭以力氣，我輩鬪以智巧，後輩競以仁義。簡明地說，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是世界軍事立國時代，戰後，世界進入了經濟立國時代，這個時

代一直沿續至今，將來可能進入一個人性立國的時代。

廣義的軍事時代起源於遠古，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而相爭時，決定一切的力量便是暴力。不同的人種間、不同的民族間、不同的利益集團或宗教集團之間，都是以軍事力量來決定相互地位的。軍事時代的高潮則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列強紛紛對外擴張，支配這時的思想是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西方以血和火來推廣「西方文明」，將全世界弱小民族踩在腳下，不甘被征服的民族則紛紛用暴力反抗；列強瓜分世界完成後又自相殘殺。軍事強國可掠奪致富，軍事弱國只好被欺受窮。戰爭常常有鮮明的民族鬪爭色彩，民眾的情緒也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要求，而將民生、民權等要求放在次要地位，甚至不惜犧牲，因為民族的生存空間或民族危亡是頭等大事。各民族差不多都將其戰時有功者看作英雄，奉為領袖。例如，此時的突出代表是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就是立國短暫、民族主義色彩較少的美國，其四大傑出總統（華盛頓、林肯、威爾遜

、羅斯福）也主要藉戰爭成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開始轉向經濟立國時代，轉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劫後的世界認識到戰爭的災難，人民普遍厭戰，追求和平安定的生活。二、核武器的出現使現代戰爭具有巨大的破壞力，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前景抑制了戰爭狂熱。三、美蘇兩極對立，兩個龐大集團誰也吃不了誰，鬪則兩敗俱傷，和則各得其所。四、一大批新獨立的國家，經濟困難，開始意識到民族獨立並非一切順利。經濟困難甚至迫使新獨立國家領導人重新向原宗主國討情求援。五、各種高、精、尖武器漸占主導，富國方能強兵，窮國難以贖武。

經濟時代的主要特點是：一、熱戰轉為冷戰，實質上是經濟戰。國際間的鬪爭，雖然小戰不斷，但主要靠經濟實力來爭取人心、維持人心。二、人民情緒以民生主義為主，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可為之讓路（香港和南韓的民意即分別為前者與後者的例子）。三、經濟學家代替軍事家成為執政集團的主要支柱，經濟問題代替戰略問題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例如，美國當前各屆總統的政績好壞就主要看其經濟計劃的成敗。

這個時期的主要成果，是物質生產力大大提高，科學技術高度發展，世界生活水準急劇提高。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水平日益成為主導力量，知識就是權力，經濟就是民心。

至於將來，世界潮流又向何方發展呢？筆者不是算命先生，只是帶着濃厚的主觀願望來臆測：世界將進入一個人性立國或曰倫理立國的時代。由經濟時代轉向倫理時代的契機是：一、生產的發達、物質的豐富使人類的物質需要得到極大的滿足，與此同時，人類的精神危機却越來越嚴重。飢餓的人是沒有精神空虛問

題的，而在基本生活需要滿足後，越來越多的人就繼而追求更高一級的需要，人們日益不滿精神生活的缺陷：精神空虛、世情冷淡、生活緊張無味、人生價值難以把握。有關「生活的目的、人生的價值、自由的內涵、個性發展、自我完善」等等問題吸引着越來越多的人。二、科學和經濟的發展也日益衝擊着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教育的普及使人民日益打開新的眼界，出現新的觀念、新的反省。價值的認同漸由感情式（包括宗教式、民族式、道統式）轉為理智式（包括思辨式、探討式、試誤式）。三、世界變小，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相互滲透、取長補短，趨同融合的傾向日益明顯。故對集團的界綫逐漸模糊，互相妥協和共存共榮逐漸代替互不相讓和勢不兩立。

人性立國時代的特點，在東方當是民權主義大盛，人民普遍要求人權、法治，爭取各項基本自由，要求個性發展的廣闊天地，其政治要求接近於西方英美式的民主制。因而倫理時代在東方表現為民權時代。而在西方世界，則可能出現東方人文熱，大量借鑑東方的價值觀念、哲學觀念，以補西方之缺。東西出現互相學習的盛大場面，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也相互趨同、相互補充。總之，世界由軍事時代的相互敵視、經濟時代的相互競賽轉為人性時代的相互融化。出於善意而非信心，筆者希望國共和談、南北韓對話、東西德合作將成爲這一時代的先聲，這是個雙方都進行和平演變的過程，倘若演變成功，就可造大福於全世界人民。

二、中國最近才步入經濟時代

從軍事時代跨入經濟時代的步伐是不平衡的，大致說來，在軍事時代末期受創傷大的國家或集團，其轉變越快，即戰敗國比戰勝國快，民主國家比極權國家快，發達國家比落後國家快，而中國大陸不幸是最慢的，只是在最近才剛剛被世界潮流捲入經濟時代。「勝兮敗所伏，敗兮勝所倚。」這一中國的古老格言在這方面也得到了極好的證明。戰敗國軍事集團基本瓦解，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受到致命打擊，因而一下子就徹底與軍事時代訣別，而埋頭迅跑在經濟立國的大道上，取得了領先的地位。

美國本來得天獨厚，其歷史短，故民族主義氣氛不濃；地理隔絕，故戰爭威脅不大；地城遼闊土壤肥沃故生存空間先天優越，所以美國一開始就有較明顯的經濟立國的特點。然而大戰的勝利將它推到了「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因而不旋踵即纏入了韓戰、越戰，從而使它的國際地位逐步相對下降。但是美國民主制有很強的內在活力，能迅速從挫折中吸取教益。當美國終於擺脫了越戰後，又重新趕上了西歐的發展速度。

共產黨集團可謂軍事時代的得利者、大贏家。共產主義者具有嚴密的組織、集中的統治，對革命教義之宗教式的忠誠，對暴力革命之狂熱式的酷愛。這一切使共產黨人能有效地組織戰爭，尤其是民族戰爭。因而是民族戰爭激烈的國家和地區，共產黨幾乎都迅速發展壯大。戰後，大權在握的軍人集團仍然留戀昔日的榮耀，對軍事時代依依不捨，難以訣別。軍事時代的控制方式大量地沿用下來，鐵腕政治和權極主義繼續盛行，軍事利益的考慮遠重於經濟利益。直到在一系列問題上碰壁之餘，發現自己越來越落後了，才思改弦更張。

中國恐怕是沉痾於軍事時代爲時最久，最

走火入魔的國家了。當西方在恢復戰爭創傷時，中國國共大戰方酣，當赫魯曉夫打出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招牌時，金門前綫炮聲隆隆，當西德、日本由軍國主義轉變爲經濟動物時，中國大陸却一頭栽進文革大瘋狂，全力批判「蘇修」的「和平競賽」，號召全世界人民起來進行暴力革命。中國的經濟計劃不僅屢受政治風暴的干擾，就是計劃本身的制訂，也是首先考慮軍事戰略而非經濟效益。在「時刻準備打仗」的指導思想下，工業以鋼爲綱而忽視輕工，農業以糧爲綱而全面砍光，核彈爆炸而生產落後，衛星上天而人民貧窮。許多重要工業從經濟效益好的沿江沿海內遷至荒山僻野，小而全、土而粗的經濟佈局蠶食了合理的專業分工……，一直到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時才猛醒過來。

三、當前民運要多注重民生問題

如上所述，目前中國剛剛從軍事時代轉入經濟時代，因而人民的情緒以民生主義爲主，但仍保留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民權主義還僅僅處於萌芽或幼芽狀態。軍事時代動人以氣，經濟時代動人以利，人性時代動人以理。筆者有關經濟和民主的見解是：在當前的經濟立國時代，經濟發展未必能導致政治民主，但是民主運動如不能證明有益於經濟建設，則民主運動本身也難以發展。因而當務之急，是民運要多注重經濟問題（民生問題）以及與此有密切關聯的問題。

筆者主張多注重討論民生問題，並非說，民運的理論建設不重要。「中春」展開的有關民族道統的討論，有關中國科技發展的討論，有關愛國主義及其它主義的討論，都將對民運

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但是如果我們只注重這些以至弄到「理論中毒」的地步，那麼民運就可能變成少數人的學術活動，而無法深入廣大中國民衆中去，成不了大氣候。記得在「北京之春」時期，民運雖盛極一時，但主要停留在理論思辯上，對當時普通民衆的實際要求，聯繫較少。當時社會上流傳着一首順口溜：「農民笑，工人跳，知識份子瞎胡鬧！」「農民笑」者，包產到戶也；「工人跳」者，物價暴漲也；至於「知識份子瞎胡鬧」者，實際上是泛指街頭的民刊、校園的演講、傷痕文學、新潮詩歌等等。這情景說明了民運與民衆的距離，恐怕這也是後來中共能輕易鎮壓民運的原因之一。中國民衆歷來就有政治冷淡的傳統，脫離人民直接利益的宣傳、說教和論辯，都是難以動員人民的。

目前海外留學生、學者中，許多人雖對國內政治不滿，但不願捲入政治，而多希望以技術救國、以學業報國。一部份人認為民聯的活動是多餘的，無事生非、無益國家，甚至中國人的內鬪、內耗。他們不喜歡純粹的政治理論討論，但對許多實際問題却有中肯的意見。「中春」若能同他們一起討論一些實際問題，就能提高這些人的凝聚力，擴大民主的基礎。此外，民聯的目標是希望今後能作為在野的壓力團體或反對黨而存在，對執政者進行有效的監督。因而民聯對中國各方面的重大實際問題都應該有所準備，逐漸形成自己的立場，使中國人民看到民聯確實是想着中國人的實際問題，而非僅僅是「瞎胡鬧」。

另一方面，筆者也並不是主張在「中春」之類的民刊上大量討論純經濟問題。例如大西北應該如何建設，是以農為主還是以牧為主，教育制度應如何改革，考試怎樣考等；這類問

題，不犯什麼禁忌，盡可以在國內刊物或海外官報上去討論。而民刊可以討論中國廣大人民普遍關心的、但在國內討論又禁區重重、不易開展的問題，這樣做能很好地顯示民刊的價值。事實上，這類問題往往是和民生密切相關的民權問題，或與民權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

例如，每當中共制訂某種經濟政策、方針或規劃時，國內輿論工具必從上到下「一致擁護」。「中春」即可理智地討論有關利弊，除了邀請有經濟專業知識的海外專家發表意見外，也可讓關心國內的其它人，尤其是留學生，發表不同意見。對於中共雷厲風行的突然性政策，比如禁止有獎銷售、收緊外匯、某項物品的禁進出口等，都可及時組織文章討論。

再如國內人才流動問題的障礙，現在只抨擊到單位所有制，其實更重要的障礙是戶口制，這兩制弊病叢生，阻礙經濟，危害民主，坑了許多人。電影「人生」中高加林與巧珍的悲劇，實質上就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戶口制的產物。「中春」是否能討論改革的方案。

又如中國對留學生的政策反覆多變，且各級官僚衙門對申請者多方刁難，深為廣大留學生所不滿。前段時間有國內畢業的碩士生不得申請自費的政策，近傳又有在校研究生不得申

附表：三個時代的特點

時代	主要問題（主要矛盾）	傑出政治家的來源	民衆主要情緒傾向	時代的目標
軍事立國時代	民族存亡，生存空間	軍事家，戰略家	民族主義 （西方達爾文主義）	國家獨立，民族解放
經濟立國時代	經濟發展，科學進步	經濟學家，管理學家	民生主義	經濟繁榮，科學發達 生活水準提高
人性立國時代	價值確認	社會學家，心理學家	民權主義 （主要指東方）	？

請留學之說。如此反覆多變，是否應加抨擊，筆者認為不僅可從個人自由權利角度談這類問題，也可進一步分析此類政策究竟對國民經濟有益抑或有害。

在經濟立國時代，外交也常為外貿、外援服務，因而也與民生問題直接有關。可討論的問題很多，例如，中共目前與東南亞共產黨的聯繫，是否已危害了國家利益（筆者認為，中共如在黨政分離上多進一步，則以上危害就少一分）。中共偏袒北朝鮮，不敢大膽接觸南韓，是否失策（筆者認為若在對日貿易中能打破國牌，則中國可少吃點虧）。至於中共偏袒赤東，更是為中國抹了大黑。「中春」亦可討論改進方案，中國的印支政策直接影響到印支華人的利益，目前印支華僑已成為海外華僑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民聯對印支問題也該有自己看法。

作為小結，筆者將本文觀點歸結為幾句話：世界已由第二次大戰前的軍事立國時代轉變為經濟立國時代，中國是完成這一轉變最晚的國家。起點落後，人人着急，大多數人希望首先將經濟搞好，民運要急人民所急，言人民所想，才能發展壯大，為我們的時代作出最大的貢獻。附表如下：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民聯代表出席美國傳統基金會 舉辦的香港形勢演講會

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九日，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傳統基金會大樓，舉辦了香港形勢演講餐會。中國民聯監委委員、中國民聯華盛頓聯絡站成員宗繼祥先生，應邀出席了餐會。應邀出席餐會的還有前美國參議員周以德醫學博士、英國駐美大使彼得·勞（PETER LO）先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代表戴維·勞克思（DAVID LAUX）、美國國務院官員尤金·馬丁（EUGENE MARTIN）、戴維·斯爾（DAVID SHEAR）和麥可·波瑞維特拉（MICHAEL PRIVATE-RA），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楊冠羣（YANG GUAN-QUN）先生等三十餘人。

香港政府副秘書長艾蘭·史谷脫爵士（ALAN SCOTT）在會上對香港最新局勢發展發表了演講。

演講餐會由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馬丁·拉薩特（MARTIN LASATER）主持。中國民聯代表宗繼祥先生在餐會上與各界人士友好敘談，加強了與各界的溝通。

國內民主派為經濟改革的

進一步突破製造輿論

城市經濟改革已開展日久，但問題叢生，收效極不理想。問題的根源在哪裏？海內外、共產黨內外，都在熱烈爭論。

國內民主派早已認識到，中國經濟的癥結是制度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物價改革是必要的，但這祇能解決皮毛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市場經濟派，也擬在下一步的經濟改革中，觸及所有制問題；但礙於黨內守舊勢力的反對，改造所有制（即把國營企業通過出售股票等形式變成集體所有或個體所有）的敏感問題一直不敢進行。

國內民主派適應改革形勢的發展，開始利用現有的輿論陣地，為下一步所有制改革大造輿論。如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千家駒在最近的政協會議上就提出：「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觀點，受到與會者熱烈歡迎。著名的經濟學專家，北大教授厲以寧，最近連續發表專論，提出：經濟改革的關鍵不是物價改革，而是所有制改革。他同意世界銀行對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的主張，即國營企業應拋售股票，並將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開。

值得注意的是，厲以寧教授於五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經濟學的爭鳴和經濟學的繁榮」一文，文章在最後指出：「我們要注意到這樣一種情況：在工作中，經常有些人什麼工作也不幹，什麼主意也不出，而一旦他們認為在工作中出現某些錯誤時，這些人却成為最有發言權、最有資格去指責別人的人。」厲以寧疾呼：「我們不能讓這種現象再出現了。」

厲以寧在文章中雖未有點明這種「不幹工作，却專門指責別人的人」是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一類的人。

厲以寧教授與一大批青年民主派有廣泛的聯繫，他也是黨內改革派胡啟立的朋友和重要的經濟顧問。厲以寧的文章是否代表改革勢力向守舊勢力一次反攻的前奏，人們正拭目以待。

從廣意上講，變革中國經濟的所有制，是

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值得特別關注。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成立

由一批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華裔專家、學者和作家倡導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最近在美國舊金山市成立。該基金會將獎勵對促進中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有傑出貢獻的人士、著作及有關研究活動，現已有各方認捐美金三萬多元。該基金會在中國之春等刊物刊出廣告，號召各界人士熱心捐款，并積極參與一九八六年度評獎活動（見中國之春卅七期封三廣告）。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會長兼理事是黃雨川（經濟研究）；秘書兼理事是孫魯正（航空工程博士）；財務兼理事是林劍明（醫學博士）；理事有郭平（化學博士）、楊雲（電子工程師）、冬冬（作家）和江文（作家）。

這是中國第一個以資助、獎勵民主教育為宗旨的基金會，我們懇請各界予以大力支持。

澳洲分部在人大代表團 訪澳期間的活動

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在副委員彭冲和班禪喇嘛的率領下，於四月底和五月初訪問了澳洲。這是班禪喇嘛的首次出訪，引起了各界的注目。

中國民聯澳洲分部在中國人大代表團訪澳期間，印製了中英文的宣傳特刊，廣泛郵寄、散發到各界機構和人士。特刊上載有紐約西藏自由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紐約支部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廿日簽署的聯合聲明，這對班禪首次出訪，是有特殊意義的。

中國民聯澳洲分部選發表了一封中英文的致「人國人民代表大會訪問澳洲代表團」的公開信。

公開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彭冲副委員長：
尊敬的班禪喇嘛：
各位團員：

我們中國民聯澳洲分部熱烈歡迎你們前來訪問。當你們看到澳洲社會的進步，自由與繁榮時，也應想到她只有短短一百九十八年的歷史。回想我們中國，號稱幾千年的文明古國，却遠遠落在人家的後面，實應慚愧！在建國後的三十六年時光中，我國的發展，也落於亞洲的日本，台灣，新加坡，香港和韓國。同是黃種人，甚至同是中國人，為什麼人家社會發達，經濟能夠起飛，而我們望塵莫及？就拿自然條件相比，我國地大物博，他們可說彈丸之地，而且能源缺乏；以人口相比，我國是他們的幾十倍；從文化相比，我國是他們之文化的發源地。為什麼人家經濟起飛，我們仍貧窮落後，難道這些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深思嗎？

革命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所求為何？革命成功三十六個年頭了，國家仍是一窮二白，愚昧落後，與革命目的相比，適得其反。凡是有正義感的中國人，尤其身為人民的代表，應當感到愧對先烈，愧對人民而無地自容。

時致今日，諸位有機會看看自由、進步社會，希望取回富國利民的「真經」，造福於吾國吾民。

我們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是以愛國民主人士為主的民主團體。我們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是馬列主義不適合我國國情。不只是經濟要改革，政治制度更應首先改革。廢除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廢除人治，實行法治；廢除摧殘民主的各種政策，給人民自由發展的機會；廢除特權階級，保障民權。在國家憲法中鑄

除「四個堅持」，發揮十億人民的積極性。

相信當權者放棄自身特殊權益，實行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的召示，放棄黨派的私利，尤其國、共兩黨首先放棄本黨私利，以全國十億人民的利益為重，我國就會急起直追，步入先進國家之林！

所謂「一國兩制」是荒謬不通的。我國是多民族國家，適合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經濟。為什麼「港人治港」而不同時實行「台人治台」，「藏人治藏」，各地自治呢？為什麼一定要把十億人的命運操縱在少數幾個特權者手中呢？

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話，建國三十六年的實踐，已經雄辯的證明：中共標榜的社會主義失敗了，無產階級專政是中國人民災難的根源。如果說「理論是經驗的積累」的話，三十六年的時間加上數千萬人生命的代價，就應知速而返！

我們呼吁：

- 一、放棄專制，勵行民主。立即釋放一切在押政治犯，包括在押民運人士和西藏的持不同政見者！
 - 二、允許宗教和各種信仰自由，允許達賴喇嘛回西藏！
 - 三、廢除太子派梯隊接班制，由廣大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稱職的領導人，人民有權罷免他！
 - 四、國共兩黨放棄以武力解決政治問題，讓台海兩邊的社會制度和乎競賽，由全國人民選擇，適者存在，不適者被淘汰！
- 五、繼續推行從經濟到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順祝
旅途愉快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澳洲分部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就「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一文

回應的回應

(香港) 今之鳴

「中國之春」卅一期讀後，感觸良多。我很高興文章有了反應。這反應說明這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思索。很感謝揚子江君和鍾衡君等對我的文章的評議。為此，我想把我的思想清理一下，求教於關心民主運動者。

(一) 中國實現民主是有希望的。我的推論如下：中國和第三世界的近代史料都說明民主運動者掌權後會走向反民主的專制道路。因為他們的第一步就孕育了專制獨裁的種子，這種子在革命過程中發芽長大，最後取代了本身原有的民主，也取代了舊的專制者而成爲新的專制者。現在世界上還存在大量合法的或非合法的、主張暴力的、或主張和平的民主運動。這些民主運動本身有不少也孕育着專制的種子。中國民聯也是當代民主運動之一，它可能孕育着專制的種子，也可能不，或者可能在民運過程中消除專制的因素。我給「中國之春」寫些東西，希望及早提醒民運者消除專制因素。正因爲現在民運已關心其本身的健康發展，說明民主是有希望的，這加強了我們對民主前景的信心。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只是對民運本身提出的要求而已，也是實現民主理想的必要條

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或充分的條件。起碼還要有「民主文化」的養成，多元社會的實現，經濟基礎的足夠等等。上述這些條件，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做着，中國民聯且在「專業」地做着，中國的民主希望就在這裡。

(二) 民運者「可以有打天下的思想，絕不可有坐天下的思想。」這個命題是欠準確的。雖然我在這句話的後面緊接着是「特別不能有『打天下者必坐天下』的思想。」爲補充，但前一句畢竟是片面的。正確的論斷應是「民運者不能爲坐天下而打天下。」我們見到打下了天下也坐了天下的華盛頓並沒有因其坐天下而遜色，反而因爲其坐天下而爲民主前程作出更大贡献。雖然我在這一部分裡也提出「並非主張民運者須預先立誓『戒官』」，「得到人民信任和委託的話，當然執政當官是義不容辭的」。我相信沒有人能舉出一個爲坐天下而打天下者，他「坐」的不是專制獨裁天下的例子。

(三) 關鍵的問題是「權源於民」。民主的實現是要多方面條件的，民主的失敗原因也是複雜多樣的。但要實現和保證民主，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權源於民。「民運必須步向民主」是

實施民主對民運本身的要求；權源於民是實施民主程序理性的保證，也是民主的目標。人們很喜歡以孫中山爲例，似乎，只要孫中山執政，中國民主就有希望。我們敬仰和肯定孫中山對民主的信仰和推行，但我們不能斷定孫中山執政中國就必然能實現民主。因爲這裡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未在現實中有肯定的答案。這就是孫中山取得天下後他是根據權源於民的原則，把權交還給人民，取得人民信任和委託後再「坐天下」，還是「當然」地，打天下者坐天下，也就是權源於「打天下者」。若前者，中國有民主的前途，若後者，中國只能有一個有限期的「治世」。到了中山二、中山三……：民主必易位於專制。另一個例子，列寧沒有把權歸還於民（當然其布爾什維克本身就是專制政權），他尚可容納一些不同政見者，但到了斯大林就成了獨裁魔君了。再一個例子，華盛頓不是憑其「理所當然的打天下者必然坐天下」而當總統的。他是在打下英國的天下後，把權力歸還給美國人民，在人民選舉後任總統的。華盛頓和他的同志們，由於做到了「權源於民」而營造了一個世界最強、最具典型的民主政

制。這裡我們看到，民運爭取民主的本質理性是重要的，但爭取民主程序理性更重要。一個消除了專制因素的民運組織，提供了實現「權源於民」的條件。如果他們能把民主的「程序理性」重於「本質理性」的話，實行「權源於民」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他們把民主的「本質理性」代替「程序理性」，則會認為「我們必然會民主執政」和「執政為民主」。至於還政於民、民選民監等「程序理性」就不會重視。這樣也許可有短期間的民主，時間一長，權力的誘惑，必令其步向專制。

四營造民主文化是民運者首要任務。

我們不準備，也沒有辦法在這裡討論民主文化的所有方面。我們只談及其中極小的一點，說明營造民主文化的必要。大體上講，民主文化有下面幾個重要內容：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社會上各集團間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他們間的複雜關係與運作，均以民主為指導原則。社會上民主程序的立法，嚴正的執法，嚴格的守法，對人權、公議、自由的享受、維護和尊重，是人民生活的必要內容、準則和習慣，且具有道德功能。

我們就從抗戰後國民黨不放權和共產黨鎮壓民主人士各方面來分析一下有關民主文化的重要性。

(1) 專制統治者絕不會自動向人民讓步的，我們提的和平演變，用和平手段實現民主化有一個必要的、不可缺的條件，就是壓力。就是人民施於統治者的壓力。沒有壓力統治者必更獨裁和殘酷。壓力大，讓步大，壓力小，讓步小。世界上不存在沒有壓力下的獨裁統治者向人民讓步，施行民主政制的事例，西班牙的現狀亦如是。

(2) 壓力不能令獨裁統治者讓步的歷史是很

多的。抗戰後國民黨在美國、中共、中國民主黨派、中國人民的壓力下，起初是讓步了，召開了全國政協會議。若趨此方向走去，中國或許可走出一條民主之路。但國民黨「悍然」撕毀協定，導發三年內戰，退避台島。蔣介石為什麼要「悍然發動內戰」？問題是外界給國民黨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壓力，却要蔣介石作出百分之百的讓步。蔣介石不是愚夫，他對中共的意圖不會不了解：中共簽定協議的目的是創造更好條件消滅國民黨。在拼死一搏或可求存，放棄不爭必被消滅的兩難情況下，蔣介石只好拼死一搏了。如果中共在抗日時是全心抗敵，和平後兩黨都有和平共處的誠意的話，和平之路是存在的。關鍵問題在於兩黨相互為敵，都以消滅對方為最高目標。

(3) 壓力有效的情况。首先統治者不至於愚蠢僵固、無理性；其次施加的壓力要強大而緩慢地，且壓力大於要求。讓統治者在權衡利害後，取其害小者而讓步。我們現在舉三個例子來看一下中共對人民的讓步。其一是中共始終沒有指示過要「分田到戶」，但在全國農民都把田分了後，成了客觀存在，形成了一股力量施之於中共。在權衡分田利害得失後，中共默認了分田的合法性，並以政策固定之。其二，中共到今天為止都反對背離馬列主義和一切反黨意識。我們可從「反右」、專政了那麼多的「反革命分子」（政治犯）和迫害知識分子可見一斑。中共並非不想輿論一律，並非不想把王若水、劉賓雁、吳祖光等投之入獄。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因為今天不論黨內外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意識形態上「與黨不一條心」。在專政鎮壓與容忍讓步的比較下，後者對黨利大弊少，因此就沒有像鎮壓右派和民運人士那樣對待他們，故有今天的局面。其三，最

近香港新華社（香港的中共黨）導演了一齣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領導班子產生的鬧劇。新華社一手包辦搞了一個「等額提名，鼓掌通過」而產生了諮委會領導。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且表示選舉結果不可推翻，但香港輿論嘩然。在輿論壓力下，新華社被迫低下頭來搞一個重選。因為若不向輿論屈服，信譽損失更大，只好讓步了。

可見施加壓力迫使統治者讓步的理論是可以成立的，現實也存在的。問題在於有沒有壓力——人民是否團結和行動起來，爭取的策略是否適當。

上面只講了民主文化中的政府與人民關係一面，而且是人民施壓力迫政府讓步的消極作用一面。如果人民在一切方面都對政府施壓力逐步地令政府接受了壓力——讓步的公式，對人民的壓力養成了吸收的習慣，也就是具有了民主文化的修養，中國就可納入民主的軌道運轉了。在一個沒有民主文化實質和傳統的社會，沒有民主意識的人民中，是不能脫離實際地出現一個神聖完美的沒有專制因素的民運組織的。退一步說，即使有了這樣一個組織，你要把權還給人民，沒有民主文化的人民是承接不了「民權」的。還權於民可能會便宜了政治野心家，給他們建立另一個專制政權的好機會。所以健康的民運組織應與民主文化社會共同成長，還政於民也只有具備民主文化的國度才可行。中國民主文化的營造除了「中國民聯」以「專業」的姿態在進行工作外，中國人民也已在自發地或自覺地進行着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對民主的信心是建立在上述理解的基礎上的。我們的「民運要步向民主」，也是在上列理解的基礎上提出的，我們對權源於民也是在上列假設的條件下實現的。

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給黃鳳祝的信）

（中國大陸作家·西德）
遇羅錦

編者按：本刊上期刊登了對遇羅錦女士和黃鳳祝博士的訪問記，引起了讀者的興趣。現兩位當事人在讀過上期中國之春後，雙雙作出迴響。迴響中，又涉及到其它一些觀點，本期希望讀者進一步參加討論。

鳳祝：

你的文章我在「中國之春」六月號看到了。我不想多說什麼，永遠感激你。感激你那紙經濟擔保書，把我從中國「救」了出來；儘管你很不愛聽這句話。

我祇有三點疑問和更正：

① 假如在出國以前，我給你的信，不是你在發表的這一封，而是四月十日「中央日報」和五月號的「爭鳴」上我的文章的話，那麼，請問你還敢給我寄經濟擔保書嗎？（沒有它我又怎麼出國？）

② 你確曾為我在西德找工作盡過力，可是「講學」及在「德國之聲」的工作都沒有談成

，祇是臨時性的掙了一點點錢。多少「博士」都在餐館打工，如果這麼好找工作，你兩個博士學位的人何須還開餐館呢？如果這麼好找工作，那些不准讀「博士後」的留學生何須還發愁呢？我遇羅錦外語根本不行，僅學過三年俄文。在大學教學，在電台廣播或編譯，能有我的份嗎？但我永遠感激你，你確實盡過力，可并不像你說的好像工作已有着落。

③ 你引用了我三月十九日的信中這句話：

「……一切『罪』因都出於我不想回去，請原諒！請原諒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懼怕！」

而我信的原件是「中國人對中國的懼怕」，並沒有「人」字。是你的秘書小姐多添了一個字呢，還是你看錯了？而且為「中國」和「中國人」的問題，我和你爭論過不知多少次。你說中國是資本主義，我說中國是封建主義；你說中國的落後在於中國人的素質——愚昧，而我認為是制度的不合理，中國人很有頭腦，一點不愚昧。你說「紅衛兵」的例子，我舉「黨衛軍」的例子——青年照樣被煽動得起來，而祇因後來制度的合理，西德發展得多快！你

說：「遇羅克僅僅是知道人應該怎麼活着，而我（指你自己）到今天還不明白人為什麼活着。」我祇有冷笑一聲。我倒很希望你在「中國之春」上盡情闡述你的論點。還有，你說：「即使中國有個好的制度，中國人也接受不了。」我常為這句話氣得和你爭吵，我說：「不對！假如趙紫陽真下決心大改的話，人民會萬眾歡騰！」你說：「像王希哲那樣的是極少極少。」我說：「不對！很多！祇是有人敢講有人不敢講罷了！不敢講也是因為專制嚇的。」我們一談到中國的落後，分歧便這樣之大。最後你跟我嚷，你是研究了十年中國的，為此得過博士學位的。而我雖然沒有空洞的理論，却是土生土長，在中國摔打了四十年的。我對中國人充滿了這樣深厚的感情——上至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下至老百姓和獄中的政治犯、刑事犯，我都愛，一百個愛，一百個認為他們聰明！如果有個合理的制度，人人可以不必再揪心、苦鬥地過日子，連做一國之主都必定輕鬆不少。可以不必再要圍牆，可以不必再要衛兵，可以騎着自行車和老百姓隨便談話；從上到下都有法可依了，都會改變精神面貌，國家會飛快進步的。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共產黨員、高幹子弟，也有很多好朋友是什麼地位也沒有，的待業青年，我愛他們；以及我所生活過的、共同相處過的農民、工人……我愛他們！他們勤勞、智慧、聰明極了！他（她）們最知道怎樣管好農村、學校、工廠、機關、街道；管好一切。他（她）們因為身在其中，深有體會，他（她）們最有發言權。可是，人們不說，麻木了，忍了，好像是「愚昧」，難道這是瞭解中國人嗎？這是瞭解中國嗎？中國人怕的是那個制度——沒有法制，而不是怕中國人。！相反，我却看到你才是多麼看不起中國人。

我常噫你：「你說這話時，已經把自己不算中國人了嗎？你到底是中國人、菲律賓人還是德國人？你如果是中國人，是華裔的，你到底對中國起過什麼促進作用？還是吃飽了喝足了，左手摟個德國夫人，右手摟個香港情人，在自己開的飯店裏，肚子裏是大蝦和小牛肉，喝着牛奶紅茶來消食，飽滋滋地剔着牙品論着中國人的『痛苦』和『愚昧』，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來顯示自己的居高臨下，『眾人皆醉唯我獨醒』，可是決不加入中國籍（注意：是入籍，而不要其他的國籍，以免一受氣就坐飛機跑掉），好好生活幾年，好好體會體會！好像唯有你們才最懂得中國。出着痛苦的中國人的書，賣着痛苦的中國人的錢（作者却分文稿費、版酬沒有），品論的這個中國人出現在你們面前說他不想回去時，你們又不滿，讓他回去，說他糊塗、做錯了。是呵，我們一個個被割了喉管你們才興奮呢——又有研究的題目啦。跑出一個，少一個研究的對象，對不對？我們再有個批人打人抓人鬥人的什麼革命運動，你們才興了奮了，給你們的空虛好增添點刺激呀！——是的，這話，在我跟你吵得不可開交時，我便說了：「好哇，我也這樣來愛國吧！什麼危險都沒有，還以愛國人士自居哩！空研究它十年！」

後來我們都不願吵了，從那以後，我對你才算初步有認識。我出國以後的種種感受，已足夠寫幾萬字的小說。還不僅僅是你給我的，是許多人給我的。而你的思想在西方人中竟很有市場！他們表面尊敬中國人，實際心裏認為中國的落後、不安定在於中國人的愚昧。我一聽這話就氣不打一處來。我很希望『中國之春』能夠討論這個題目：「中國的落後、貧窮，是因為中國人的素質，還是因為沒有健全的

制度？」

至於我這第③點的更正，為什麼中國人對中國懼怕之詳細註脚，請大家看四月十日的『中央日報』或今年第五期香港『爭鳴』雜誌——「我為什麼要在西德尋求政治庇護」一文。可惜黃鳳祝「傷感」了半天，却對我的這些理由隻字不談，是否那些迫害也是我們「愚昧」造成的呢？更詳細的註脚則是「在中國，一個結過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這部自傳文學。作家，是不會靠聊天來寫書的，她靠的是視覺、聽覺、嗅覺、觸覺活動——靠的是心的

●特稿專欄●

對遇羅錦政治庇護的

進一步說明答客問

① 遇羅錦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經常提到中國無自由，無法制，你對她的這些看法有何意見？

答：在遇羅錦發表的文章裏，時常出現「愛」、「自由」、「法制」等名詞，并把中國現狀全歸罪於毛澤東一個人。事實上，人們是否認識到，舟浮於水上，是水之力還是舟之力？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明白了這一點，一切問題就會很明顯地擺在眼前了。

假如一個民族裏存在着一些人，祇懂得愛自己，以自己主觀的自由高於一切，認定有利於自己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這類人必將成為

感受。正因為我的英、德文還不行，在學習和生活中，會因此產生許多很有趣的、生動的素材，也正是那些語言關已不成問題的人，所不會有的素材。因此我才覺得，十年後，我把這一切寫成一本書，定會與眾不同。呵，我充滿了樂趣！

鳳祝，我再一次感謝你把我從中國「救」了出來！

永遠是你的朋友：羅錦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受庇護中

野心家最好利用的對象，亦是促使群眾鬥群眾的最好基礎。

法律是人們用條文形式固定下來的某些意志，是由社會與政治因素，即歷史因素形成的，它會隨着社會與政治的進展而改變。法律并不能單獨執行，而是人民必須遵守的，當有人做了違反法律的事，法律就會促使治安機關與法庭執行其任務，維護法律的效能。

將國家的「不自由」、「沒有法制」及「法制不健全」怪罪於一個人、一個黨或一個政府，似乎是過於片面了。事實上，人們并不需

（西德）黃鳳祝

要救世主，而是需要一個有高度知識的社會體制。如果中國的人民都能具高度的獨立判斷能力，那麼，一切運動就不會像週羅錦所說的，是因為上邊要搞、或上邊不搞才掀起或終止。

週羅錦說過：「當時的『反精污』祇因上邊不想搞了，所以才沒有搞起來。」這不是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在中國，還有很多缺乏是非的獨立判斷能力的人。

②週羅錦說：「許多華裔作家及海外民主人士都自稱是愛國的，祇是這些愛國之士，却死也不肯到中國大陸定居。」你作為一個海外華人，若有機會是否願意回去？

答：週羅錦的講法，可算是一棍子打死一船人，這恰巧正是中國某些當權人士的作風。

據我所知，當年搞「歐訊」的一班朋友，有多位已回國定居了，而且還有好幾位正打算回中國去服務。而我自己，早在一九八二年便與內人一起申請回國教書，祇是被有關方面拒絕了。週羅錦經常在朋友面前指責我，說我是想在西德長期居留，所以才娶了個德國太太，這實在有些無稽。

婚姻對我來說，祇是愛情的一種手段，當愛情必須用法律來保障，以使兩個人能共同生活，即是把愛情法律化，這是一種對社會的屈服，是一種無可奈何。婚姻雖然能使我在德國留下，但並沒有阻礙我想返回中國的希望。

③週羅錦說：「要是真的搞一搞資本主義，也就不會再有『黨大於法』的現象了！」你同意這個看法嗎？中國的問題是否是制度上的問題？

答：事實上，什麼叫做「資本主義」？什麼叫做「社會主義」？不單是週羅錦本人不甚了了，甚至於『中國之春』的某些作者（如李玉先生）亦不甚了了。我認為中國現在存在的

問題，並不在於它實行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因為歷史的發展，並不是以一個人、或一個黨的意願為轉移的。「黨大於法」的情形，亦不是中國大陸才有的專利，台灣亦是如此一般。也許，這就是中國的政治通病吧！

談到「制度」，那我就李玉先生的觀點來說吧。

讀李玉先生的「歷史的脚印」一文感到有許多牽強之處，有些論點甚至近乎武斷，失去客觀性，看來好像是一種政治宣傳，不是以事論事地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

李玉先生以「既定方針」指出：「中國必須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唯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這種論調，我感到祇是想以一種主義取代另一種主義的傾向而已。即使中國目前真的如週羅錦及李玉先生所言，實行了資本主義，中國的發展是否能超越印度呢（我認為中國目前的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人民並不是「政治」的試驗品，是不可以用各種實驗方法來證明哪一種制度才能符合中國現況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是經過長時期發展，才達到今天的成就的，稍有讀過歷史的人，或對其他落後國家有深入瞭解者，就會發現專政制度并非所謂「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的特產。在德國有過希特勒及納粹黨領導的資本主義社會，菲律賓有過馬可仕的獨裁政府，台灣現在是由國民黨領導的資本主義社會。

但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向，大體上是走向文明開放的、多黨制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信仰者，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標。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認識上的差異），

祇是手段問題，即是，用什麼手段才能達到所謂真正的民主？這是一種由於對利害認識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要去除這種差異，必須先去除主觀利害，並提高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無知的謾罵與指責是無濟於事的。

對週羅錦與李玉的謬談，我不想一一反駁，祇想提供一些觀點，給大家參考：

什麼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一種看法，是經濟學上的一種人生觀。這種思考方法是以追求「經濟上最高效益」而建立或產生一種社會結構，人們統稱為「資本主義制度」。「社會福利」與「人道主義」并非形成資本主義時的最高原則，因為，它當初的最高原則是「經濟上最高的效益」。

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忽略了社會福利與人道主義這個原則，因此形成了很多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受壓迫的人起而反抗，因而產生了十九世紀的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

社會主義這種思潮，在古希臘柏拉圖時代，西歐的基督教思想早已存在，而不是馬克思所首創的，他祇不過想嘗試用科學的方法敘述這種社會而已。

現今西歐的很多社會福利，是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人道主義）而制定的。在西歐的工人運動中，如果人們當時沒有對社會福利的努力追求及爭取，我相信，西歐目前就不會有這麼完善的社會制度及對人權和社會福利的保障及尊重。

所以我認為，對社會主義，或馬克思的謾罵是無補於事的，那祇會使自己陷身於意識形態的泥沼之中，並不利於中國問題的科學性探討，或提出任何有利的建議。

東隅已失，桑榆未晚

——評左中右獨一致喝采的

國共交「機」談判

●本刊評論員●楊漫克

隆隆巨響，銀燕北飛，塗有中華民國國旗的華航波音七四七貨機飛抵廣州，造成國、共兩方三十多年來的首次接觸，意義極為深遠。

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常常會改變歷史的發展進程，導致政治時局戲劇性演變。有人甚至把這次事件和歷史上的西安事變相提並論。從海內外新聞媒介對此事件的迅速而強烈的反應和震動，各種政治色彩的人士、學者們的紛紛評論，足見它的意義和可能引起的各種政治後果是不可低估的。這也反映出海內外廣大有良知的中國人，對國共雙方打破僵局、結束交惡，解開令人痛心的歷史怨節，抱着滿腔熱忱和期望。

從大陸方面來看，華航事件說明共產黨的長期統戰政策已顯示出其效果。且不談共產黨統戰策略的主觀願望和心理如何，從事態發展的過程中，北京方面還是做出了些許讓步的（如交機地點從廣州移至香港）。共產黨目推行改革與開放政策以來，自身處世界新潮中，也在發生着微妙的改變。對共產黨的轉變及其在統戰工作中能夠表現出的某些誠意，我們認為是應當肯定和鼓勵的。

從台灣方面看，國民黨一改歷往的趨避心

理，敢於讓華航與中航對等談判，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積極起色。這次行動實際上已突破了其長期堅持的「三不政策」，改變了台北在與中共歷次外交爭端中抱殘守缺的消極姿態。我們希望國民黨能夠從此次談判中總結經驗，壯起膽量，在中國統一和政治舞台上，扮演其應有的政治角色，重振出「北伐」時代的那種勇氣來。

從香港方面看，港府當局在此事件中，起到中間協調的作用。願香港在「九七」前後，能為中國政治的緩和與進展，做出她特殊的貢獻。

這次事件顯示出兩點客觀事實，值得注意。

一、國民黨全無必要畏懼與中共任何形式的談判。其實華航事件對雙方來說都很突然。在北京二封電報的催促聲中，台北宣佈願意談判，北京方面竟提出延期幾日。足見中共并未做任何實際準備。觀統戰全局，在許多問題上，北京方面擺的是空城計，知爾未敢犯也！國民黨應擺脫歷次國共合作的失利陰影，要有毛澤東當年赴重慶談判的勇氣和喊「將委員長萬歲」的肚量，方能以弱取強，轉被動為主動。

二、國民黨歷來認為：如果與中共接觸，

必會亂了陣腳，島內士氣瓦解。從這次談判的輿論反應看，對國民黨敢於談判，海內外、左中右獨，竟一致喝采。這是一次很好的民意測驗，國民黨應知民心與潮流矣！中國統一，勢在必行！國土分裂、骨肉分離的局面，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國民黨與共產黨，本是中國近代史上出現的兩個革命和進步的政黨，聚集了中華民族的大批精英豪傑之士。在北伐統一中國和抗日救亡的兩次民族危機中，因為能携手并力，共赴國難，才為民族作出了偉大的歷史貢獻。只可惜，多黨政治的民主觀念，沒有被各自的領袖所接受。危局一去，就手足相殘，置國家、民族的前途于不顧，使人民飽受戰亂之苦，使政治停留在封建愚昧的水平，使國家不能振興，長期處於世界潮流之末。哀哉！中國，一部辛酸的現代史。

東隅已失，桑榆未晚！往事不足惜。今日的世界，正處在浩蕩的民主與變革的潮流中，中國人民的民主覺悟已不可與過去同日而語了。中國欲想圖強，國、共兩個執政黨必先痛改前非，反省歷史，在新時代中重新携手，至誠合作，以民族、國家利益為上，以民主法治的精神立國、治國，中國尚還有崛起之希望。如果，兩黨不知悔改，繼續交惡下去一黨獨大，終究將會被中國人民所唾棄！

中國民聯作為一個政治壓力團體，誠摯希望國共兩黨能夠接受民主的精神，互相比翼，看誰向政治民主化方向走得更快。我們從成立之日起，一貫堅持鼓勵兩黨平等接觸，重新合作，結束分裂，造福於人民，造福於子孫後代。願此次接觸成爲來日國、共政治合作的先機，願國、共兩黨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都有新的起色！

我看兩航談判事件

(華僑·美國) 周立仁

自從五月初華航一架七四七貨機，從曼谷飛往香港時轉降廣州白雲機場，華航同意和中航在香港直接談判收回人、機、貨後，全世界的華人都注意這一事件的發展。

儘管華航一再表示這只是兩個公司之間的業務商談，不涉及政治，超過人、機、貨三件事以外的，華航無權處理，也不會處理；儘管台北官方不斷聲明這是基於人道，爲了營救機員，由民營的華航公司出面，並不表示台北的「三不政策」有所改變。但是誰都會感覺到，無論台北怎麼說，這總是一九九九年以來，國共關係的一件大事。雖然海峽兩岸的運動員選手早已一同競賽，學者專家也經常在一些學術性的場合共處一堂，一些取得了外國籍的知名人士，更是在北京和台北間穿梭來往，但性質都不能和這次事件相比。因此筆者認爲，中共在對台灣的做法上，一向標高姿態，要求台北實施三通；海內外萬萬華人也主張三通，甚至連台北的立法院和高雄市議會以及部份刊物，都公開提出，要求准許離鄉背井幾十年的大陸籍人士回去探親（事實上，台灣地區的居民，在國外打個轉回大陸去探親，以及在香港會親的，每年都有上萬人），「中國之春」也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共的統戰不足畏，儘可放膽地和它去談，如今華航事件終於使中共得到了這一天外來的大好機會，不管是否能因此達到它打破台北「三不政策」的目的，但却是一個應該好好利用的機會。

但是就華航接受與中航談判以後，以及到五月十九日爲止的三次談判來看，中共的表現

實在令人失望。

從一件很小的事，可以看出北京最初根本認定台北是不會答應談判的：例如，華航提議在五月十六日開始談判，中航認爲時間倉促準備不及，要求延後。

華航貨機五月三日降落白雲機場後，中共第二天就打電話報給華航，要求派人談判，華航不予理會，只透過第三者出面交涉，於是又有中航的第二份電報，表示可以在中國以外的地點談判，華航仍無答覆，中共可說是完全掌握了主動，使台北苦無良策。即使台北在五月十一日同意與中航談判後，許多人仍覺得華航的處理真是窩囊。然而中航緊接着却表示時間倉促準備不及，這說明中共對談判思想上根本沒有準備。

另外筆者還認爲，只要華航同意談判，對中共來說，就已經是一大勝利，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實在大可不必斤斤計較。中共把華航貨機改降廣州的事，比作兄弟的孩子走失到自己的家。如果筆者的侄子來到我家，筆者一定好好招待他吃完飯、洗完澡，他願意在我家多待幾天，或自己回去，或要自己的父母來接，或與他們在那裏會合，完全聽他自己的意見，這樣才不失作爲長輩的風範。

華航要求談判公開舉行，但中航要求秘密舉行，在海外華人看來，這又不是涉及國防、外交或國家利益的重大事件，何必弄得如此神秘。與台北的任何接觸都是中共求之不得的，何況是談判，它應該儘量讓世人知道它的經過，爭取台灣一千九百萬華人，和全世界兩千萬海

外華人，以及各國親台北政界人士的好感才對。

這次談判的結果和經過，對台灣一千九百萬人，和海外親台北的華人來說，是對北京觀感的一個重大考驗。在國民黨幾十年反共教育，無時無刻不在強調中共最會利用談判來達到它吃掉對方目的情形下，如果談判一波三折甚至破裂，將會使台北更振振有詞地加強實施「三不政策」，中共以後想再獲得一次這種類似的機會，恐怕是難上加難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要接受中共統治的四百多萬香港居民，關心這件事的程度恐怕也不會在台灣之下，中共對香港提出的種種保證，能否一一兌現，要等十一年後才能知道，但它對台灣統戰所提出的種種保證，却能在這次事件中見分曉。

當然，對台北當局來說，與中航談判必定是經過陣痛之後所作的決定。不管這一決定的過程如何，決定的層次如何，至少到目前爲止，海內外是表示贊成的。台北可以犧牲在亞洲開發銀行中的重大利益，而這次肯爲了索回機員與中航談判，不管內裏如何，表面上至少證明台北還是重視人的價值的。

筆者更大的希望是，台北經過這次事件後，要敢於面對中共的統戰，不迴避、不退縮。中共的統戰伎倆是，你越表現怕它，它越是叫得大聲，等你真正要迎戰時，它反而擺低了姿態，至少在華航同意與中航談判後的初期階段，證明了這點。

站在一個海外華人的立場，筆者希望台北能從此建立中共統戰不足畏的信心，與北京談判並不就是代表妥協甚至投降的信念。

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爭取千千萬萬華人對它產生好感的機會，希望它不要因小失大。

不同黨派是否能

「榮辱與共」

——與劉英先生商榷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趙繼康

中國大陸六屆人代會閉幕前，某報有一篇「特約專欄」，是寫中國大陸政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在署名為列英的該文中指出，政協初期尚能發揮多種功能，但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許多著名的民主黨派頭目，都被打成了右派，從此聲名狼藉。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各級機構，也都「只要一黨領導，不要多派協商；只講一黨當權，不要多派共事。」長期以來，政協已是名存實亡。鄧小平復出後，民主黨派才得以復活。五屆政協後，由於政協委員中，老人居多，專家學者知識份子居多，大都因想到反正自己在世時日不多，看穿了，豁出去了，也就敢講民間想講而不敢講的話，敢提民間想提而不敢提的建議。文章又說明政治民主如今已是民衆的渴望，社會的潮流。全文敘述的歷史情況，大致符合真實。不過，劉英先生很自豪地認為，如今民衆已公認他們是為中國民主政治奮戰的好鬥士，到底有何建樹，未見經傳。文中提出的幾點協商意見，如一、要求中共肅清統戰工作中至今仍存在的左毒，將之作為整黨的重要內容；二、任人唯賢，莫任人唯黨，讓黨外人士能任正職，有職有權；三、

要求按憲法賦予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平等的權利，讓各民主黨派獨立自由地開展工作。三條協商意見，讀來軟弱無力，有點像是下級機關向上打報告，提申請。完全是中共下屬單位的口氣，不像站在平等地位說話。

中共整黨到底應該如何整，是中共自己的事，民主黨派如站在平等的地位，大可不必過問。黨外人士任正職問題，關鍵在人事部門的領導權。人事部門領導權，如果全部屬中共黨組織領導，民主黨派無權過問，則讓不讓黨外人士任正職，全在中共恩賜。而且，黨外人士即使被恩賜了正職，架空的正職，下面沒有民主黨派的成員作支持，副職也必然大於正職。所以關鍵倒是在這第三條，各民主黨派是否能獨立自由開展工作問題上。獨立開展工作，必須和群眾結合。反右時期，凡與民主黨派有所接觸的，大鳴大放，即使放的是自己的意見，也都被打成失去立場，支持了民主黨派「輪流坐庄」，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勞改二十年。所以，自一九五七年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已孤立了民主黨派，在群眾中失去了起碼的威望。要想挽狂瀾於既倒，必須做大量

的組織工作，發展中青年的民主黨派成員，掌握足夠的輿論力量。民主黨派中老人居多的現象很不妙，即使敢講話，也無非是開會發一通牢騷，散會完事大吉。軟弱無力的協商建議，空空洞洞，一不爭經濟基礎的經費，二不爭辦報辦雜誌刊物，掌握傳播媒介的力量，要想有分庭抗禮的獨立自主權，豈非癡人說夢？！

至於最後一條，劉英先生在文中提及，一九八二年一月份，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協宣佈，要同黨外朋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劉英先生建議將來修訂憲法時，將這兩句話，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併寫進憲法，俾便使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並以爲若能如此，不僅能使黨外人士的積極性大大提高，責任感大大加強，而且由於中共的真誠相見，更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可望出現。此說一可見劉英先生十分健忘，對憲法條文的信念頗足；二可見劉英先生對不同黨派是否能「榮辱與共」缺乏研究，至少沒有與民衆充分討論商量。

衆所周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毛澤東說的，在過去也曾立過法，可是兌現了沒有呢？正如千家駒先生所說，章伯鈞和羅隆基先生的章羅聯盟，在一九五七年是蒙了千古奇冤。「政治設計院」的「謬論」，只是一個設想，還談不上監督，就被打成了民主黨派想「輪流坐庄」，千家駒先生指出：章伯鈞手無一兵一卒，他的農工民主黨黨員不過數千人，說他竟想與擁有二千多萬黨員、五百萬軍隊的共產黨，爭一日之長短，豈不是說他發瘋了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張空頭支票，歷史已經作證，一言尚可惹洗不清的是非冤枉，沒有具體的掌握在手的輿論工具作擔保，八個字，就是在憲法上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又有什麼用呢？！即使在中共黨內，最高領導階層，對當前各級中共黨組織有法不依現象，也感到頭痛，又有誰能保證，憲法的白紙黑字，具有實實在在的法律效力呢？

至於，民主黨派與中共「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問題，從歷史情況來看，共產黨對非黨的朋友，從來擺的是居高臨下的姿態，認為黨內黨外，階級覺悟大有高低差別。如今居然認為中共黨的利益，與民主黨派一致，可以「榮辱與共」，不分彼此，這倒是十分新鮮的俯就。不過，民革、民盟、民建、民進、九三學社和農工民主黨等民主黨派，榮辱既與中共「與共」，不也等同於共產黨了嗎？黨內黨外，不分彼此，究竟又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民主黨派在立場上與中共不同，觀點也就不一定會完全一致，處理國家事務的方法方式也必然有異，成敗得失結果也必定不同，相共榮辱，豈非失去了基礎？而如果基礎相同，立場、觀點、方法完全一致，那也就是說，民主黨派已認同於中國共產黨，都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所以才不分彼此。那民主黨派的政協委員們，又何不乾脆加入中國共產黨呢？中共也大可將這些老人居多的學者知識份子吸收入黨，又有什麼必要羅列一連串黨派名目，召開不分彼此的政治協商會議，自欺欺人地裝點民主的面面，而拆穿西洋鏡，大家都是自己人，那政協豈不又成了中共黨人的假面舞會了麼？

民主黨派之中，像劉英先生這樣接受和共產黨「榮辱與共」的提法，甚至希望寫進憲法的，不知是否有代表性？卅多年以來，中共做了許多荼毒生靈的歹事，反右、大躍進、文革中，不知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被關殺、饑殺、鬥殺，還有喊天不應喊地不靈終至認為生不如

死的自殺，劉英先生在文章中，小心地說明，當時是一黨領導，並未多派共事，所以，所有這一切，當然可以不負責任，榮辱難共。但照劉英先生文中所述，民主黨派在五屆政協之後，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之後，已經復活，可說是多派共事了。那麼，五屆政協之後，西單民主牆的取消，許多青年人的入獄，反精神污染的左毒，文藝創作上的壓制，禁演話劇「 Σ 」和「第二種忠誠」的停止出版等等，海外不平，多次聲援，罵中共扼殺了民主。民主黨派是否也和中共「榮辱與共」，分擔這一罵名呢？

海外赤子黃賢回國任教，只是業務之所好，喜歡收集資料以備作研究，資料經官方授給，官方協助運出，完全是「請君入甕」的作法，最後以間諜罪名逮捕。司法部連黃賢究竟是為那一個國家做間諜，都瞠目不知以何作答，竟糊糊塗塗、草菅人命地判刑十五年。（保釋在外也相當於軟禁）此案和類似的冤假錯案，民主黨派根本沒有過問，是否也一概與中共「榮辱與共」呢？這只是隨便舉的例子，劉英先生以上問題方面，到底觀點如何？在「為中國民主政治奮戰的老兵」一文中，絲毫看不出來，也壓根兒未涉及這些問題。但可以肯定，民主黨派之中，觀點絕不可能與中共一致。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與正統派觀點尚且不相一致，這些問題的真相，才有可能在海關嚴密封鎖下，把信息透露到海外，更何況這麼多名稱的民主黨派呢？

只是，中共黨內，有不同的意見，既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不「榮辱與共」。觀點不一，沒有把握的問題，之所以會傳遞信息到海外，讓大家來討論，可能也是少數中共黨員，能夠有「我愛凱撒，但我更愛羅馬」，或

說「我愛中共黨，但更愛真理」的人，才會寧受此辱而願真理愈辯愈明。但民主黨派並非中共黨內，完全可以海闊天空，不受此辱，也不受此束縛，又憑什麼要鑽營入甕，心甘情願地分擔專制罵名呢？

美國的共和黨及民主黨，就並不存在「榮辱與共」的問題。尼克松「水門事件」發生的時候，政府的醜聞，由新聞傳播輿論工具，向百姓完全公開。共和黨並沒有掩飾事實，向民主黨打招呼：「榮辱與共」，大家心中有數算了。民主黨更是抓住時機，群起攻之，逼迫尼克松下台。之後，共和黨在民主黨的卡特下台後，也頗多攻擊。這些都說明，兩黨之間，私交上或許有人在感情上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政見上却是政敵。政敵之間，對政績的成敗得失，絕不可能「榮辱與共」。兩黨在競選時，也常常是互揭短處，比較高低，選民才有可能了解到兩黨政見的底細，認真投票，選自己合意的擁護的人。

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卅多年來，的確「聲名狼藉」，民衆對衆多民主黨派一向只是民主花瓶，也心存不滿。所以，民革、民盟、民進、民建、九三學社和農工民主黨，如果真有骨氣，決心今後不再做花瓶，或仰中共鼻息的傀儡，爲民衆撐腰，就應該對「榮辱與共」四個字不表同意，不受拉攏。但奇怪的是：自詡爲民主鬥士的劉英先生，絲毫也沒有反對，反而俯首貼耳、心甘情願地作中共的附庸，而且還希望把這兩句話寫進憲法。作爲國家大法的憲法，如果真正列上了這一條，也未免貽笑大方，成爲對民主多元的諷刺了！

讀劉英先生的專欄文章，按捺不住異議，希望在修訂憲法時慎重，不知劉英先生以爲然否？

從我們工廠的現狀 看改革前景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洲) 王愛華

胡耀邦、趙紫陽決意改革。其決心之大，不容置疑。然而，中共卅多年來建起的龐大官僚體系，是改革的巨大障礙。「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和「中梗阻」現象，使高層改革派十分頭痛。現在，就從我們的汽車修廠開始說起吧。

機構需大大精簡

我們廠的管理人員和生產工人的比例是一比一，還不算生產班組長。班組長有一半時間用在生產上，全廠一百多個班組，把他們算做半個管理人員的話，非生產人員就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五。

一千來人的小工廠，組織機構龐大，名目繁多：有「黨委會」、「組織部」、「宣傳部」、「紀律檢查委員會」、「保衛科」、「武裝部」、「廠長辦公室」、「技術科」、「計劃科」、「生產科」、「勞動科」、「行政科」、「會計科」、「供銷科」、「外協科」、

「職工教育科」。

除此之外，還有臨時性的「愛國主義教育領導小組」、「振興中華讀書運動領導小組」等等。自推行改革以來，又增加了一個「精簡機構領導小組」和一個「經改核心小組」。

總之，官越改越多，兵越改越少；治人多，治於人者少。很多肉少，生產力怎能上去呢？

承包應講求方式

實行承包制是改革的一種形式。我們科下屬有一個電工班，共十七個人。我們科長從他同學工作的單位承包了更換廠房內部線路的工程。他把電工班分為兩個組：七個人包本廠的日常維修，十個人包外活。四十天時間，就賺了三萬元。

這三萬元怎麼分呢？

經廠黨委研究決定：一萬元交會計科入賬。一萬元做產品鑑定會招待費。剩下一萬元，名義上交職工福利基金，實際上，電工們分一

部分，我們科長包活有功也分得一份。還有一部分是被承包的單位「吃回扣」。因為人家本單位也有電工，只是本單位承包「吃回扣」不方便，才外包。原來人家已經包給了一個合作社的包工隊，講好了「吃回扣」。我們科長和該單位頭頭是同學，答應多給「回扣」，才從包工隊手中搶過來的。

正在包外活的時候，發生了一起電工連犯操作規程的觸電事故，幸好沒有死人。全廠人議論紛紛，都說：「這樣改革，不是外邊拾碎鐵，家中砸了鍋嗎？」「讓技術高的人包外活，本廠的生產還能搞得好好嗎？」「這不是要錢不要命嗎？」

出去包外活的人們也有意見：「忙車工、鑄工、溜溜嗒嗒是電工」，在外邊累個死，多餘不了幾個錢。

「承包」的秘密

我們廠的供銷科，每個採購員都承包了幾項採購任務。

因為我有一個親戚在塑料公司有職有權，所以我提出來承包採購塑料板，規格質量、供應數量，保證樣樣滿足需要。我向領導呈交了承包保證書，兩個多月過去了，總是沒有下文，使我生疑。

後來我們科長告訴我說：「供應我廠塑料板的徐州某廠是老關係戶。運輸隊和採購人員，都可以獲得遠途補助費每天七角錢，又可以輪流遊泰山。每次運料，汽車總得出毛病，多耽誤幾天，既多拿補助費，玩得又痛快！」我這才明白，原來捨近求遠的道理在此！美其名曰「承包」，實際上成了某些人的特權和專利，別人不能涉足。

不能挖社會主義牆角

我的表妹在商業部門，聽她說起承包學問來更離奇。

幾個人承包一個門市部，比資本家還好。當資本家得有資本，無資本貸款又得拿利息。商業承包是國家拿資本，她們賺錢，拿次品當好貨出售，短斤缺兩，想盡辦法欺騙顧客。

「人民日報」登過一篇報導文章，說在首都的永定門火車站，售貨三輪車賣裝好盒的點心，裏面裝的是磚頭！坑騙顧客的事舉不勝舉。

我有一個同事，他妻子在餃子館工作。她們每天專門包些好餡的，每天每人分百十來個



▲白天在公家廠上班，晚上回家彈棉花，幹個體戶掙錢。看來改革的關鍵是突破公有制。

▽廠裡的知識份子分不到好房子，睡覺，做飯都在一間屋。他們的積極性怎麼調動？好房子都分給誰了？我不說你也知道的。



「殘貨」，既賺了錢，又節省了生活費。用她們的話說：「有權的人發橫財，無權的人碰上機會也得撈一把呀！這不過是人家吃肉，我們喝點湯唄！」

科學鑑定會要講「科學」

經濟改革以來，要求產品標準化、名牌化。這種名牌，並不一定是產品適銷對路，而完全是同行業互相吹捧而得名。

去年四月間，開了一次「全國同行業科學鑑定會」。科學二字聽來唬人，其實參加鑑定者，一半以上是工人，並不是什麼科學家。參加的單位有上海、廣州、南京、武漢、北京、

天津、瀋陽的同行業各廠。鑑定的辦法，是給生產工藝各道工序的質量評分。分數高的為第一。幾十個人評了二十多天，住高級旅館，吃高級宴席，開著車玩遍了名勝古蹟。

我們廠為美化環境，買塔松，買盆花，粉刷牆壁和廠房。抽調年輕漂亮的女孩做招待員，陪著吃，陪著玩，花錢如流水。把電工們承包外活賺來的三萬元，整整揮霍掉一萬元。

鑑定的結果還算不錯，評了個全國第二名。其實這完全是騙人的事，我們廠的產品根本沒有達到國家標準，沒有國家的「合格證」，純粹是瞞上欺下。一萬元的揮霍浪費，根本不經會計過賬。這也是實行改革以後的「靈活性」。

獎金的副作用

原來的獎金是佔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一，按人頭平均分，每人每月五元五角錢。實行改革以後，只要全廠不虧本，獎金可達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五，而且改革成了多種形式的獎金。

有「全勤獎」：只要一個月之內沒有遲到、早退，每天來上班，不管幹活不幹活，就能拿到全勤獎。有「安全獎」：不管幹活不幹活，只要沒有出事故，就得安全獎。單從這一條看，幹活的人，總不如不幹活的人得獎希望大。

還有「超產獎」：全月超額完成生產指標，可得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七。所以車間管生產的主任，每月和計劃科為生產指標討價還價，提出種種困難理由，把生產任務訂得無法再低，爭取月月「超產」。超產以後，車間支部書記和主任比平均數多拿五元錢，班組長多拿

兩元，工程師和工人們只得平均數。所以工人們一邊幹活一邊說：「爲官們的五塊錢，哥兒們拚命幹吧，否則長了指標，累死也超不了產。」

每年還有一種「年終獎」：年底決算賺了錢，每人二十元。這就看會計科了。有一年我們廠有八萬元的「待攤費用」沒有攤入生產成本，「造假賬」盈餘三萬元，實際是虧損五萬元。這樣每人拿二十元年終獎，個個高興。

可是，這又涉及到「以稅代利」的稅制改革。賺了錢，就得拿「增值稅」。打腫臉充胖子的結果，就得忍痛報稅。否則得不到獎金，人人罵，會計科長受不了。

領導班子「四化」的問題

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和革命化，是中共推行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用取消領導幹部的終身制，在領導幹部的新陳代謝中達到「四化」。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級應用得維妙維肖，令人嘆服！我們廠是這樣做的：

首先把年歲大、文化低的領導人的子女，用「以工代幹」的辦法，去當領導們的助手，例如各辦公室的秘書等職務。並給一些「讓賢」的領導人分配一套比較好的住房，用一定條件從領導崗位上把他「買」下來。然後，把一個剛大學畢業不久二十四歲的青年，吸收入黨，當副廠長。此人，根本無主見，對上級「是、是、是」，對群眾「好、好、好」，誰也不得罪，真正是老黨員幹部的傀儡和馴服工具。所以，廠裏二十多個大學畢業的年輕工程師，沒有一個能夠進入新的領導班子。唯有此君得

天獨厚，天賜良機，成了幸運兒。

另一個，是公司領導人的兒子，是文革時期造反派的頭頭。當了幾年兵，走後門入了黨，剛剛從部隊轉業回來，到公司舉辦的高中文化補習班脫產學習了一年，學習尚未期滿，提前回廠。這次做爲知識分子，當了黨委副書記。不言而喻，此君與傀儡副廠長有本質上的不同，是個實權派。中共在中央一級搞太子接班班，各級領導人自然會照搬照學。

由於這兩位既年輕又有「知識」的成員進入領導班子，使現在領導人的平均年齡降低很多，文化水平提高了很多，名義上達到了一「四化」的要求。

不過一些老大學畢業生們議論說：「這純粹是太子派接班的變種！」

信貸政策應穩定

我們廠長期以來是個虧損單位，依靠吃國家補貼來維持。實行改革以來，完成了國家計劃，可以搞計劃外生產。銀行也有所放寬，可以給計劃外生產貸款。

我們廠搞了一批組裝五百輛汽車的生產，每輛能賺八千元。搞計劃外生產，國家不給鋼材指標，都是拉關係、走後門，用高價套購的。因爲是虧損單位，生產流動資金不足，前後從銀行貸款五百多萬元。就是這樣，全廠上下都覺得賺一筆錢，指望工資調整的時候普遍升一級。

結果，天不從人願，國家信貸失去控制，銀行總行長被撤職，新任的行長陳慕華「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採取措施緊縮信貸，凡是個體戶和集體戶買汽車一律不給貸款。因爲這種汽車只能欺騙農民中的個體戶，

公家沒人買。所以出產的汽車只銷售幾十輛，其餘四百多輛至今仍然積壓著。另一方面，銀行又催還到期貸款，過期還要加罰利息，外債越背越重。

因此，我們廠剛剛復活了一年，只因一搖貸款，又給搖死了。不僅工資不能提升，現在每月連工資也發不下去了。

怎麼辦？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給我們廠想想辦法吧！海內外同胞也給我們廠想想辦法吧！

我們需要魯迅

（中國大陸留學生·新西蘭）孤子

我想說，中國需要魯迅，需要魯迅的雜文。我們的批評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能像老學究那樣在概念上研討民主和專制。我們不是一群受委曲了的孩子跑到一起來訴苦。我們也不是一群少見多怪的長舌婦湊到一起說三道四。

我們需要一種頑強的民主精神，這種精神不能停留在喊口號、發傳單上面。民主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必須在現實的行動中才能得以實現。我們需要覺悟的一代，我們只有用民主精神、用情感來影響別人。讓每一個人從感覺上感到一種重重的壓力。我們需要的是思想、行動，而不需要呻吟和哭訴。

如果說，這個時代仍是魯迅的時代的話，我相信貴刊必定會是魯迅的喉嚨。

讓我發出第一聲吶喊：
我們需要魯迅！

修正厝隨筆

(旅美作家·台灣) 阿修伯

三面不討好

十多年來阿修伯在海外關心台獨問題，研究台獨問題，全是本着良知行事，是的對的就讚揚，非的錯的就批判，沒有依靠任何一種勢力做後盾來圖謀個人的私利。因此能夠抬頭挺胸，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就是爲什麼阿修伯單槍匹馬參加台獨人士聚會不憂不懼的原因。

台獨人士被批被判明明理虧辯不過我，却又沒有民主風度，於是使用「中國人」祖傳數千年的法寶造謠誣賴我爲國府做文特打手，爲中共做統戰先鋒，向國共兩邊拿錢，賺得鉢滿盤滿。這些自稱「非中國人」的「台灣民族」和狂左狂右派中國人，真是一個「中華文化」模子裏燒鍊出來的，其思想作風是完全一樣，一切「向錢看」他們的價值觀念中只有一個「錢」字，在主題上辯論不過，就把一個「錢」

字往對手頭上扣過去。

這種造謠誣賴本來不值高明人一笑，但筆者畢竟還只是一個世俗中人，爲了表明清白，乃刻意對國共也嚴厲批判抨擊，以示公平公正，使得台獨人士無話可說。這樣一來，却又得罪了左右派中國人。阿修伯既不依靠國共吃飯，更不向國共圖利，得罪了他們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却受到了他們的不友善對待。

對於中共，我希望他們更加改革修正走向民主法治。目前仍然氣味不投，於是敬而遠之，不與他們牽扯瓜葛。對於國府，它到底是實質上控制着台灣，那是阿修伯的淵源出身之處，那裏有我的親戚朋友和一千九百萬同胞。我盼望台灣能安定繁榮，同胞們生活幸福，因此望把分化同胞挑撥仇恨、威脅台灣安定繁榮，不利於同胞們生活幸福的台獨問題提出來，與同胞們共研討，共同警惕。不幸，國府却以敵我矛盾來對待，使用控制通訊的手法全面封鎖阿修伯的文字，使我無法對島內同胞發生影響力。反之，今日島內台獨分類分離意識人士的

所謂「黨外刊物」，已經白紙黑字明目張胆地宣揚偏狹台獨主張，而我對台獨的批判却始終被國府封鎖，真令人迷惑之至。

不可太清

不可太混

俗話說水太清則無魚，而如果水太過混濁污染，也同樣會無魚。這其中有一個不清不濁的最恰當點，才最適用於水族繁衍滋長。

純粹中立獨立又自我清高的人，雖可杜絕小人造謠誣賴之口，但實際上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做了清水但實際上却飼養不了一條魚，徒然是一個迂腐的廢物，沒有什麼用處。反之，善於縱橫捭闔又厚又黑的某人，能從國府那裏「敲」來數百萬美金，又從中共那裏「貸」來數百萬美金，然後打起「中」字旗號來辦雜誌，參加白宮酒會與中美要員合影，果然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其影響力之大比起阿修伯來真是大大巫之見小小巫也。只是其人大過於招搖賣弄，太過於僥倖市儈，太過於混濁污染，如果他「自清」一點，當更能發揮作用。因此，如何拿捏得恰到好處，真是最高的藝術也。

利用形勢

造福民族

處於今日的時代，已經沒有以暴易暴慷慨灑血的革命形勢和條件，對於國共雙方的一切不合理現實，我們都不能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來解決，實際上暴力革命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反而造成國家民族更大的損傷。今天要用和平的、理性的、智慧的、技巧的方法來教育、啓發、導引，促進國共雙方的修正、改良。如何利用國共兩個實力集團互相對立的情勢，來發揮對他們彼此的正面影響力，是我們身處海外華人的一個重大意義的課題。

阿修伯的一個構想是：海外華人只要是秉持一個理想，不必去做一個不食人間烟火的清高迂腐之士，大可使用相當的手段和技巧取得國共任何一方甚至雙方的信任，獲得他們的支助來做些有利於中華民族的事情。這是「用伊的土糊咱的壁」，其實這「土」也不是伊們的，乃是中國老百姓的，用這些「土」來向中國老百姓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啓發工作，奠定中華民族繁榮興旺發展進步的根基，這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也。

一國兩制

和平競爭

國共之間的鬥爭並不是非黑白分明，一個民主自由，一個獨裁專制，一個眞善美，一個假惡醜，一個光明，一個黑暗那麼清楚明白的。兩者各有優劣，各有長短，也有共同的優點，也有共同的劣。自然在程度上是相當差別的。當前最有利的情况，是使兩者保持分離但不敵對，和平友善的競爭，但不鬥爭更不戰爭。

這種競爭足以促進雙方走向共同的光明之路。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也同樣是各有長短各有優劣。在雙方的和平競爭中正好把兩種不同的制度來相互印證比較、修正融合，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最後找到一種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那終極目標還是一國一制，但這「一制」並不是僵硬死板一成不變，在實行這「一制」之前必須先打下一個民主制衡的基礎才行。

目前，阿修伯贊成一國兩制，但這一國只須要有個名號就夠了。即國府和中共都是「中國」的名號，而實質上自己管自己，自己行自己的制度，在國際上各自有獨立的地位和主權，這樣才有「兩制」的保障。如果實際上統一成爲「一國」則「兩制」必然受到侵害，強大的「一制」必然會壓迫甚至摧毀弱小的「一制」，又恢復成爲唯我獨尊、專政獨裁的局面，那就太不幸了。而台獨人士是要把「中國」的名號改爲「台灣國」，行其互不相干的「兩國兩制」，這違背了中國人「大統一」的傳統，損傷了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大統一和愛面子可能都不是什麼好事，但那是具體存在的一股強大力量不容忽視。「台灣國」這個名號只會獲得「不做中國人」的情緒發洩，實際上却足以帶來台灣內亂的大危機，接下來必然引致中共的武力干涉，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阿修伯贊成保持現狀的一國兩制，並不是爲國或爲共做假，我並不贊成他們分別在台灣和大陸長期的稱王稱霸，目中沒有人民，只是希望保留小霸對大霸做一個制衡，人民比較有喘息的餘地和一個盼望。至於左派「愛國人士」一定堅持國旗、國歌，政治組織行政等等都要實際統一，而且要儘早儘快，阿修伯要請問他一句：「那到底對中國人有什麼實際的好處？」

無題

你曾是那麼熱烈

那麼狂暴

那麼深沉

可當生活搓碎了
你像一塊不幸的乾泥

飄飄風中

隨着消失的願望

隨着哀怨的羌笛

啊

多少匆匆而去的黃昏

多少姍姍遲來的早晨

長亭外

偎依着小路的盡頭

有一座覆雪的新墳

多麼孤獨

多麼冷漠

多麼深沉



艾菲



對「大中華邦聯」

的一點看法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黎民

費希平先生的「大中華邦聯」的構想(見「中國之春」一九八五年十月號第三十四期),確實是一個既大膽又極富於政治想像力的一篇文章。它毫無疑義將對解開中國統一這個扭得緊緊的「戈耳迪之結」(GORDION KNOT)起了某種程度的鬆動作用。

要用和平、民主的方式來解開這個結,是遠比用武力解開這個結要困難得多,但却是民心所向,為全中華民族和海內外廣大的有識之士所認同。

費先生的這個構想就是推動「統一中國」這個難題向和平方式解決的歷史方向上走出的一步。

從費先生這個構想的動機、目的和其遭遇中,筆者想起了唐代文學家韓愈寫的「伯夷頌」中的開頭幾句話:「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倍道遠而自知名者矣!」這個「義」在今天說來,就是民族的大義!

。費先生不但是一位深通民族大義的特立獨行的正直人士,而且還是一位具有相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極其敏感的政治洞察力的政治鬥士。

可是,由於這個構想出現在和平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歷史因素還遠未具備的時候,那麼這個構想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既包含合乎歷史發展的合理設想,又包含不合乎歷史發展的空想成份,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不符合歷史發展的空想成份,即「邦聯就是兩國兩制」這個基本概念。

「中國統一」這個問題之所以存在、發生,就是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事實和觀念,不但為國、共兩黨、兩個政府所認同,也為全中華民族所普遍接受。

「邦聯」的定義既然以兩國為其內涵,所以筆者猜想「邦聯」的構想,不但必然會被國共兩黨、兩個政府所拒絕,也必然會被大多數中華民族的成員所拒絕,其理由就是五千年的歷史造成了「一個中國」這樣的既成事實和與

之相適應的民族觀念。

費先生也列舉歷史實例說:「邦聯在歷史上不少見,美國在組織聯邦政府前,就是邦聯的形式,經聯邦會議才產生了今日的聯邦政府。」

簡單說,「邦聯」是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爭取獨立而組成的全國性聯盟。這個聯盟在獨立戰爭勝利後,便發展為美國的聯邦政府。而從中國目前的歷史狀況來看,即使要建立聯邦政府,也並非一定要經過「邦聯」這一階段和採用「邦聯」這一過渡形式。因為美國獨立戰爭至聯邦政府成立的歷史狀況和今天中國的歷史現狀毫無相似之處。儘管「邦聯」在美國歷史上起過一定的過渡作用,但並非具有普遍的意義。

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演變是有規律可尋的,但在具體表現形式和運作方式上却不盡相同。這些不同之處,正體現了各民族的歷史特點和表現為各種獨特的民族形式。故筆者認為「邦聯」有不切實際的空想成份。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使得中國必然直接建立「中華民主聯邦制」而不適於採取「邦聯」的過渡形式。

在中國建立「中華民主聯邦制」以完成統一大業,現已成為海外許多人士的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是中央政府,但都共同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正是一個中國兩個中央政府並存和對立的歷史現實,造成了統一中國的戈耳迪之結。在這個前提下,費先生構想中的合理部分將會得到實現:不但使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避免了被共產黨政府武力統一掉的歷史危運,還使得國民黨政府有了和共產黨政府競爭和平統一的歷史機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可能性將再次受到歷史的考驗)。

建立「中華民主聯邦制」、和平統一中國

的構想和方式，既順乎世界歷史之潮流，也符合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所有民主黨派、所有主義以及多次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

具體方案可參考費先生的建議修改為：

一、國共兩黨和台灣、大陸的黨外民主團體、民主黨派、各特區（如香港等）、各少數民族自治區（西藏等）、各自治省（如台灣）的代表，共同組成中國統一委員會。

二、中國統一委員會的宗旨是建立中華聯

● 短評 ●

誰應感謝誰？

（國內）包致雲

在封建社會中，是普天之下皆王土，國家是屬於皇帝的，百姓只是皇帝的臣民，要對皇上感謝隆恩。而社會主義國家標榜是屬於人民的，是為人民辦事，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自稱，他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按理而論人民的權力應該高於黨的權力。可是共產黨從來沒有感謝人民給他們這樣的權力，而是相反要人民感謝共產黨。他們有句「傳家寶」，叫做：「飲水思源，翻身不忘共產黨」。特別是在毛澤東執政時期，把事情完全顛倒了，人民的一切合法權益都成了執政黨和領導人的恩賜，形成普天之下皆黨土的局面，同封建時代並無異樣。

人民群眾由於害怕共產黨的淫威，「感謝黨」。這句話幾乎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口頭禪。如一個學生考上高中或大學，就要感謝黨培養；一個勞改刑滿的犯人出獄，也必須感謝黨的寬大；一個人被准出國也必須感謝黨的照顧。人民的一切合法權利都被視為恩賜品，人民還有什麼權利可言？！

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各執政黨感謝納稅人的支持，只有社會主義的中國情況特殊，執

邦民主共和國（民主來自中華民國；共和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進行和完成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民族大業。這個委員會的形式在廣義上有一點相似於一七八七年的美國聯邦會議。其目的也頗相似，就是制定一部聯邦憲法，建立聯邦制。但所要解決的問題，前者較後者要複雜得多：（一）力求從根本上結束統一和分裂交替的歷史現象；（二）最終消除中央和地方的對抗性矛盾；（三）最終消除各民族之間的對抗性矛盾。

政黨的老爺們口食納稅人的俸薪，身受納稅人的權力，一朝權在手，便本末倒置地要納稅人來感謝執政黨與領導人。

我們希望標榜民主的中共領導人，能看一看西方一些民主國家執政黨的政治風度。他們沒有強迫老百姓感謝政府，更不敢厚顏無耻地要老百姓來感謝執政黨和領導人。如在歐美等民主國家，如有人這樣做，立即就會被人哄下台。

比毛澤東稍為開明一點的鄧小平，仍照樣繼承毛澤東的衣鉢，要老百姓歌頌黨和領導人。雖然毛澤東已經死了十年，但舉國上下遇事必先感謝黨和領導人的惡習並沒有糾正。

一個領導人或一個政黨能對人民有所貢獻，人民群眾感謝他，這是合乎情理的，我們並不反對，但必須出於老百姓的自覺自願。作為一個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只有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才對。不能忘記，你們的權力來自於人民，你們是人民的兒子黨而不是人民的老子黨，不能要人民來感謝你。如果這樣，勢必壓制民主，滋長一言堂的惡習，並招致無數不良的

，實現民族自治；（四）結束一黨執政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聯邦的中央聯合政府，其結構形式可以是三權分立的或類似的形式。

這個委員會不可能像美國一七八七年聯邦會議那樣，在四一五個月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務，很可能如費先生所預言的那樣：「討論也許要延續十年、廿年，甚至五十年。這一偉大歷史使命有賴於每一個炎黃子孫不斷的關注和努力。」

政治後果。如上所述人民受教育這是應有的權利。教育經費來之於人民的納稅而非來自於共產黨員的黨費。學生能考上某一級的學校乃是出於自身學習的努力，與你共產黨何關？連個人的學習成績也歸功你共產黨，還有什麼個人的積極性可言？犯人服刑期滿應當釋放，這也是應有的人權，各國不論什麼制度，也不論是什麼執政黨上台，都是這樣做的，為什麼唯獨共產黨要犯人來感謝你，這難道不是歷史的倒退嗎？！

由於共產黨喜歡人民歌功頌德，將人民應有的權利兌現都視為黨功，因此，形成人民群眾與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之間不應有的理性顛倒，無形中助長了壓制民主、侵犯人權的作風，並造成官僚主義滋生，特權泛濫，貪污成習等風氣。所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尤其是受過海外民主洗禮的留學生以及廣大華僑，應當多着眼民主政治之擴展，不要再當阿斗，應克服奴隸思想，不要遇事先奴顏婢膝地說「感謝共產黨」一類的奉承話去迎合共產黨人的心理。究竟誰應該感謝誰？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是，經過比較，我們認為，在對待政黨、領袖和人民的關係上，上述西方民主社會比之共產黨統治國家要理性得多。

鄧小平評傳續篇

(第四章)

鄧小平在反右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香港) 寒山碧

編者按：寒山碧先生的「鄧小平評傳」(以中共建國前歷史為背景)，發表後，以資料豐富、考據仔細、評論公允而受到世人的好評。寒山碧先生又以中共建國後的歷史背景，撰寫了「鄧小平評傳續篇」在「東西方」雜誌發表了第一至第三章，敘述了鄧小平在「土改」中、在「八大」會議前後以及在「高饒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現經作者提議，本刊將陸續發表「鄧小平評傳續篇」以後各章。本期發表的第四章，有助於讀者了解「反右派」運動的始末以及鄧在這次運動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八大」之後，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件影響非常鉅大非常久遠的事件——「反右運動」。這場運動以「大鳴大放」、「大民主」開始，以大反「右派」、大逮捕結束。上百萬人受打擊，數百萬人受株連。當年的「大右派」林希翎稱：「直接冤枉上百萬人，間接還不知株連多少人。」(註一)王明則說：「毛澤東自己承認，這個『反右』運動中打擊了八十萬批評和反對他錯誤的人，實際受害者還不止此數。」(註二)

鳴放」是毛澤東鼓吹起來的

「鳴放」運動是在毛澤東不斷煽風點火、鼓吹的情況下搞起來的，而反右就是「鳴放」的收場。王明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毛澤東陰謀策劃和一手泡製的。首先他故意提出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同時并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他還策動召集各種會議，在報刊上勸說和鼓勵大家起來毫無顧慮地講話。」(註三)王明的話是符合事實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假如沒有毛澤東的煽風點火，大力鼓吹「鳴放」是鳴不起來的。而沒有「鳴放」當然也沒有「反右」，因為當時有宣傳媒介，包括報紙、雜誌、電台全都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假如沒有中共官方的合作，任何人的「鳴放」都難超出五十步，其「放」也難出斗室。「鳴放」和「反右」毛澤東是主角，鄧小

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是配角。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鳴放」了。他說：「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註四）接着毛澤東又在各個場合繼續鼓吹，在一段頗長時間裏，毛澤東是在唱獨腳戲，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並沒有附和。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我們看不到鄧小平對「鳴放」和「反右」的意見，祇看到他做善後工作，當火勢猛烈之時便加以撲滅。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毛澤東的大力鼓吹下，原本靜寂的社會終於「鳴」動起來，各種猛烈批評中共的言論，通過中共的報紙和電台向各個不同階層各個角落廣泛傳播；這也就帶動了一場爭取自由民主的學潮，青年學生本來就是思想最為活躍的一群，經過「鳴放」的引動衝擊，平靜的學府也就動起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紛紛貼出反對教條官僚，要求自由民主的大字報，舉辦了形形色色的辯論會。有些地區，學生甚至上街遊行示威，例如石家莊、瀋陽、海南島等。身為中共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對學生的「異動」很感憂慮，他一方面佈置各有關部門加強對學生的工作，多作安撫勸導。他自己也親自跑到學校去。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就親自到清華大學對學生演說，軟硬兼施。一方面規勸學生遵守紀律，不要鬧事，另一方面又加以威嚇。北京清華大學有一個學生公開說：「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鄧小平則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註五）

鄧小平主張「專政」鎮壓

寒山碧所著「鄧小平評傳」封面



一九五九年鄧小平與毛澤東在一起



在「鳴放」和「反右」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跟毛澤東頗為不同。他從沒有鼓吹「鳴放」，却堅決主張「反右」。「鳴放」初期，當社會上出現一片批評共產黨的聲音時，鄧小平憂心如焚，急欲撲滅，這種情緒他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表露無遺。他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

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對於敵人，要進行堅決的鬥爭，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還要用懲辦和鎮壓的方法。」（註六）又說：「運動證明了：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和城鄉各種反社會主義份子進行堅決鬥爭的必要性。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的進攻，是極為猖獗、極為狠毒的，他們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他們的目的是要使資本主義和反動派統治復辟。」（註七）還說：「在反右鬥爭中，必須像對待黨外右派份子一樣，一視同仁地嚴肅地對待黨內的右派份子。但是，現在還有些同志，在反對黨內的右派份子的鬥爭中，表現了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加以克服。」（註八）鄧小平對待「反右」的態度，代表了中共大多數當權者態度。毛澤東則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先是主張「大民主」，後則主張大鎮壓。他不僅在一九五六年大力鼓吹「鳴放」，而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當全國各地的「右派」言論已令劉、鄧等大為震怒之時，毛澤東仍然堅持自己的見解，仍繼續為「鳴放」開綠燈。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許多聽過毛澤東這個錄音報告的人都說，錄音報告與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大不相同。有多處作了改動。毛澤東在錄音報告裏允許人民有更多的自由，甚至允許學生享有上街遊行示威的自由。顯然是中央政治局不同意毛的觀點，所以發表時作了較大的修改。其時，一般科級幹部都有資格聽毛的錄音報告，根本不是什麼秘密。所以「反右」

初期許多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不怨毛澤東，祇怨劉少奇、鄧小平。

人們對毛澤東觀感的改變，是在他的「陽謀」論和「引蛇出動」論面世之後。他的「陽謀」論使人們以為這一切都是他有計劃有步驟地策劃和操縱的。「反右」運動開展後他還說：「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祇聽不說。有那麼幾個星期，硬看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而且不通知團員，不通知黨員，也不通知支部書記，不通知支部委員會，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學校黨委總支裏混進一些敵人，清華大學黨委的委員裏就有敵人。你這裏一開會，他就告訴敵人了。這叫『起義份子』。不是有起義將軍嗎？這是『起義文人』。這一件事，敵人和我們兩方面都高興。……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或者是動搖份子。所以，在我們方面，看見『起義』的，我們也高興。那一年清黨、清團清得這麼乾淨呀！他們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們清理。」（註九）毛澤東這番話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說的，他不可能在一年三個月之前就策劃佈置打此一「戰役」，其實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是受到黨內抵制的，如果一早說明是「陽謀」就不會受到抵制了。

毛澤東估計形勢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最早提出「鳴放」方針，但沒有人附和響應。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等都不發言。其次，「鳴放」運動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號召，而是以「最高國務會議」的名義向全國傳達，有違中共行事的慣例。因此使人不

能不懷疑「鳴放」政策未能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贊成，毛澤東才不得不另闢蹊徑。

毛澤東的「陽謀」和「引蛇出洞」論，實際祇是自我解嘲。他從「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中汲取教訓，認為應該讓人民說話，允許人民批評共產黨。更由於中共自「抗戰」之後節節勝利，他堅信中共在人民群眾中威望很高，絕對不會出現什麼亂子。所以，當「萬馬齊喑」，無人敢說話的時候，他便大力發動宣傳機器和各級黨委，上上下下都大力鼓吹「鳴放」。等到「鳴放」真正開始，毛澤東才發覺形勢不妙。才不得不逐漸改變語氣，並終於在六月八日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號召。他說：「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動份子猖狂進攻，黨團員中的動搖份子或者叛變出去，或者動搖思變……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註十）

毛澤東首先是過高地估計中共的威信，繼而又過高地估計所謂「右派份子」的力量。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再次發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號召。并劃出百分比，使「反右」運動按照百分比來「對號入座」。他說：「拿學生來說，北京大學有七千多人，右派祇有百份之一、二、三。什麼叫百份之一、二、三呢？就是堅決的骨幹份子、經常開的、鬧得天翻地覆的，始終祇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為他們拍掌，擁護他們的。」（註十一）又說：「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總而言之，無

論什麼地方，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是我們的朋友、同志，不要怕。」（註十二）

上有所「欲」，下必甚焉。毛澤東既然定出百分之三、百分之十，下面當然努力爭取「超額完成任務」。受害的人自然遠遠超過毛澤東預料的數字。

在「反右」問題上，鄧小平曾經是積極份子，這點他是直認不諱的。鄧小平二十三年後（一九八〇年）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說：「為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講，文化大革命前，黨犯過一些錯誤，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樣，也犯過一些錯誤。我看這樣講好，符合實際。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份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註十三）

鄧小平雖然有勇氣承認自己在「反右」中犯了錯誤，卻沒有勇氣徹底否定「反右」運動。他雖然為八十萬「右派份子」平了反，却要留下五名民主黨派中的「大右派」，和學生中的林希翎（中國人民大學）、譚天榮（北京大學）等不予平反，藉此證明「反右是有必要的」，錯誤祇不過是「擴大化」而已。他說：「我們還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錯劃為右派份子的案件。這裏我要順便說一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有必要的，沒有錯。同志們可以回想一下……這個時候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是隨着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註十四）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鼓起很大的勇氣為「

右派「平反」。儘管還不夠徹底，但毫無疑問也是一件值得讚揚的德政。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對「反右運動」所造成的損失和久遠影響有充分的認識。而劉少奇、鄧小平等「反右」健將也不能不負一定的責任。

「反右」運動帶來的惡果

「反右運動」表面上是中共擊退了所謂「資產階級的瘋狂進攻」，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實際却是中共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此後二十年（一九五七—一九七六）禍國殃民的狂左路線就是以「反右」為正式起點。其影響也可謂久遠了。

第一，「反右」運動使中共反民主獨裁專政的臉孔，在八億人民面前充份暴露了。以前中共予人以「革命者」、「土改者」的良好印象已一掃而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中共長期來所營造的形象，所建立的信譽已毀於一旦。自此再也沒有人相信中共所說的話；同樣也沒有人肯對中共說真話。

第二，「反右」運動把八十多萬人打成「右派」，以每一名右派有三名家庭成員計算，起碼有三百多四百萬人受到直接和間接的打擊。「右派份子」以知識份子為主，這批人數是各行業中的精英，是有骨氣敢於說真話，敢於為民請命的精英。這批人遭到打擊，遭受侮辱，不僅僅是他們本身受到否定和嘲弄，而且是中國讀書人傳統道德精神受到否定和嘲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傳統受到否定和嘲弄。「道德真空」也於此時開始。

第三，「反右」運動是「無限上綱」學的啟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任何「上綱」推理都有一定限度，超出限度就成荒謬。可是「反右運動」却創造出一套「無限上綱」的怪異邏輯。例如，某甲是黨員支部書記，某乙與某甲感情不睦，公開批評了某甲。於是某乙被打成「右派份子」，其理由是：某甲是黨支部書記，是代表黨來領導這個單位的，你攻擊某甲，就是攻擊黨的領導，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無限上綱」一經創造發明就成了打手們的金鋼棒。這支金鋼棒一直揮舞二十年，「文革」期間更是達到頂峰。

第四，「反右」運動實際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運動。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謊言被當作真理，真理也就變成虛妄。假、大、空哲學就是始於「反右」，「文革」期間發展到高峰。

第五，「反右」運動否定了知識的價值，毛澤東公然提出「外行就是要領導內行」，大量學有專長、熟悉業務的人被趕下去，大批沒有知識不懂業務的所謂「積極份子」登上了領導崗位。為以後一系列的錯誤播下禍根。

第六，「反右」運動強調「黨就是要領導一切」。使中國大陸社會不僅變成一黨專制，而且變成一黨專橫。共產黨凌駕於一切之上，它已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的主人。人民與共產黨的關係也自此疏離，且越來越惡化。可是這種惡果中共高層包括鄧小平在內，並沒有看到，他們一直對「反右」給予很高的評價，要等到二十五年後才改口。

第七，「反右」運動之後，無論黨內黨外，都噤若寒蟬，再也沒有人說真話。全國上下響起一片歌功頌德，阿諛諂媚之聲。中共高層也就信以為真，於是改變了最初擬訂的計劃，

加速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把中國大陸的經濟帶到破產的邊緣，把八億中國人民推進苦難的深淵。

註釋：

（一）林希翎「給鄧小平的萬言書」三十頁。

（二）王明「叛徒毛澤東」一百六十四頁

（三）王明「叛徒毛澤東」一百六十三頁

（四）「毛澤東思想萬歲」三十八頁。

（五）「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百三十三頁

（六）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八屆中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二百六十九頁。

（七）「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閱讀文件彙編」二百七十頁。

（八）「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閱讀文件彙編」二百九十二頁。

（九）「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五頁

（十）「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百三十一頁至四百三十二頁。

（十一）同註九，四百四十一頁。

（十二）同註十一。

（十三）「堅持黨的路綫、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二百四十一頁。

（十四）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二百〇七頁。

列寧格勒

你給了我什麼？

(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 伍石村

「中國之春」第廿九期的醒目標題「李鵬（留蘇派）掌權是中國最大的災難」佔該期重要位置，的確有助於人們「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遠些」。

前一段時間，在朋友們的熱情安排下，我去列寧格勒旅行了幾天，其感受甚巨。

記得當我們的汽車一踏上蘇聯的邊境綫，不禁使我頓然有「二個社會二重天」的感覺。大概是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間長了，習慣了「資本主義」的一切，所以此行又有「第二次出國」之感！蘇聯的邊防軍認真、仔細地檢查了汽車的各個部位（如打開發動機箱等），並有警犬在車內「嗅覺」一周，真像是一如「臨大敵」啊！隨後，我們去換外幣，按牌價一個盧布折合〇·七〇美元。但有經驗的朋友對我說，入境後「黑市」要高得多。果然，在途中休息時，幾個青年人主動找我們搭訕，聲稱一美元可換三個盧布。這時我對朋友說：不是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這等事？中國大陸現在也有類似情況，但似乎還沒有這樣明目張膽。我的朋友笑了笑說：「這在蘇聯已是多年了

，已不是什麼『新聞』了。」這時，過來一個軍人，說這不能久停。我看看周圍，除了森林就是田野……

到了列寧格勒，它的宏偉氣魄，的確使我切身地感到俄國人民的偉大。特別是它的建築風格，體現着其民族的一種氣質——沉重！強烈！列寧格勒的市容，透過車窗，到處可見那老百姓買東西長長的隊伍，遠遠望去，街上人們衣着色彩單調（真是還不如北京、上海、廣州呢！）。軍人處處可見，「阿芙樂爾」巡洋艦的餘威彷彿未滅。我們來到十二月黨人廣場，見到青銅騎士像，令我想起普希金的名句：「啊，高貴的馬，你將奔向何方？你的蹄水將往那裏飛揚？」。在要塞教堂，我們仰望着它那一二·五米高的金色尖頂；「俄國帝王權力至高無上！至高無上！」我的朋友默默地重覆着。我們還參觀了十月革命前夕軍事革命委員會野戰司令部所在地，凡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只要到了列寧格勒，都不會放過它。但與之不協調的是，當我參觀完畢，為之震動的心情未平，要求換黑市盧布的人又一次圍了過來

……我們來到涅瓦大街——列寧格勒的主要商業、文化中心，粗粗地看了一下，這裏的「百貨」便宜、粗糙、單調、貧乏，和西方的市場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我回飯店進大門時，服務員開始不讓我進，問我是不是從美國來的？我只好順水推舟點頭，這個青年人馬上露出「尊敬」的表情，「請」我進去了。晚上，在「莫斯科」大飯店舉行的晚會上，蘇聯藝術家的歌舞表演的確上乘，從那扎根於俄國民間音樂但又成功地結合了西方流行音樂技巧的作品和演出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蘇聯人民那種嚮往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期待！我真正地為他們的表演所感動了！但是，晚會的尾聲，妓女們向我們「進攻」了。她們的「主動」令人費解。我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很少見如此「大膽」之漂亮女郎，她張口就要一百美元。我問她為什麼要選擇這個職業？她說：「我如有一技之長也就不幹這個了，當然，這樣來錢容易。」回想起我們在共產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我進一步感到，無論是誰，想要逾越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逆客觀規律去搞什麼所謂的「主義」、「理想」，到頭來必然要碰得頭破血流，成為被人嘲笑的歷史垃圾。

站在涅瓦河邊極目四望，是一幢幢古俄羅斯式和巴羅克式的建築。那整齊和長長的花崗石堤岸像是給涅瓦河的深色長裙鑲上了美麗的花邊。

遠處列寧揮手的雕像和老百姓長長的隊伍遙遙相望，幾百平方米的大幅工農革命宣傳畫和「莫斯科」大飯店的妓女拉客形成了強烈對比！

列寧格勒——你給了我——一個中國留學生留下了什麼？

忠誠何價？

中國大陸留學生

(美國·舊金山)

黃瀛

天才而勇敢的劉賓雁創造了三種忠誠。淋漓盡致地刻劃出第二種，蜻蜓點水般道出第一種，霧裏常山，隱約地鈎畫出第三種。然而，忠誠何價呢？在邪門左道充斥的社會裏，忠誠往往是善有惡報的。即使第一種忠誠，君不見文革時的英雄好漢、革命小將，對共產黨對毛澤東不是無限的忠誠嗎？一旦「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文革未完，抓的被抓，下放的下放，變成失落的一代。至於第三種忠誠的高幹子弟，這些龍生龍，鳳生鳳的先天龍種，宮庭的當然接班人，劉大作家是這樣描述的：嬌嫩欲滴，嫵媚誘人。只是結出的果子常常是苦澀的，甚至有毒。其結局令人深思。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忠誠這個美德在中國社會裏行不得也哥哥呢？解答這個問題，先要剖析中共的本質。共產黨是個排他性強烈的黨，僅此一家，別無分店。或許與它的教義有關，他們自認馬列主義放之於四海而皆準，永遠正確。因此固步自封、驕橫跋扈、夜郎自大。他們把政治與宗教揉合並提高到前無古人的蒼冥之上，不食人間煙火。塵世間的凡夫俗子，誰不服服貼貼，誰就觸犯神靈，罪不可赦。同時共產黨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誰掌權誰就有權力解釋馬列主義真理是圓、是扁、是方。他們所謂唯物辯證法，是因時因地甚至因人的不同而歸納出不同的邏輯結論。共產黨的哲學如此玄虛，變幻無常。莫說第二種忠誠者無資格判別是非，即使是失勢的黨的舊領袖也不可能申辯真偽。譬如，鄧小平打倒凡是派後，說他自己才忠實執行毛澤東思想，他走的才是真

正的社會主義。華國鋒有口難言、有齒莫辯啊！胡耀邦到日本訪問，手舞足蹈一番，然後對日本人說：我們上海的建設讓你們日本包起。真是語出驚四海，任何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均不能講出如此響亮、如此夠氣魄的豪言壯語。哦！原來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靠借債、靠垂死的資本主義包起。這又是馬列高深莫測的真理。凡夫俗子能解釋嗎？不，決不可以。算你有十個博士銜的學識也不能，祇有黨的領袖才能解釋，因為他是英明偉大的啊！最近北京的大學生關心國家大事而示威，抗議日本的第二次入侵——經濟侵略。當權派馬上運用辯證法，一用就靈。結論是：學生示威是不愛國的行為。究竟誰才算愛國呢？在共產黨的專制獨裁下，愛國也被他們壟斷了。

愛國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要有實質的內容。最低限度體現於如何對待國土；如何對待人民；如何對待祖國文化。撇開這些實質的東西，談愛國又有什麼意義呢！關於國土：毛澤東在密洞時已贊成外蒙古獨立，實際上是割讓給蘇俄。西伯利亞有大片土地原屬於中國的，但中共說那是歷史問題，不便追究。小小的日本尚且有勇氣向蘇聯索還北方四島。大大的中共却沒有這個胆量，畏強欺弱。現在的當權派爲了向日本借錢，默認釣魚台群島歸日本所有。這難道叫做愛國嗎？關於人民：天生斯民應該給予最低的做人權利。但根據國際特赦協會的調查，數十年來，中共統治區的人權記錄列在最壞的名單裏。凡與中共的民政、公安部門打過交道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他們首先

把你當敵人看待，這叫做階級覺悟高。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部份，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野蠻最落伍的學說。文明社會應該提倡人類互愛，他却鼓吹人類的仇恨。無端端把人類分成各個階級，慫恿他們互相殘殺互相鬥爭。在此荒謬的理論迷惑下，中國人民已完全改變了原來勤勞善良的品性。殘酷的階級鬥爭學說污染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純潔精神。這難道叫愛國嗎？關於祖國文化：中共黨的理论體系、思想體系、政經體系，從名到姓是百分之百的舶來品。這個反對人性，只講階級性的西洋偏激哲學體系與中國優秀的禮義仁讓、尊師重道的文化道德格格不入，兩者之間存在着不能調和的矛盾。從實質上看，中共的統治與元、清一樣，是外族的統治。因爲這部統治的機器不是中國的貨色。他們在神位上掛的是幾個洋人的像，藉以嚇唬中國人，挾洋自重。元朝有所謂八娼九儒十丐，中共統治有所謂臭老九。兩個統治者都把中國的讀書人排在賤類的第九位，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加多一個臭字。蒙古人想不到的！中共想到了，你能否認不是一脈相承的嗎？怎樣對待知識份子，是檢驗暴政與否的試金石，因他們開口能言、執筆能寫、閉目能思。有頭腦的人最爲暴君所不容，恨不得將所有儒者坑之。毛澤東圍剿中國文化最出色的戰役是文化大革命（文革運動是中共中央會議通過的）。破四舊、立四新，把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掃蕩得幾乎連根拔起。豐功偉績，欲與秦始皇試比高。難道這樣摧殘中國文化的人是愛國的嗎？

忠誠是愛的一種表現形式，愛得其所，會顯示出其真正的價值。如果表錯了情，失去其意義不打緊，因此而身陷囹圄那就不值得了。善良的人們呀！你們懂得如何表達忠誠嗎？

女人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張源



黎明時分，小湖旁邊靜悄悄的，沒有鳥聲，也沒有人語。楊樹叢裏有幾條空蕩蕩的條椅，一只小小的鞦韆，失去了平衡似地發出吱吱的鐵鏈相碰的聲音。平坦的草地上佈滿了露水，覆蓋了人們遊戲的脚印。青天渾同碧海，越看越感到幽深。湖上的清秋靜境，迷人心骨。也就是在這種漾蕩的湖月林風中，戴明，一個中國女子，默默地獨坐在小湖旁邊。

她不是在等待着情人，誰能痴心等待意中人到天發白？也許約會定在晚上十點，情人十點半還沒來，自己就會耐不住跑去掛電話了。她也不是閒着無聊，對景賦詩，帶着文人的優柔風雅，欣賞落花流水，思古悠悠，發着顛狂，寫着或是極愛或是極憎的詩行。她沒有背着手，仰天長嘆，像屈原一樣憤世不平，在汨羅江畔蹣跚悲歌苦吟。她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女子，有着自己的事業和生活。結婚嗎？當然，中國女子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讓別人背後戳脊梁，噁噓笑罵。婚姻美滿嗎？男子是國內研究生，兩月一封信。

她靜靜地坐着，彷彿一座泥塑，但她的腦

子裏，數萬的細胞緊張地活動着，構成一個個方案和圖像。她在做一個攸關性命的重要選擇：跳進冰冷的湖水裏，讓湖水的波紋一圈一圈地擴展開，帶來的餘震，震響這山岳，震響人們的神經。也許她跳進去時水波一聲不響，濃濃的黑霧籠罩了一個小小的漩渦，不一會兒，湖面就會平靜下來，沒有任何人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跳湖自殺。死嗎？她冷靜地凝視着死神的無形的面孔；我死了別人呢？濤濤湖水不僅能容下我的身軀，也會把隨着身體的一切思想和經歷全部吞噬。到頭來做了個銜冤負屈的冤魂，悠悠流恨似江河。

戴明的宿舍。同屋的老馬在收拾行李，準備回國。戴明手裏拿着送給老馬分別留念的禮品，老馬感激地收下。無言片刻，老馬不無尷尬地喃喃道，「你不像……」。戴明莫名其妙，低頭看了看自己的穿着打扮：依然是國內帶來的衣褲，一點美國氣味也沒有。女人總是這樣，有話存不住。老馬手拉着戴明坐到床沿上，低聲地對她說：「有人給你們學校和部裏寫匿名信，告發妳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收買，專門

搜集中國學生的資料。還有……說妳一到美國，就同美國男子胡搞鬼混。」戴明的頭暈了一下，半響沒有說出一句話。人在極度震驚時往往任何感情的發洩都沒有，一切都在凝結、旋轉，十二萬分地旋轉。才一刻鐘，這世界怎麼變了模樣？

做為一個中國人，她當然明白這匿名信的份量，以政治上和作風上攻擊一個人，最能擊中要害。她清楚地想像着人們、自己的家人、學校領導和部裏負責人員對這封信的重視。女子苦，無風還起三層浪，更何況這次不但有風，還有刮起的石子呢！她可以完全不理睬這種陷害，謠言所以特多的原因，在於人們閒情不做正經事情的緣故。這離奇不可思議的謠言。是的，她不用去理會這種潑皮伎倆，任憑冷箭從身後枝枝射來，只要射不倒，她就仍然活着，過自己的日子。但能不理會嗎？能不理會嗎？在流言蜚語能壓死人的國度裏，要想做個女人多困難哪。

她坐下，企圖整理亂紛紛的思緒，從這團扭纏在一起的亂麻中找出條主線來。感情用事

，在我們這個年紀已經不適用了，不能說我們沒有感情，但感情經過成長，二十歲的激情戀愛，熱血奮鬥，到而立之年已經成熟了。平日沒有眼淚，真動起感情來眼裏也沒有淚，不是哭乾了，而是眼淚已經化成血，要流，只是流血。我們這一代人遭見的事情還少嗎？戴明疲乏地苦笑了一聲。什麼人如此不分強弱，不識親疏，不辨賢愚？

遠遠地，山坡上的尖頂樓上的銅鐘敲響了，「噹、噹、噹……」整六下。這鐘聲，隱隱約約，似聞不聞。這大銅鐘，它倒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痛苦和眼淚，只是機械地移動着時針的大臂，人生的悲喜，隨着這鐘聲逝去復來。它馱負人間的酸辛，開闢大路。太陽會升起來，黑暗也會留在後面，誰甘心沉沉地睡下去，隨着黑夜消逝？

鐘聲加促了湖邊女子下定決心的速度，却又使另一個女子在睡夢中翻了一個身。那一團沉重的黃，恍惚着的腥紅色的錯覺，四處輻射的光却不出于聚點光源，霧氣、霧色、霧，灰黃色，像大麻葉抽過後產生的幻境那樣，她張着手，向着發出光源的地方奔跑着，怎麼拾不起腳來？什麼東西這樣膩濕濕地貼在身上，剝不掉、甩不開，濛濛的霧，壓得死人……，散光漸漸聚成一點，然後突然擴張開來，光芒射得她身往後仰。又是舊日的夢，擺脫不了的糾纏。

她醒了。一張雙人沙發床，那半邊是空着的。月光從窗簾縫中洩進來，照在床頭櫃上的小鬧鐘上，指針六點正。一間不大的寢室，東西零亂地擺着，牆櫃的門半開着，裏面的髒衣服躺在地下，乾淨衣服掛在鐵竿上。那個說不清楚但總是纏着她的夢，做了不知多少回。她心煩地坐起來，隨手披上一件長絨睡衣，赤着

的腳踏在軟綿綿的地毯上，靜悄悄地。她從冰箱裏取出牛奶，倒了滿滿一杯，一氣喝盡。往床前走的時候，室內的一面大鏡子裏射出另一個影子。寂寞的她站起來，雙眼盯住鏡中人。烏髮蓬鬆，睡眼矇矓，卸了粧後的臉蛋發青灰色。噢，鏡中人手裏也忠實地擺了一下頭，做出微笑的樣子，鏡中人也忠實地笑起來。

幾年的飄泊在小茜身上沒留下一點痕迹，却只教聰明了她。這世界上並沒有她在少女時代似夢幻的愛情。鐵一般的現實有其固有的殘忍。對自由的羨慕，對情愛的憧憬，到頭來仍然掙不脫生活的囚籠。她回憶着，蹙起眉頭。約翰到現在還沒回來。同他的結合純粹出于偶然，也許是必然？靠着叔叔一臂之力，從國內把她辦了出來，起初在紐約市打工，但總不是個終身飯碗。一張報紙上的廣告招來了對東方女郎神秘力所着迷的約翰。他們一同搬到他讀書的大學城。他每天上課做學問，早出遲歸。剛開始的時候，貪戀新婚歡娛，有求必應，體貼倍至。唯獨他酒醉後，失去常態，棍棒相交，打得她遍體鱗傷。還不許她啼哭哀求。她越出聲，他越下死勁打。多少次，她被迫離家出走，深夜裏一個人哭泣着，漫無目的地奔跑在大街上。空曠曠的街道，只聽得她一個人的嘹喨腳步聲。今天晚上他沒回來，她臨睡前有意讓走道上的燈開着，怕他回來嫌屋子黑。唉，一種無名的傷感，直從丹田湧起，衝到了心頭。

這世界就是如此地瘋狂，把人們連根掀起，然後又把他們像炒豆似地緊緊捏在一塊。女媧補天時，覺得這世界上少了什麼東西，于是用泥土塑出自己的形象，男人女人，頓時滿山遍野的春歌。女媧一生氣，用腳踏死了許多，殘餘活着的人四分五裂。實在太多的人了，世

界的每個角落裏都留下了他們的脚印。貌似無緣無份的人們有時也會相互發生興趣，相愛或相憎，以死相拼，以命搏得對方的歡心。吟：「兩世一身，形單影隻」的詩人已經作古幾百年了。有時，毫不相干的事情聯在一起，成了來龍去脈，有時，素不相識的人們之間會發生磨擦，進而生電。

湖邊的女子在痛苦着，鏡前的女子也在傷心着，這是同一時間裏所發生的事。在無特定的環境裏，命運的手兒捉弄着人，遭遇却是如此相同。女人的苦惱，往往與男人有關。就在同一個男人身上，兩個女人的思路停了下來：約翰，美國人。

錢兒一理清，整個輪廓頓時就明晰了起來。約翰曾在戴明所在的大學裏教過書。戴明來美國後，他曾看望過她幾次，公事來往，朋友之間有何避嫌。小茜暗暗躊躇，懷疑他們倆個人之間有什麼瓜葛。於是靈機一動，寫了幾封匿名信，誣告戴明，寄給戴明的家庭、工作單位和部裏。純粹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戴明掌握了小茜寫匿名信的草稿，證據在手，戴明正式向美國法院提出對小茜的控告。法院以誣陷罪判小茜在拘留所裏住了兩週。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德的報德，有冤的報冤。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閉起眼念一聲阿彌陀佛！

不，還是不要睜開眼睛看人生才好，不然的話，戴明的淌血，小茜的灑淚，今後的路如何走，人們的蜚語如何應付，心靈的創傷如何彌補？這一切與正義的伸張是有距離的，不是時間和空間可以增補的。誰又會估量過人們對時間所付出的代價？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與時間相比是渺小的，但也是證明人類生存的一部份。

生死存亡的年代

我和我的老同學（之二）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趙繼康

黃昏時分，我走進了襄陽公園附近的一所極其古老的公寓三樓套間。給我開門的是我大學裏同班不同系的另一老同學寧緣。十多年來，她一直在上海一所中學裏教生物學的課。這個時間，她下班回來，剛吃罷晚飯，對我在文革中不約而來的突然造訪，似乎有一點驚訝和不安。

我因為她過去常來我家做客，帶了兒子來吃住在我家，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不管她反應如何，立即滔滔不絕坦率相告，我是從×省五七幹校裏逃出來的。我受不了那種強制的集中營式的批鬥勞動，每晚打人吊人的慘叫哀嚎，更是使我夜夜失眠難以忍耐。如今，運動到了高潮，血腥味也越來越濃。我的父親是在上海被打死的，我的大姐夫又在四川被釘死了，俗話常說，一二必有三，家裏死了兩口人，我不願做第三個釘十字架的受難者，所以隻身逃亡

來了上海。

寧緣剛聽我說了一個頭，就忙把站立在桌邊，睜大了眼睛聽得很起勁的孩子小新，安排到裏屋睡覺。她拉開了裏屋的房門，我才發現，屋裏的大床上，還坐着一個人，是男是女，看不分明。因為他戴着放下了耳罩的風帽，手裏正在縫着一件小棉襖。看見了我，那人也不出來招呼，而且索性把身子背過去了。寧緣老同學匆匆忙忙地給孩子脫衣服、鋪被褥，一句話也不說，使我深感說話太冒失，也沒問問她家有無來客，這要是居民委員會什麼家務組的來人，來幫人打打雜，順便監視你，隨時可以打小報告，那就麻煩了。

寧緣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把孩子安排睡下後，走出來時，重新掩上了裏屋的門，向我解釋說：「小新他爸爸從河南回來度探親假，你說下去吧！不要緊！」

我遲疑着要不要說，我來上海已找過高班同學胡茜，在她家住過兩天的事。寧緣看我有點支支吾吾，馬上又坐下來，戴上她那副玳瑁邊玻璃磚眼鏡，凝視着我，向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除了詳細盤詰我逃亡來上海的來龍去脈，還問了許多我被批鬥遊街，掛的什麼黑牌，寫的什麼罪狀，和我這三年來在文革中的表現，幾乎連每年每月做什麼的每一個細節，全都不放過。

等我把所有的問題都回答完畢，彷彿經歷了一場中學生口試一樣，寧緣這個主考官，才站起身來給我倒了杯水，遺憾地說：「趙娃，你不應該對我這樣老實，把什麼都告訴我。：以我們兩家的交情，你父親和我父親是老同學，你和我又是老同學，你如今在上海沒有家了，要說你是來上海，探望寄養在姐姐家的兒子，我至少可以留你住一個月，而不是你要求

的只借住三五天。可是，……」

「我沒想到你愛人也在家，也許房子擠，不方便？……」我囁囁地說着，仍然懷着期待。

「不是這個問題，」寧緣指了指陽台說：「我剛把陽台砌了牆，改成了一個小房間，如今也算有兩房一廳，並沒有不方便的事。只是你想想，你是從五七幹校逃出來的，還說很可能已受通緝，我要是留你住在這裏，那豈不是收留一個正在受通緝的逃犯了嗎？」

裏間的屋子，寧緣的丈夫，突然大聲咳嗽起來，咳得好像一個害了肺癆病的老頭子一樣。寧緣連忙拿起桌上放着的一瓶杏仁蜜，又倒了一杯水，打開裏屋的門，送進去給她的丈夫喝。她的丈夫放下手中的小棉襖，一面接過藥水喝着，一面也站起身走出來向我告罪，說是他太專心給孩子翻絲棉襖了，沒留神家裏來了世交老朋友。

我們在十二年前見過一面，那時他和寧緣剛結婚不久，還特地雙雙來我家拜見了我的父母親。他說寧緣視我母親為乾娘，他該算乾女婿。那時候，我正好也出差在家，一起吃飯，還趕去買了酒乾過杯。但很快就是反右運動，我從寧緣的口中，得知她丈夫在河北被打成了右派，本來是技術員，下放到水利工程隊，當了泥水工，想調上海也調不成了，一年只能來探一個月的親。從前是個運動員體格的精幹小伙子，但十二年不見，他佝僂着脊背，臉色晒得黝黑，走路還有點癩，真是完全變了樣子。

我也記不起寧緣的丈夫，是叫什麼名字，含糊地應付了兩句，起身說：「寧緣，你要是不敢收留我住，那我就告辭了。我不習慣向人撒謊，所以，你問我什麼，我就說什麼。對不起，打攪了你們，我走了！」

寧緣和她丈夫交換了一個眼光，又攔住我說：「你到那裏去？姐姐家可以住麼？」

我笑了笑：「作家協會檔案有我姐姐的地址，他們要是想抓我，頭一個就找到我姐姐家來。只有老同學不姓趙，他們也弄不到地址，要不，我也不會來這裏了！」

寧緣看着我揹起背包，已經走到了門邊，才又說：「慢點！趙娃，我也許可以留你住一夜。因為我剛才也已想過了：「你還沒有成爲



正式的犯人，幹校批鬥你，是批鬥你的作品，那大不了是打你一個右派，判不了刑；「你說你可能已受通緝，那只是你自己想的，我也沒有看到通緝你的通緝令，我們可以把剛才那些話都忘掉，你出去十分鐘，再重新敲門進來，就說你是請了病假，來上海治病的；來找我是爲了求我替你找幾個生物系同過學的好醫生。因爲天色太晚，你回姐姐家不方便，我留你住一個晚上，但決不再多一天。你出去吧！過十

分鐘再來，記住！要敲門，讓左右鄰居都聽見。然後放大嗓子說治病的事，態度要平靜，表情要自然，否則，……」她不說下去了，顯然，這留宿一晚，已是她作爲世交老同學，溫情主義的最大限度，否則，連這一晚上也不會肯留我。

我被她這一席主考官帶推理性的說我是犯人的話，弄得心裏很不是滋味。可是，偌大的上海城，我的確找不到第二個可以借宿的地方。天色也的確已很晚了，總不能流浪街頭過夜。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學生的老同學，竟會懂得戲劇導演的手法，大有演出活報劇的天才。我在她面前，完全像個劇團的見習生，除了照她設計的小品，敲門、大聲說話，故意讓左右鄰居聽見，演一齣雙簧，看來也別無他法了。

我猶豫不定地被她推出了房門，下樓到街角的襄陽公園裏，躑躅了一圈又一圈。公園裏靜悄悄的，遊人都已走空了。法國梧桐排列成行的人行道上，映着街燈昏黃黯淡的燈光。偶而，在角落的長椅上，可以看見一兩對喁喁情語的男女，大約是唯一不受運動牽連的老工人的後代。梧桐樹的落葉，在脚下碎裂，被我踢成了碎片。我真羨慕這些仍然擁有個人小天地的青年人，心頭又是悲哀又是辛酸的沮喪。

十分鐘一過，我重新回到寧緣的公寓大樓，一切照辦。她打開門，裝出一付驚喜的初見面的神氣，隔着門檻和我大聲寒暄，恰像電影攝影場開始拍攝了一樣。演出台詞應對流利，互相配合也很不錯，老同學重新把我讓進了門，表示可以通過。我掃了她的陽台一眼，只見新砌好的圍牆邊，已經搭好了一張竹榻，鋪好了被褥。裏面套間，她的兒子小新大約已經熟睡，房門半開着，寧緣的丈夫，依然坐在大床

上，就着床頭的燈光，心神專注地縫補着小棉襖。脚下有一堆舊襪子，可能是已經縫補過了的。男人做女工針線活，這倒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但我想起寧緣過去常說的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那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他只顧着嘴巴說個痛快，打了右派，害我在學校裏做人也抬不起頭來。托人求情想調他回上海，燒了多少香，全都白費了功夫。年輕輕的夫妻分居兩地，我又做孩子的娘，又做孩子的爹，他真是太對不起我了！」那麼，年年探親假，來回路程全算上不過二十多天，靜坐縫補妻兒的破爛，每一針每一線，也許都是悔痛情深的無言求告，滿腹的甜酸苦辣，也盡在其中，足見痛苦之深沉。

我問起她丈夫在河北的近況，寧緣告訴我，文革中，有了新批鬥對象，老右派倒是禍中得福，靠邊站後，誰也不來管了，拳打腳踢的刑罰，也全都免了。這倒是應了莊子的話：「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說不定，以後，等運動結束了，還可以想法子調來上海呢！把丈夫調來上海團圓，這也是她這一生中，最大的心願和嚮往了。

當她在說「福兮，禍之所伏」時，近視眼鏡後面，那對貓一樣銳利的眼睛，大有深意地瞟了我一眼。我記起幾年前，她向我說過的另一段話：「你有太多的時間，太多的錢，太大的房子，太多的幸福！」，我曾經和她辯論過，不承認自己有何幸福。因為，他們夫妻雖分居兩地，但愛情格外深摯。我却所遇非人，只有一個父母所在的家庭；分配的房子雖大，也無非是為在美國的哥哥，設一個棚窗，向海外寄照片的時候，可以為社會主義吹吹大牛。錢也只是稿費，社會主義制度下，唯一的個體勞動所得，精神產品不能搞車間生產，時間上，

專業作者才有了不上下班的自由。而現在一切飛崩瓦解，房子被收回去了，傢俱一拍賣，一切化為烏有。父親慘死，我也失去了歌功頌德的熱情，以後可能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僅有的儲蓄也被抄了家，眼下口袋裏只有姐姐給的一百塊錢，今夜她不留我宿，流浪街頭的命運，就擺在面前。這禍福的譏語，倒真是對我最大的嘲諷。寧緣是學生物學的，在她的眼中，人和兔子一樣，命運也可以解剖。她從前對我的羨慕和嫉妬，如今恰好轉換為潛意識中的得意和滿足。我不禁深深嘆息了！一家有一本難唸的經，眼前我親生的兒子，寄養在姐姐家，近在咫尺，無法一見。孩子的棉襖，還是三年前買的，如今肯定又短又小，破了又有誰來補呢？

寧緣正在衛生間洗腳，聽見我呆坐在竹榻上嘆氣，穿上拖鞋走出來向我說：「趙娃，你不要怪我不肯留你多住。達爾文說過，生存競爭，必須適應環境，適者才能生存。運動教訓了我們，人人必須懂得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可以是進攻性的，也可以是保守性的，而你，連這一點起碼的常識都不具備，竟還在說不習慣於撒謊。撒謊也是要視情況而定的，太老實了，正說明你在這個社會環境裏，一點也沒有生物進化。我看你屬於將被淘汰的一類，正像你自已說的，一二不過三，你今天還活着坐在这裏，已經是上帝的恩典了！」

我知道，寧緣作為中學教師，一向有嚴厲教訓學生的習慣，在我當前的處境下，也大可不必和她認真。而且，她說的生物學的一課，對我還真有點新鮮。所以，我安靜地聆聽着，並且進一步請教她：「什麼是進攻性的保護自己？我倒有些弄不明白，你說給我聽聽！」寧緣坐到我床前的一張藤椅上，推了推她

那付玳瑁邊的玻璃磚眼鏡，開始向我講課說：「文化大革命中，最關鍵的就是生殺予奪的權，誰能掌握權呢？這不像過去，要革命的老資格，而是只要會鬥人會打人的，就可以拿到權。所以，生性就是猛禽猛獸的這一類，鬥人可以肥己，損人可以利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作虎皮，登高一呼，四方響應，這戰鬥隊



權就到了手。那怕是黑七類，也可因參加了無產階級司令部而既往不究。可你為甚麼不去這樣做呢？你小時候不是還得過演講比賽第一名嗎？你難道不會講話？不會寫文章？」我囁囁着說：「我一張大字報都沒有寫過，從前反右派反右傾，我也從沒發過言，人總不能作違心之論啊！」

寧緣望了裏屋的丈夫一眼，彷彿我說的是討好他們夫妻的謊言一樣，擺了擺手說：「這你也不必在我面前作解釋，我了解你。你不屬於猛獸猛禽類，天生的沒有進攻性利牙利爪，長不出恐怖的五彩斑爛毛皮。不過，你爲什麼不能適應環境，給自己披上一層生物保護色呢？」

我好像一個最笨的小學生，訥訥地向老師



提問：「什麼是生物保護色呢？」

寧緣明快地回答我說：「生物保護色，就是善於隱藏自己，保護和環境協調一致，這是宇宙之間，萬物競生存的最簡單原理，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舉個例來說吧。你看那螞蚱和蝴蝶，是天地間最軟弱無用的一類動物。牠們既沒有牙齒，又沒有爪子，頭上沒有角，腳下沒有蹄

子，比不上蜜蜂還有一把針可以刺人，螳螂還有兩腿大刀。可是，螞蚱與蝴蝶，照樣能在地球上大量繁殖。原因就在於春天的草地，是綠色的。螞蚱經過了千百萬年的天演進化，牠生出來了一張嫩綠色的外殼，在草地上跳躍的時候，幾乎與青草、森林一個顏色，其它喜歡吃螞蚱的動物如鳥兒，就不容易看清牠，也就沒法去啄食牠。所以，螞蚱得救了！在生存競爭中適應了，不會受到淘汰和消滅。再如蝴蝶，牠不像螞蚱，是生活在草叢中，牠必須採花釀蜜。於是乎，牠在千百萬年的天演變化中，長出了五顏六色的翅膀，乍看過去就像一朵花兒一樣。其它的動物，很難把牠和花朵分辨開來。所以，蝴蝶也就得救了！牠們不大會受到傷害，自己用彩色把自己躲藏得很好。這就是典型的生物保護色的作用，你懂了沒有？」

我笑着說：「這是我們三十年前在一起聽的自然科學課，我當然懂，只是，這和文化大革命怎麼相聯繫呢？」

寧緣的臉上，略略露出了不大耐煩的神氣。她對我這個老同學的智力，不能理解點到爲止的暗示，似乎很煩惱。她沉吟了一會兒，又走到門邊，打開門朝外面看了看，轉回身向我說：「你真是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中學生！這個道理非常清楚。譬如說，革命的保護色是紅的，你就該選擇紅顏色作你的保護色。在政治上，人人都披了一張紅皮，背誦語錄，高呼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就是語言的紅皮。歷次運動都是反右，反右非常兇狠，反左蒼白無力，人現在都寧左勿右，寧左勿右，也是生物保護色的紅皮。門別人的時候，你那怕其實沒有什麼話可說，也應該作出一個姿態，表示你嫉右如仇。發言不怕重複，說了和大家一致的話，也就是長了和周圍顏色一致的外殼，是門別人

，也是在保護自己。鬥過了別人，你自己也就有了平安。這是歷次運動中反覆存在的客觀真理。就像二加二等於四，A等於B，B等於C，所以，A就等於C一樣清楚明白。我真弄不懂你這個作家是怎麼當的，觀察人物，連這個生物政治保護色都看不出來！你剛才說，你在運動中不寫大字報，會議不發言，不肯作違心之論。我想，你今天落到這樣的處境，正是因爲有這樣的前提，才引導出這樣的結果。弱肉強食，同樣也適用於社會主義制度，你不說話，不寫，說明你退縮，你不敢鬥爭，這就明擺着誰如鬥了你，不會遭到報復。你是個軟弱無能的可憐蟲！你不是槍，而只是靶子，誰也不怕你，誰也用不着防你。於是，你成了衆矢之的。這就是你不懂得用進攻來保護自己的大大失策！你錯了！在這個搞階級鬥爭的社會裏，你不鬥人，當然就被人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嘛！踩着你的肩膀，人家才爬得上去嘛！你怎麼這樣糊塗塗呢？」

我折服了，寧緣從階級鬥爭的現實生活裏，的確從大千現象中，總結出來了一些客觀事物的規律。我在幹校被批鬥後，也曾想到過，那些鬥我的人，有的提升了級別加了薪，有的至少也作到了寧緣說的生物現象，打了我，鬥了我，把自己藏起來了，表現很不錯。寧緣的這一堂生物課，真是「唾咳落九天，隨風生珠玉」，使我混沌初開，豁然貫通。對運動中經常發生的「劃清界綫」，也開始有所理解了，認識較前深刻了！

「你在運動中，也經常鬥人打人嗎？」我好奇地問起寧緣來了。

寧緣回答我說：「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不過，每逢運動，我總是爭取當會議紀錄。記錄員有三大好處：一自己不必發言，免得言多

必失，風往那邊吹，弄不清楚，會留下把柄；
二、記錄員可以置身事外，就彷彿在看戲一樣，
從高處俯瞰大會，解剖的玩味無窮；三、記錄員
也有權，筆下可以超生，對親朋好友，積點功
德。」

「可是，那都是黨員，或是掌權的主席親
信，才有資格當記錄員的呀！」我難以置信地
說。

寧緣又望了她裏屋的丈夫一眼：「反右初
期，我就是記錄員，但他打了右派以後，反右
傾機會主義，和四清運動，學校裏都不叫我當
記錄了。但這次文革，記錄員也不要求必須是
共產黨員了。我的字，寫得又快又工整，校革
委會也就信任了我，要我每逢開會當記錄，就
憑這個工作，我在學校裏，還真有點小威信
呢！」

言語之間，她多少有點自鳴得意，而她的
丈夫，在裏屋傾聽着，頭似乎低得更深，腰也
彎得更低了。

寧緣上課上得高興，又接下去說：「這十
多二十年，我發現，最進化的生物，就是牆頭
草，隨風倒。你說躍進要跨大步，趙英趕美，
畝產萬斤糧，我就說一萬斤太少，至少應該畝
產一萬二，這才是爭上游的特大躍進；你說大
躍進是浮誇，虛報產量餓死了人，我就說幹部
邀功請賞，草菅人命，餓殍千里，民不聊生，
實質是國民黨在反攻大陸，應該清查內部反革
命；你說反對三面紅旗是反對毛澤東，摧毀無
產階級司令部，我就說，拿十個指頭中的一個
小指頭錯誤，大叫大嚷，是黑綫反動氣焰，妄
圖顛覆紅色政權，實行白色恐怖……總之，要
積極發言，熟讀報紙社論，緊跟「紅旗」隨大
流，左右都能逢源！你的缺點，就是太不變以
應萬變，活到三十好幾了，還混身的學生味，

對人對鬼都相信。家裏死了兩口人，還在講做
人應該誠實。趙娃，你落伍了！你在這場生死
存亡的鬥爭中，由於嘴鈍心不狠，已經註定了
要成爲被淘汰的失敗者。你將被比你聰明的人
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早在
你的爸爸被打死，你通知我去殯儀館向遺體告
別的時候，我就明白你已經完蛋了。你和你的
兒子的成份，從此已經蓋棺論定，你們是現行
革命的後代，階級異己份子！我留你住這一



夜，也算是三年自然災害中，我帶了孩子去你
家時，你的父母曾多次招待我吃過好飯食的報
答。我不喜歡欠下人情賬。但今後的世道，可
以看得很清楚，只有你求我的，沒有我求你的
。我們本來就隔行如隔山，風馬牛不相干，運
動中已經有人在指出：同學、同鄉，這是舊社
會的封建關係，看來我們的緣份也就到此爲止
。你快睡吧！我明天還有課，今晚我的話，說
得太多了！」

說到這裏，她毅然決然地摘下她那副深度
近視眼鏡，站起身，快步走出我的陽台房間，
進裏屋熄燈睡覺了！」

我對寧緣的實用主義性格，過去一向也很
了解。只是，她把話說得這樣赤裸裸的義斷情
絕，我覺得也未免太刻薄過了份。她是一個很
好的中學教師，工作認真，辦事負責，一向有
着社會主義積極份子和先進工作者的稱號。不
過，她的心腸也未免太冷太嚴酷。倒不在她眼
前是否肯收留我避難，是否與我斷交這一具體
事實的感受上，而是我深深感覺，如果用她的
這種生物學眼光來看待人生，人生哪還有愛？
哪還有真？更不要提善和美了。我弄不明白，
我和她的差別，是否就是所從事的專業的差別
。科學和文學，也許是兩門太不相近的學科，
正如她所說的，隔行如隔山。我幾乎要認爲：
如果我全盤接受她的理論，手拿着一把解剖刀
子，去對待所有的三親六戚、親朋好友，包括
愛人丈夫，我就會和文學藝術永遠地告別，人
生也就太苦、太澀、太沒有可塑的吸引力了。
然而，你不能不承認，她具有非凡的鑒察力，
她所談的，所引的，不也包含有幾分真理麼
？……

午夜，狂風搖撼着陽台新安裝的簡陋窗扉
，閃電劃破了烏雲密佈的夜空。雷聲隆隆，驚
天關地。粗紗布做的窗簾，在窗縫隙漏進的冷
風中，不停地飄拂飛舞。已是延續幾日的連
陰天，終於下開了猛烈的暴風雨。傾盆的雨水
，從天上連續地倒了下來，彷彿是天河決了堤
一般。我在寧緣家那張噁味作響的古老竹榻上
，輾轉反側，無法入眠。風聲、雨聲、家事、
國事、個人事，無一不使人像貓抓心一樣煩惱
難過。等到風雨稍住，我也因煩已極朦朧瞋
合眼睡去不久，門上却又突然響起了劇烈的捶

擊聲。有人在高聲喊叫寧緣的名字，而且沒有客氣地加上通常慣用的同志稱呼。我驚起披衣，不知是否是五七幹校派人來抓我，還是上海市當時的一個叫做「文攻武衛」的糾察組織，又在連夜突擊挨家挨戶地查戶口。

寧緣穿好了衣服，起床開了門。三個手執五節電池手電筒、全副武裝的民警，立即衝了進來，開口就問：「你的丈夫×××是不是在這裏？」



寧緣開亮了客廳裏的吊燈，鎮定地回答說：「他回家探親，我已經報過臨時戶口了！」

一個高個子民警，冷笑了一聲說：「探親？！是他這樣向你說的嗎？」

寧緣詫異地回答：「是呀！他年年都回上海探親的，我們夫妻一向是牛郎織女！」

一個矮個子民警，不聲不響地遞給了寧緣一張印了字的紙。

寧緣老同學很忙亂了一陣，因為她找不到

她那副玻璃磚眼鏡了。後來，總算從桌上，她兒子小新的一堆小學一年級課本和作業簿中，摸索出來了另一副眼鏡，就着燈光看了一下那張紙，她忽然大叫了起來：「什麼？他是監獄裏逃出來的逃犯？！他早就關了牢監？這不對！他不屬上海市管，你們一定弄錯了！你們沒有權利在這裏逮捕他！」

三個民警向門外一招手，門外站立的兩個綠制服軍人，立刻走了進來，民警向寧緣介紹說：「這是河北省軍管會派來的軍代表，你丈夫越獄潛逃，我們已經盯住他好幾天了。只為河北省軍管會今晚來人，所以我們來配合逮捕。現在，你快把他交出來，讓我們帶走！」

寧緣老同學失去了她素有的強者風度，跌坐在椅子上輕聲哭泣起來了。

她的丈夫，已經穿好衣服，口袋裏塞着毛巾和茶杯，從裏屋拉開房門，低着頭走了出來，順從地伸出雙手，讓民警銬上，回過頭來向妻子說了兩句話：「小傢伙那件棉背心已經不能穿了，補也沒法補，拿我留下的夾克衫給他改改吧！」

他顯得出奇地安靜，再沒有多說一句話，就這樣跟上民警和軍管會來人走了。

寧緣可憐地哭泣着，人彷彿已癱倒在椅子上。我驚悸之餘，披衣坐在竹榻上，也半天說不出話來。裏屋的大床上，小新忽然哭喊了起來：「爸爸……爸爸！」

寧緣凝然不動，好像根本沒有聽見。我趕緊起床，進屋問她的小兒子：「小新，別哭！別哭！你爸爸不在，你要什麼？」

「尿……：我要尿尿！」

我抱起這個剛上小學的男孩，幫助他找到了痰盂，把他一泡尿，又把他小心地放回床上。轉身從熱水瓶裏給寧緣倒了一杯水說：

「老同學！你不要太急太難過！這年頭關在監獄裏，是禍也是福。因為，監獄最多判勞改，不會交給群眾亂打亂揍，怕的是無法無天的批鬥大會，打死了人，一閃而散，根本沒有人管。監獄到底有多少年行之有效的法規，就是搞逼供，也不會往死裏打！所以人都說關牢監，在如今又叫監護。」

「可是，他騙了我！騙了我呀！還說單位裡顧不上門他這個老右派，靠邊站了，將來還有可能調回上海。他這是在對我撒謊，完全是個騙子！」她氣憤地一拳打在桌子上，把我剛剛端給她的那杯熱水，也震動倒翻了。

我見那茶杯已經滾動到了桌子邊緣，連忙搶上一步把杯子接住。又找了塊抹布，擦乾淨了桌上的水跡。想着老同學身處其境又推翻了自己的論點，要求作人必須誠實無欺，我忍不住從旁勸了她一句：「你自己不是說過，撒謊也要看情況而定嗎？他如果告訴你，他是越獄潛逃，對你又有什麼好處？孩子的棉襖，既不會補好，你家裏恐怕也早亂了套了！你救得了他麼？還是劃清界限，趕他出去呢？」

寧緣縮着身子，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她兩手扶住桌子，從椅子上艱難地站了起來，好像一個正患着風濕痛的老太婆一樣，巍巍顛顛地向我擺着手說：「睡吧！睡吧！既來之，則安之！你大約也虛驚了一場，想不到是這個情況。我明天還有課，不躺一躺，明天一定會站也站不住！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來了。收拾好被褥，豎起了竹榻，我又去廚房間找着了米，熬了一鍋粥。看見老同學寧緣關着房門，靜悄悄一點聲息也沒有，以為她哭夠了睡熟了。收拾好自己的毛巾、牙刷、牙膏，我掏出筆，很想給她留個字條不告而別。但孩子小新又在那裏哭

叫：「爸爸，爸爸呢？我要爸爸！」

我輕輕推開裏屋的門，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正想示意孩子不要吵醒了媽媽，却出其不意發現寧緣早就起來了。她開着床頭燈，半跪半坐在燈前，也許根本沒有睡。

我吃驚地問：「寧緣，你一夜沒休息麼？今天怎麼去上課呢？」

寧緣拿起床上一個小筆記本和一大疊散亂的信紙，答非所問地遞給我說：「你看！這是小新他爸的獄中日記，這是他早就寫好了留給我的信！難怪他回家一個多禮拜，只顧拼命做家務事，也不肯上街……」

我翻開筆記本，隨便翻了兩頁，上面寫着：「……我之所以入獄，不是我有什麼具體的罪行，而是因為我不肯去用逢迎諂媚的話，去討好革委會，我不願用污辱我自己品格的方式，來向他們求饒……」

「……怪不得老的歌曲常唱，太陽出來又落山，監獄永遠是黑暗！他們每天要我們所有的犯人，端坐在板床上，兩手必須放置在膝頭，一坐四五個小時，也不給我們放風，怕我們串連……誰如果不肯安份端坐，就要拉出去懲罰，下跪挨打……我要求勞動，渴望着勞動，只要有勞動的機會，雖是做苦工，但只要手脚稍活動，這雙腿，這脊背，就決不會這樣鈍痛難熬……」

「……今天是最後一天日記了，因為，帶進來的圓珠筆，已經寫光了，再也寫不出字來了。日記他們最終也會沒收的，眼前不過是有意要看看我們寫些什麼，試探我是否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寧緣，我想念你，也想念我們的兒子，他現已是學齡兒童，暑假一過，就上小學了吧？我真想看看你們，真想去上海再探一次親。那怕爲了這個，要我付出死的代價，我

也心甘情願。我羨慕窗外飛過的鳥兒，但窗戶釘了木板，我只能從木板的縫隙裏看到天空，我能脫逃嗎？逃走了，再被抓回來，那是毫無疑義的，但只要能再看見你們啊……」

那後面的幾行字，圓珠筆的墨跡很淡，而且，越寫越看不分明，最後幾個字，只是幾個刻印，日記也真的已到了盡頭。我躊躇地拿起了另外那幾張散亂的信紙，心裏有點不安。人家夫妻之間的私信，我怎麼可以接過來隨便閱



覽呢？

老同學寧緣此刻正在爲兒子穿着衫褲鞋襪，我丟開信紙向她說：「我來幫你照顧孩子，吃早飯後，送他去上學。你也該擦把臉歇一會兒，今天是幾點的課呢？」

寧緣的臉上，又恢復了日常的強者所素有的嚴峻表情，她眼光冷淡，嘴角緊閉，線條分明，扭頭向我說：「你不用管孩子的事，你也知道他是在那個學校上學。看那封信吧！看

了給我出出主意，我是否該和他離婚，我心裏亂得很！……」

離婚？我怔住了。這沉重的打擊，她的丈夫怎麼能受得了呢？這不是抽掉溺水的人，手裏唯一的一塊木板麼？

他們不是同一類性格的人，這是顯而易見的。她的丈夫性格很內向，話說得少，而想得多，也許這是反右以後的後遺症。可是，怎麼可以在這樣最需要親人安慰的時候、最需要同情和溫暖的時刻，不共患難而離婚呢？

學生物學的人，常常搞人體解剖、動物解剖，鮮血淋漓的解剖刀，也許把人的心腸也弄硬了！我這時不由得不對老同學這個專業，有點敬鬼神而遠之的毛骨悚然感覺。可是，文革中，也有不少並非學生物學的男女，在丈夫或妻子被打倒時，立即劃清界限，一刀兩斷辦離婚的，有的還互相揭發告密，把枕席間「七月七日長生殿」的各種政治牢騷，作爲隱私和寫成大字報，以證明對方反動，而自己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這又怎能以生物學專業的「不是來解釋呢？」

我拿起寧緣的丈夫寫給她的信，匆匆又看了一兩頁：「……寧緣，我祈禱你學會笑，發自衷心的大笑或微笑！每次看見你那張嚴肅帶責備的臉，我就覺得我恨不能跪倒在你面前。你笑一笑吧！寧緣，讓一切善良的生物，都笑起來吧！淚和笑雖然只隔着一張紙，但倘若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殘酷的世界，我們的心，就會變成了石頭和鋼鐵。笑，是唯一能使人心柔軟的催化劑，也只有發自衷心大笑和微笑，才能向我證明，我確實已經得到了你的寬恕，給我溫暖，使我能有勇氣重新生活下去……」

「不要以爲我欺騙了你，欺騙總是爲了達到一個目的，而我的目的只在看一看你的笑臉

，那對我來說，就是天堂的歡樂了！……」
一大灘淚水，把歡樂的樂字，融化開了，
以下的字跡，幾乎難以分辨。這是誰的淚呢？
寧緣她丈夫的，還是寧緣自己的？

我摸了摸信紙，紙是濡濕的。這使我突然
感覺，在寧緣戲劇性的苛刻與嚴酷面具後面，
她的心，也並非石頭與鋼鐵，只是要強與好勝
的執拗性格，迫使她不願在人面前透露出些微
的軟弱與怯懦懊喪。既然她已經說了，要我給
她出主意，她內心的矛盾一定十分劇烈，而
天平的法碼，又在我的一席話，我又怎能拆散
這一對受難的其實相愛至深的鴛鴦呢？

我乘她的孩子小新，坐到桌子跟前喝粥，
她自己刷牙洗臉完畢，也正在收拾包準備出
門的前一刻，抓住她，把她拖到廚房裏，關上
廚房門，大聲地向她說：

「老同學，你決不能落井下石，在這個時
候，和你的丈夫辦離婚！那是在他的心上捅刀
子呀！他既然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罪，沒有殺人
放火，沒有背叛妻子，他們抓他不過仍在爲五
八年反右他是右派，那他決不可能坐一輩子的
牢，沒有出頭之日！上帝有眼，我們所有這些
肉體的痛苦、靈魂的悲感、精神的抑鬱、心頭
的嘆息與燃燒，也會有個夠，有個完！比較起
我的家庭來，你還算幸福的，因爲你家裏沒有
傷亡，而我家却死了兩口人，父親和大姐夫，
他們都是善良的好人，可是，却死得那麼可怕
、那麼慘！過些時，運動結束了，你的丈夫很
快會從監獄裏放出來，當你們團聚時，你可以
把今天的遭遇，比作一個噩夢。夢醒了，一切
也都回來了。鳥語花香、陽光燦爛，依然是美
滿的家庭、美滿的愛情！而我們却將永遠生活
在噩夢中，因爲，死者不能復生，我們只能繼
續生活在夢裏，只可能希望做一個好夢，一個

可以忘却過去的好夢……

「你比我強了許多，想想我，想想許多死
了人的家庭，你就會覺得你經受的打擊，並不
是最重的人，從來都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樣不
幸。幸與不幸，也只有在此比較中，才能得出結
論。你給我看的這個筆記本和信，充滿了你丈
夫愛你的熱誠，所以，你是一個富人，你得到
的愛，便是你的財富，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
有可能得到這樣傾訴靈魂隱秘的熱愛的。如果
你不重視它，而是馬上去辦理離婚，你不僅會
把他送進絕望的深淵，而且也拋棄了你自己的
未來的希望——噩夢醒來時的滿足與快樂。打破
了的碗，即使再補好，也不能再舀燙的東西了
。家庭沒有破裂，外在的傷痕，傷害不了你們
白頭相守的感情，可是，最可怕的打擊，往往
來的家庭內部，自己最愛的人的一擊，勝過所
有的刑罰苦楚。一旦有何變故，你將追悔莫及
，終生飲恨而無法彌補。你要我給你出主意
，我勸你懸崖勒馬，像離了水的螃蟹一樣，相
濡以沫。

「趕緊給他去信，表示你對他永不變心，
相信他是好人絕對沒有錯誤。你要說明你永遠
不會和他分開，因爲，即使是從生物學角度來
看待這一問題，你自己從前也曾告訴過我，不
僅是寡婦門前是非最多，即使是大雁，飛行時
也會無緣無故去啄咬那失偶的孤雁，歇息時支
使孤雁站哨望風。你在這個關鍵時刻去辦離婚
，無非是使孩子失去父親，你自己也明知故犯
地去承擔那失偶孤雁的苦楚！我不想多說這些
生物現象了，你自己比我懂得更多，快去上
課吧！我也要走了！只希望你不過過今晚，就
寄出這封重要的信，表白你對你丈夫的信任與
忠貞。若干年後，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再坐在一
起喝酒乾杯，我想，在那時，我要聽的不是

你丈夫的感謝，而是你自己，你自己會說：哦
，那一年我矛盾又痛苦，差一點去葬送我自己
的幸福，虧得有你，幫助我自己說服了自己，
沒有去走那條路！你會這樣向我說話的，我們
等着瞧吧！」

我激動地說完了最後一句話，立刻，拿起
我的小提琴，準備告別而行。

寧緣站起身來，低着頭，熱淚盈眶地說：
「我從前是基督徒，可後來又信仰了無神論，
我現在真想和你在一起唱一首我們教會學校常
唱的歌，我們可以一起出門。」

孩子小新揹起了書包，臉上容光煥發，非
常感謝和信賴地望着我。他一定已經聽見了這
一切，也在暗中目睹了父親的被捕，所以雖然
喊過爸爸，却一句也沒有問爸爸到那裡去了。
可悲的早熟！在這生死存亡的年代，他們已
經習慣了比成人更成人！

上海市雨後的早晨，空氣十分新鮮，街道
像洗過一樣乾淨，我和我的老同學，送孩子去
學校，路過公園的時候，小聲地幾乎是隱約可
聞地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讚美詩，那是她一定要
我和她一起唱的：

「NEARER MY GOD TO THEE
NEARER TO THEE……」

也許，在她的心中正在默禱：是聖父聖子
的靈，藉我的口，向他傳佈福音了。
只有信仰，才是一切悲哀的靈藥，這便是
人，人這種生物，唯一與其它生物不完全相同
之處。上帝是否存在，誰也不能確切知道，然
而，信仰他，在絕望中，也就有所倚持，不致
於沉淪。我和老同學寧緣分手的時候，對今晚
歸宿何處，也依然存有疑問，但我同樣從歌曲
中，得到了信心，相信我會得救，何況此時，
只是一日之初的清晨。

日本鳳文書館經銷中國之春

日本鳳文書館經銷中國之春雜誌，歡迎大家訂閱和購買，請來函來電聯系。

地址：日本國東京都文京區本郷 2-38-5-201

電話：(03) 815-5055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遷址擴張營業通告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為更好地服務社會大眾，已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搬遷至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 272 號閣樓，佔地八百呎，擴張營業。

擴張之中國之春書屋，經營：

- 零沽批發各種文具、圖書、課本。
- 海內外圖書訂閱、郵購服務。
- 影印服務（能放大、縮小）。
- 沖晒菲林、藝術大相。
- 總經銷『中國之春』月刊。

歡迎各界致電、致函或光臨聯繫上述業務。

新址電話：3-667665 支票請寫 China Spring Bookstore

請您訂閱中國之春月刊

訂費（每年）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寄達地區

地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關：60 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 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 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第 _____ 期）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Tel: 3-667665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 272 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成立及評獎啓事

鑑於民主法治為中國人民本世紀夢寐以求之目標，今海峽兩岸當政者亦倡行民主法治、法大於黨，咸認此乃民富國強必由之道。同人等身居海外，不揣力薄，發起籌募民主教育基金，以資獎勵對促進中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有傑出貢獻之人士、著作及有關研究活動。在籌備之初，已獲得各方認捐美金三萬多元。茲為早日展開評獎工作，經向美國當地政府註冊成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茲竭誠呼籲：

- 1 請海內外各界人士熱心解囊捐助，少則數元或上千上萬，集腋成裘，以資進行上述宗旨之各種活動。本基金會為永久性非營利組織，所有理事均為義務職。
- 2 舉辦一九八六年度評獎，請海內外各界人士熱烈推薦近年來對符合上述宗旨之人物或著作，為評選參考。提名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底截止。得獎名單在十月底前公佈。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謹啓

- 理事兼會長 黃雨川（經濟研究）
理事兼秘書 孫魯正（航空工程博士）
理事兼財務 林劍明（醫師）
理事： 郭平（化學博士）
楊雲（電子工程師）
冬冬（作家）
江文（作家）

本會郵址：

CHINESE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P.O. BOX 1064, SAN FRANCISCO

CA 94101-1064, U.S.A.

TEL. (415) 994-6718

中國民聯

留學生服務部增加服務

好消息！中國民聯增設了留學生服務部。中國民聯的分支機構及盟員遍及全世界，與僑界、學術界、國際人權組織和服務界有廣泛的聯繫，為我們服務留學生和外出人員創造了良好條件。我們提供的服務項目有：

- ▲為留學生及陪讀家屬尋找工作；
 - ▲為自費留學生及留學生家屬尋找經濟擔保人；
 - ▲提供工作、入學、居留和法律等諮詢服務，代聘移民律師；
 - ▲留學生及大陸外出人員政治庇護事宜。
- 中國民聯絕對為服務對象保密。為保證我們工作人員的起碼生活，我們將收少許服務費用。

支援民運活動

請您提供大陸留學生最新通訊錄

- 我們為推動收集留學生名單工作而制訂的各項獎勵措施如下：
- 一、凡寄來包括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名單在內的大學學生錄、中國同學通訊錄者，可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二年；
 - 二、凡寄上二十名以上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地址者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一年；十名以上者，半年；五名以上者，三個月；五名以下者，獲免費贈閱中春簡訊。
 - 三、因學生地址常變，最好寄所在系和教研組的通訊處。
- 感謝您的協助！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您的捐款 ● 可獲減稅

中國民聯擴大活動 亟需各界捐款相助

XX

親愛的各界同胞：

中國民聯在去年年底召開二大後，組織逐步健全，運作漸上軌道。為進一步擴大影響，向中國大陸更多地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思想，向外界及時報告中國大陸的實情，中國民聯決定開展更多的活動，亟需各界同胞捐款相助。我們擬議中的活動包括：

1. 出版英文版「中國之春文選」，目的是向英語各界介紹中國大陸的實情，爭取使中國民主運動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援；

2. 在世界各個與中國大陸有直接航班的大城市飛機場，向中國大陸外出人員贈送中國之春雜誌和有關印刷品，我們已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開展此項活動達一年之久，收效宏大。基於此，我們準備在世界各地將此項活動全面推展，遍地開花。

3. 組織演講團到大學展開宣講活動。

4. 組織人員回大陸慰問尚在獄中的民運人士家屬。

我們還有更多更多的計劃，但由於經費拮据，均無法開展。各項活動均有預算，您多捐款一分，中國大陸民運活動就多開展一點。

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Spring ，亦歡迎與我們個別接觸。

您的捐助，可獲減稅。歷史將記錄下您對中國民運的貢獻。

中國民聯總部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

■ 電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6.00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T. P. Lee #3437 34-39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